

جوڭگو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ཁུང་ཁོའི་མཐའ་ཁྱེད།

China Border area Study

ཁུང་ཁོའི་མཐའ་ཁྱེད།

جوڭگو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三月

213

侗族簡介

在以往漢文文獻中，有所謂「洞人」、「洞家」，就是今日所稱的侗族，可見侗族也是源遠流長的民族，在 1982 年時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多人，在中共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二百八十七萬九千九百多人，二十八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在中國大陸屬於人口較多的邊疆少數民族。

侗族主要分布在貴州省的黎平、榕江、從江、錦屏、天柱、鎮遠、劍河等縣；湖南省的新晃、通道、綏寧、城步、會同等縣；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三江、龍勝等縣，這些縣都在貴州、湖南、廣西省區交界之處，是侗族聚居地區。侗族語言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語支，以往並未創制侗族文字，一般都使用漢文，中共建政後，為之創制以拉丁字母拼寫侗族語言的侗族文字，時為 1958 年，但並未普遍使用。侗族與漢人一樣崇尚祖先崇拜、信仰鬼神，特別尊崇「聖母」，許多侗族村寨都設有「聖母神壇」、「聖母祠」等。

在家庭結構方面，侗族採小家庭制，兒子結婚後，就與父母分居，但幼子雖結婚仍與父母同住，以往由於平均壽命較短，很少看到有三代同堂的。在侗族社會婦女地位較低，且對婦女有許多禁忌，如婦女不准碰觸銅鼓、男人或長輩如在樓下，不准婦女上樓，家長自然為男性，對家庭有絕對支配權，掌握家庭收支，土地由男子繼承，但女子也可分得少許「姑娘田」或「姑娘地」。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責任，而子女對父母有贍養的義務。

侗族在婚姻方面，行一夫一妻制，姑舅婚相當流行，姨表兄妹或輩份不同者不得通婚，房族也禁婚，一般婚齡在十七、八歲，婚事多由父母一手包辦。在服飾方面，侗族的服飾很具民族特色，以往侗族都自行紡織布料以為服飾、細布、綢緞多作為盛裝或配件，近年來當然普遍用機織細布，衣著顏色以青、紫、白、藍等為主，男性一般穿對襟短衣和長褲，與附近漢人無差異，但用青布或藍布包頭，有些地區侗人穿右衽無領短衣；侗族婦女服飾則較為多元，且有明顯的地區性差異，大致上可分為穿裙與穿長褲兩種類型，錦屏、通道、靖縣一帶，著右衽無領上衣，托肩滾邊，釘上銀珠大扣。

侗族人的飲食在主食方面以大米為主，平壩地區則以粳為主，山區則以糯米為主，雜糧則有小米、紅稗、薯類、黃米等，副食方面種類繁多，與一般漢人無異。

侗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風景優美，大的侗寨多達五、六百戶，小的也有二、三十家，其家居房屋多為外廊式兩層樓房，全為木質建築，屋頂多用瓦或杉樹皮覆蓋，也有以茅草覆蓋，樓兩端搭有偏廈，呈四面流水形，三江一帶還有若干幢連在一起的大樓房，廊檐相接，可以互通，極具特色。

至於喪葬習俗，各地區也不盡相同，但大部分採土葬。

目 錄

關於 1949 年西藏的「驅漢事件」	孟 鴻	1
清代盟旗制產生、作用和現代意義	吳楚克	31
憲法一二〇條有關西藏自治條文背景分析	劉學鈔	39
西蒙鼎雄噶爾丹	章維淳	75
〈張字檔〉的明代舊公文紙考析	張華克	91
民於與民族心性	朱美姝	133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八）－水族食品「魚包韭菜」	華 華	143
中國邊政協會第 42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	編輯部	147
稿 約		150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鈔所著《歷史原來是這樣》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627-7749。

歷史是什麼？廣義是過去發生的事，狹義是經過後人篩選過濾的事。現代人要了解歷史必須透過先人留下來的各種史書，歷史是人寫的，寫歷史的史官總會有既定的政治立場，很多主流的歷史說法也不一定是歷史真正的原貌。還原歷史真相，從不同的角度看歷史，也許會發現，我們曾經以為很熟悉的歷史會是如此的陌生。

本書包含以下十個主題：

- 一、北魏後宮多高句麗女子。
- 二、花木蘭其人、其詩、其事。
- 三、掀開五胡十六國序幕的匈奴劉淵。
- 四、北魏洛陽的靈異事件與西域胡僧。
- 五、幾個末代皇帝事蹟。
- 六、成吉思汗的霸業、容貌與陵寢。
- 七、隋、唐先世多胡化。
- 八、五世達賴喇嘛、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
- 九、匈牙利是匈奴的後裔？
- 十、稗官野史中的武則天。

作者根據史料旁徵博引、交叉比對，加上本身專業的經驗與研究的修為，引領大家進入塵封已久的歷史禁地，窺探古代那些不為人知的傳奇軼事，帶給你聞所未聞的閱讀享受，看得過癮、讀得暢快－歷史原來是這樣。



關於 1949 年西藏的「驅漢事件」

孟鴻

前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摘 要

1949 年中國正陷於國共內戰尾聲，國民政府全面落敗幾已成定局，中共即將席捲大陸，也成指日可待之事，此時西藏噶廈當局在外人教唆蠱惑下，突於藏曆土牛年（1949 年）六月三日（陽曆七月八日）通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要所有在藏漢人，分三批全部離開西藏，此即所謂「驅漢事件」，此事件內情頗為複雜，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就此一事件作一分析。

關鍵詞：驅漢事件、駐藏辦事處、熱振呼圖克圖、陳錫章

前言

西藏十三世達賴在受過俄羅期訓練之俄籍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蠱惑下¹，慫恿十三世達賴離中、親俄、反英，相當成功的左右了十三世達賴的思想（據喇嘛教格魯派自稱達賴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而「達賴」一詞是蒙古語，本意為海，但蒙古高原並不臨海，因此所謂「達達」，只是面積較大的湖泊，「達賴」一詞可申引為「智廣如海」，一個宣稱是觀世音菩薩化身的「活佛」，而且又被尊稱為「智廣如海」，其思想行止居然

¹ 道爾吉有七、八個化名，其身分複雜可以想見，關於其人身世，在藏作為非本文主題，不予贅述，但可參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年；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年；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三聯書局，1993 年，均有詳細敘述，另徐明旭《雪山下的醜行—西藏暴亂的來龍去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6 年，對道爾吉也有所描述。

被一個布里雅特蒙古喇嘛所擺佈，而這個布里雅特蒙古喇嘛，又是受俄羅斯訓練與指使行事，其間因果關係，頗為怪異），因此當 1904 年，帝國主義者英國派榮赫鵬率軍攻入拉薩前夕，率親信僧俗官員數十百人向北而逃，照常理說應該逃往內地，請求朝廷保護，然而他不作此圖，而是經青海過甘肅，逃往外蒙古，意欲再向北進入俄羅斯，請求俄羅斯保護，可見道爾吉的蠱惑何其成功，只是天未見憐，1904 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而英日向為同盟，俄國不敢接納十三世達賴入俄境，只好逗留外蒙，其後在清廷派員到外蒙，逼其返回內地，不得已回到青海，之後又要到五台山禮佛及到北京陛見，朝廷均准其所請²，其在北京期間，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所接觸，為了能返回西藏，似與朱爾典作出妥協，自此改反英為親英，未幾，光緒、慈禧先後逝世，達賴趁朝廷忙於國喪荒亂之時，奏請返藏，朝廷准其所請，達賴回到拉薩後，從此在英印政府鼓動之下，走向親英藏獨之路。

十三世達賴回藏後，一面倒向英印，而英印更是極力拉攏，並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中，豢養一批親英印官員，辛亥之後，且一度宣稱獨立，與外蒙古訂定兒戲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之「獨立」，及至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全國統一，頗具興復氣象，而國民政府為申張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派員入藏與十三世達賴有所接洽，而達賴也見中央力量日益壯盛，遂同意設立西藏駐京辦事，雖則如此，西藏與中央仍呈若即若離狀況，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幾全為親英印分子所把持，及至 1933 年，十三世達賴圓寂，藏地依傳統慣例呈報中央，同時推舉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國民政府特派大員黃慕松率團入藏致祭，冊封，以示對西藏政教之重視，其時藏地所推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較具有國家民族觀念，也頗知西藏與內地具有悠久歷史與親密關係，且元、清兩代均納入中國版圖，而藏地喇嘛教各教派諸多法王均為中國明朝所賜封，藏地噶廈政府也為中國清朝所制定，因而對國民政府頗為友善，黃慕松在拉薩時，曾與熱振呼圖克圖多次晤談，相處頗為融洽，當黃慕松離藏時，也徵得熱振與噶廈之同意

² 關於十三世達賴在外蒙古情況，駐錫青海塔爾寺、赴五台山禮佛，接觸各國駐華官員，以及在北京時之諸情況，可參看劉學鈞《英軍侵藏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入蒙》一文，該文輯入劉氏所編《二十世紀之蒙藏問題》，台北南天書局，2002 年，P.139~170。

留下蔣致余等少許人在拉薩設立一小型辦公室，以為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與中央聯絡之窗口，此一小型辦事單位遂成為日後蒙藏委員會設置駐藏辦事處的嚆矢。

一、中央派員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與設置駐藏辦事處

十三世達賴於 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圓寂，同月二十日，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電告西藏駐京代表云：「達賴佛座於藏曆亥月三十日下午七時半圓寂，藏中事務暫由噶倫及噶廈負責處理，希安心供職，並呈報中央，詳情容後另電知照。」³西藏駐京代表貢却仲尼當即向蒙藏委員會呈報，並請轉呈行政院，國民政府得報後立即復電致唁，並贈以賻金，明令追尊十三世達賴為「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更特派大員黃慕松為專使，進藏冊封並致祭，同時批准由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

十三世達賴既已辭世，在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下，循喇嘛教格魯派傳統慣例，派出數批活佛及喇嘛到各地尋找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即俗稱之轉世靈童），幾經尋覓、認證，找到青海塔爾寺附近湟中縣祁家川一個藏族農民祁却才讓之子拉木頓珠，認為靈異特著，而藏地各方均同意此一靈童就是十三世達賴轉世真身（見夏格巴著《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03）。

按照清代成規，尋妥已圓寂達賴或班禪的呼畢勒罕時，如果靈童不止一人時，須奏報朝廷，然後在駐藏辦事大臣監臨下，舉行金瓶掣籤，以決定何者為轉世靈童真身，如僅尋獲一名靈童時，也需經過朝廷批准免予掣籤，經過此一程序，呼畢勒罕始具合法性與正當性，也唯有經過中國中央的核定，藏地僧俗大眾始會對之產生信仰。但自十三世達賴全面親英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高階僧俗官員幾乎全成為親英分子，在英、印政府蠱惑下，意欲脫離中國，訴求西藏獨立，雖然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對中央頗為友善，無奈親英分子把持藏地政務，並不甘心向國民政府中央要求定其所尋得之靈童，就是十三世達賴的轉世真身，但恪於傳統成規，達賴、班禪、章嘉等這一等級的「活佛」，如未經中國中央的認證，其合法性、正當

³ 見《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年，頁 3、4。

性，否則會被蒙藏喇嘛教信徒懷疑，在此受制於傳統成規約束下，才通知了南京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為了維護對西藏的主權，以及沿襲前清傳統或慣例，特准拉木頓珠免經掣籤即行認定其為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更特派大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此處用「監臨」二字，一則沿襲前清駐藏大臣監臨達賴、班禪坐床之成例，再則西藏地方有關僧俗政治人物均否認達賴或班禪坐床典禮中，有「主持」一職，以往漢文文獻多稱吳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但藏人多不認同此一說法，故此處用「監臨」二字，此舉旨在彰顯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但狡猾的夏格巴在其《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中竟說成：「中國政府要求吳忠信一行前來慶賀達賴喇嘛坐床，……印度和中國官員來到羅布林卡，向至高無上的達賴喇嘛頂禮拜見。」（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07），可見夏格巴完全扭曲了歷史，其目的在欺騙世人。

吳忠信入藏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典禮，並代表中央政府冊封達賴及熱振呼圖克圖、及到三大寺布施後，留下部分人員在拉薩成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類似前清之駐藏辦事大臣衙門，雖然在規模與權威上，無法與清代駐藏辦事大臣相提並論，但象徵中國擁有西藏主權的政治意義，則無二致。此一駐藏辦事處是在前此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後，留下劉樸承、蔣致余等少許人及小型辦公場所的基礎上所設置。

首屆駐藏辦事處其結構及人員情形如下：

處長：孔慶宗

副處長：張威白

第一科科長：華寄天

第二科科長：孔慶宗（兼）

藏文秘書：李國霖

翻譯：張旺

科員：吳三立、劉桂南、蘇大成

辦事員：高師原、李耀南。

此外可能另有幾個雇員、差役。處長孔慶宗精明幹練，在孔氏斡旋說服下，十四世達賴之二兄嘉樂頓珠及塔克拉·彭措札西（此人後來娶達賴

之姐為妻）到重慶就讀中央政治學校（今政治大學前身）附設之蒙藏班，或許因此與藏地親英分子有所扞格，噶廈要求中央撤換孔慶宗，綜計首屆駐藏辦事處自 1940 年四月一日設立，至 1943 年十月八日孔慶宗離任，前後三年半。

國民政府乃任命沈宗濂為第二任駐藏辦事處長是為第二屆駐藏辦事處，其組織編制及人員均有所調整，其情況如下：

處長：沈宗濂（1943 年十月八日任命）

陳錫章（1946 年一月代理處長，1947 年七月七日任為副處長兼代處長，1949 年七月二十日離藏）

主任秘書：陳錫章

第一科科長：陳錫章（兼）

第二科科長：李有義

第三科科長：左仁極

藏文秘書：李國霖

英文秘書：柳陞祺

專員：李茂郁、李唐晏、劉桂楠、余敬德、劉毓琪、廖魯薌

沈宗濂可能於 1945 年年底離開拉薩，而由陳錫章以主任秘書於 1946 年一月代理處長，次年任為副處長，仍兼代處長，直到 1949 年七月，西藏噶廈政府受印度教唆，趁國共內戰方殷，國民政府落敗已成局之際，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驅離西藏。

二、熱振被毒害親英派全面奪權

十三世達賴圓寂後，由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按藏地之有攝政，係中國清朝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七世達賴羅桑格桑嘉措（1708~1757 年）圓寂，清廷為防止噶倫等「擅權滋事」，乃任命出身格魯派丹吉林之第穆呼圖克圖阿旺絳貝德勒嘉措（或作阿旺強白嘉措）出任達賴之代表，在達賴轉世靈童未尋獲及靈童未成年前，代行達賴之職權，中國清朝之此一措施，遂成為西藏地方政府之攝政制度，清廷之所以以高位階活佛（呼圖克圖）出任攝政，其目的應在防止世俗貴族勢力坐大，綜計自七世達賴圓寂之西元 1757 年，至十三世達賴圖丹嘉措親政之西元 1895 年，前後一百三十八年間，其間除八世達賴、十二世達賴短期親政

外（八世二十六年、十二世一年），概由攝政把持藏地政教兩權，在此一百多年間，中國清朝中央共任命十一個攝政，其名單及攝政時間如下：

（一）出身丹吉橡之六世第穆呼圖克圖，攝政二十一年（1757~1777年）。

（二）出身策墨林之一世噶勒丹錫呼圖禪師（即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阿旺崔陳），攝政十年（1777~1786年）。

（三）出身功德林之八世濟隴呼圖克圖達察羅桑益西丹貝貢布，攝政七年（1804~1810年）。

（四）出身丹吉林之七世第穆呼圖克圖洛桑絳央班覺加措，攝政九年（1811~1819年）。

（五）出身策墨林之二世活佛阿旺絳白崔陳加措，也即第七十三任丹丹赤巴，攝政二十六年（1819~1844年）。

（六）七世班禪額爾德尼丹白尼瑪，攝政二年（1844~1845年）。

（七）出身錫德林之三世熱振呼圖克圖阿旺益西崔陳堅贊（或作阿旺益西此陳嘉措）攝政八年（1855~1862年）。

（八）夏扎旺秋結布，攝政三年（1862~1864年）。

（九）德珠羅藏青繞汪曲，攝政十年（1864~1873年）。

（十）出身功德林之十世濟隴呼圖克圖達密阿旺班丹曲吉堅參，攝政十二年（1875~1886年）。

（十一）出身丹吉林之八世第穆呼圖克圖阿旺洛桑赤烈繞結，攝政九年（1886~1895年）。⁴

以上十一個攝政大多出身四大林（指丹吉林、策墨林、功德林及錫德林）或由甘丹赤巴，經清廷批准而後出任攝政，從上引歷任攝政中，不禁令人覺得怪異，何以八世達賴之外，九至十二世達賴，多是其壽不永，其中有若干世達賴竟是未及親政（成年始親政）即告「圓寂」，照理說凡被認證為前世達賴之呼畢勒罕者，莫不養尊處優錦衣玉食，受到極周到的照顧，何以未成年即告「圓寂」，這與攝政享有世俗權力，不欲達賴成年親政，一旦達賴夭亡，仍可繼續攝政，續享榮華富貴，多世達賴未成年而辭

⁴ 主要參考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97~498，不過此書將第穆作第九世。

世，是否與攝政貪圖世俗權力有關，實令人懷疑，也因此一旦達賴成年親政，往往對攝政有所「行動」，從既往的成例看，攝政的下場似乎都相當淒慘，如十三世達賴親政前的攝政係出身丹吉林之八世第穆呼圖克圖，此「活佛」在十三世達賴親政後，送一雙鞋子給達賴，十三世達賴穿上後，「立即流鼻血，不知何故，頗為疑惑」⁵，懷疑鞋子有問題，拆開鞋子，「從厚實的鞋底縫中發現一張紙條，上面書寫有呈輪形的閻羅王的命根咒，符咒上有勾召火鼠年出生的土登嘉措之字樣」（同註 5），經過審訊，原攝政第穆呼圖克圖阿旺洛桑赤列繞結承認是他在鞋子底縫中放了那紙條，因此將第穆呼圖克圖判定在丹吉林寺辯經場新屋中終生關閉，不得同外界聯繫，等於活活餓死（見孫炯《西藏舊聞》頁 50），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在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則稱：「把第穆浸泡在丹吉林寺內一個巨大的銅水桶裏活活淹死的。」⁶設若此說為真，證實若干攝政確有戀棧權位，不願讓達賴長大成年，更不願讓達賴親政，而達賴一旦親政，對原攝政的報復，也已無所不用其極慘絕人寰的手段，果而達賴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這個化身不僅不慈悲，而是太過血腥。可見喇嘛教格魯派無論達賴或呼圖克圖、活佛，並非都是以慈悲為懷，如果遇上與其權力有衝突時，其手段之殘酷，會令人不忍聞問。設若第穆呼圖克圖果真在送給十三世達賴的鞋子底縫中，塞入一張「書寫有呈輪形的閻羅王命根咒，符咒上有勾召火鼠年出生的土登嘉措之字樣」的紙條，這就坐實了喇嘛教格魯派仍不脫巫術成分，如果沒有這紙條，那就是栽贓，正證明了攝政與達賴、噶廈高僧俗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既是結構性問題，也是人性貪婪問題，縱然是生下時就帶有「佛性」的呼圖克圖（活佛）也難逃對權力名利的誘惑與戀棧。

十三世達賴自 1908 年從北京返回西藏後，即全面親英，因此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僧俗官員大多見風轉舵，成為親英分子，尤其十三世達賴於民國二年（1913 年）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私定《蒙藏條約》彼此

⁵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48，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孫炯《西藏舊聞》，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 年，頁 4 作「達賴穿上後感到心神不寧。」

⁶ 該書係杜永彬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上冊，頁 45。

互相承認獨立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就一直往西藏獨立之路前進，當然這其間英印的蠱惑慫恿是為主因，而中華民國肇建之初，軍閥割據，國家未能統一，力量衰微，也是原因之一。熱振呼圖克圖既被推舉為攝政，其與噶廈官員競逐權力之先天性矛盾既不能免，而熱振係出家喇嘛，自然知曉喇嘛教自元代至清代，與中國中央有其綿密的關係，與中央具有先天性友善情懷，而其時噶廈中之噶倫多為英印政府所收買，多傾向藏獨，其與熱振無法融洽相處，乃必然之事，熱振也曾運用其攝政之威權懲罰、撤換過幾個親英派噶倫及官員，因而熱振遂成為藏地親英分子之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但攝政在藏地擁有崇高地位與極大權威，親英分子一時之間對之莫可奈何，其時（約為民國二十八、九年間）拉薩街頭紛傳蛇年（民國三十年）對熱振不利，此種流言是否係親英分子所散布，無從查證，偏偏熱振相信命相之學子平之術，於是找占卜師占卜吉凶，占卜師也作如是言（是否為親英分子所收買，也是無法查證），在藏地位階最高的占卜師為乃窮護法大神，噶廈政府遇到重大問題難作決定，或有人反對時，往往請乃窮護法大神請求乃窮降神，由神明開示。乃窮護法大神一般簡稱為乃窮神，或作乃瓊、乃傾、乃均等，指藏地乃瓊寺所供奉之護法神，乃瓊寺係哲蚌寺之子寺，「乃瓊」一詞係藏語，原意為「小地方」。降神時以乃窮神附身（內地之乩童、台灣之「師公」、「童乩」與之類似），以「乃窮神漢」身份代言，歷代乃窮神漢都是西藏地方位階最高的「靈媒」，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遇重大事件如達賴轉世、戰和、對重要官員之懲罰等，如內部意見不一時，都要請乃窮神降神，由神明予以開示，然後按照神明開示決定如何進行；當然乃窮神之開示，一如藏地之民眾大會之決議一樣，都可以由有心人在幕後加以操控，因此乃窮神實際上是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手中的政治工具（見刑肅芝口述，張建飛、楊念群筆錄之《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231，但此處係轉引自趙崇榮、鄒敏所撰《述論1949年噶廈對國民政府駐藏官員的驅逐》一文，該文載《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四期，頁28~34，試想位階最高的乃窮護法大神都可以被操控，熱振所請的占卜師（靈媒、乩童、師公之流），事前是否已被親英派分子收買，很值得懷疑。經過占卜之後，心有所懼，決定暫離攝政之位，返回熱振寺閉

關靜修。

熱振呼圖克圖既已決定暫離攝政之位，待「厄運」過後，再回任攝政，於是推舉其經師無甚名氣且年已老邁之打扎活佛（非呼圖克圖）為代理攝政，並私下約定為期三年，三年之後，將攝政之位交回熱振，據說在讓位讓權時，曾在西藏僧俗民眾大會中，將此項約定「訂下紀要」⁷，於是打扎於 1941 年坐上代理攝政之位。

如按藏地傳統政教習俗，攝政之產生需經過四大林（指丹吉林、錫德林、策墨林及功德林）及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及大昭寺）與僧俗民眾大會同意後產生，因此在既往十一個攝政中，有八個出身四大林，而此次熱振呼圖克圖私人舉薦打扎活佛代理攝政，與藏地傳統政教習俗、慣例不合，但反熱振派及親英分子，一心只想要熱振離開攝政之位，又深知打扎活佛不但老邁昏聩，而且貪婪易於收買操控，於是就將傳統政教習俗、慣例，置諸腦後，同意由打扎活佛出任代理攝政。

打扎活佛坐上攝政寶座之後，在親英分子金錢包圍之下，忘卻與熱振呼圖克圖有師徒之情、有讓位之恩，開始清除噶廈政府中親熱振官員，換上親英派分子，但親英派分子並不肯就此善罷甘休，一則必欲置熱振於死地，使熱振無從東山再起，也唯其如此始能徹底切斷西藏與中央的關係；再則打扎上台花了幾年時間將噶廈政府中親熱振派官員清除殆盡之後，竟設立「外交局」，在英印政府操縱下，大搞西藏獨立，以打扎的政治知識水準，不可能知道何謂「外交」、何謂「獨立」，縱然那些親英分子，也未必瞭然複雜的國際關係，只是英印政府手中的玩偶而已。為了置熱振於死地，必須製造事端，以便羅織罪名，由是誣指熱振派人向國民政府蔣介石投訴：「攝政打扎活佛對百姓不公正，若他辭職則罷，如不辭職，就可能用武力解決，那時，請予以軍事援助。」所以派代表到南京⁸，按當時為民國三十六年（1947 年），應在二月二十三日之前，據夏格巴書稱：1947 年二月二十三日，打扎活佛、噶倫喇嘛土登滾欽、噶倫蘇康·旺欽格勒（此人於 1970 年代來台，並出任《噶倫辦事處》負責人）決定派兵

⁷ 見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頁 216。

⁸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18。

名為「迎請」實為逮捕熱振到拉薩，按當時抗戰甫告勝利，百廢待舉，而國共即陷入內戰，台灣雖告光復，接收人員措施不當，殘留之日本浪人、台共從中興風作浪，以致情勢並不穩定，致有「二、廿八事件」爆發，第一屆國民大會正準備開議，新疆「三區革命」其勢正熾，而外蒙古又在蘇聯指使、支援下，對新疆發動「北塔山攻擊」事件，凡此種種均令當時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焦頭爛額，豈有餘力處理西藏內部派系之爭，且夏格巴書僅稱熱振派代表到南京，並未指明所派者為誰，向南京國民政府那一機構接觸，國民政府如何處理，均未見提出，此一指控很可能出自杜撰，以便羅織罪名，夏格巴對此固優為之。

熱振呼圖克圖在此一指控之下，遂被關進監獄，時為 1947 年藏曆二月二十七日；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一書稱：審訊熱振時「他立刻認錯，當著西藏會議（按即僧俗群眾大會）眾人磕頭說：『攝政活佛，請求諒解息怒，磕頭懺悔。』」（見夏格巴書漢譯本下冊頁 219），但梅·戈爾斯坦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中，曾訪問當年參與審理此案的噶廈政府官員，都沒有提到熱振俯首認罪一事（見該書下冊頁 523~528），反而說：「大扎（按即打扎）和我有著師徒情誼，我絕不可能想到要傷害他。」⁹，可見夏格巴所稱：一經審訊熱振立刻俯首認罪之說，純屬憑空杜撰，其目的除了要誤導世人認為熱振確實曾主導或參與謀害打扎一事之外，更為關押熱振（甚至在獄中將熱振毒害而死）創造正當理由，而捏造此一「供詞」，如所周知，在三木之下，何患無供。

熱振一案經過三次審訊，究竟應如何定罪，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就在這種情況下，熱振在獄中於 1947 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為夏格巴書中所說之月日，應係藏曆；在梅·戈爾斯坦書中則作五月八日，應為西曆）突然死於獄中，按當時熱振正值三十五歲之盛年，如非受到外加的傷害豈會如此輕易喪生，即使是帝國主義英國餘孽黎吉生（Richardson 此人原為英國駐拉薩代表，印度獨立後，印度仍任之為印度駐拉薩代表，繼續鼓動西藏獨立）於其所著《西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ibet）也直指：「前攝

⁹ 梅·戈爾斯坦採用夏爾孜·益西土登《熱振事件及熱振被捕的回憶》一文，據益西土登所述熱振在接受「民眾大會」歷次審訊之後，對他所講的話，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24 註 1。

政（按係指熱振）死于布達拉監獄中，雖然官方沒有承認，可以毫不懷疑，他是被殺害的。」（此書係李有義漢譯，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歷史研究室、民族學研究室出版，1979 年，頁 149，但此處係轉引自王貴等著《西藏歷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年十一月第二刷，頁 338），而藏人恰白·次旦平措、諾昌·吳堅所著《西藏簡明通史》一書也明白指出熱振「是被大扎（按即打扎）一派的壞人趁其有病之時暗中毒害死的。」（見該書藏文本下冊頁 724，西藏社科院、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 年，但此處係轉引自《西藏歷史地位辨》，頁 337~338），當年在拉薩的多數人認為熱振是被壓捏辜九而死（見《西藏歷史地位辨》頁 337），總之，熱振呼圖克圖是被毒害或虐殺而死，然而夏格巴在其《藏區政治史》一書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卸任攝政活佛（指熱振）身體有些不適，噶廈接到報告，立即命令迎請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堪窮欽繞諾布詳細號脈診斷，像是患了感冒并發症，不要緊，便給了他經常服用叫做“如意寶”的藥，並將診治情況報告了西藏會議。二十八日早晨兩點鐘卸任攝政活佛圓寂。」（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219）」，完全不提死因，其刻意掩藏熱振死因，用心狠毒，於焉可見，試想熱振係出身四大林之轉世活佛，又曾任攝政，突然猝死獄中，在藏地自屬重大事件，經藏地僧俗民眾大會討論後，向噶廈報告，決定成立所謂調查專門委員會，調查熱振之死因，不過熱振是由噶廈派兵將之逮捕投入噶廈所管轄之監獄，而後猝死於獄中，再由噶廈所組成之專門委員會調查其死因，這就如同球員兼裁判之調查，其調查結果能有幾許公正性，身為調查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夏格巴，梅·戈爾斯坦曾就熱振之死一事訪問了夏格巴，夏格巴說：「我參與此事（指參與調查熱振死因），我完全不認為他（指熱振）當時是被殺害的，…」（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這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而其所著《藏區政治史》一書十四世達賴給予高度的讚許，就這一點而言，十四世達賴是否慈悲為懷，實屬可疑。

另據梅·戈爾斯坦於其所著《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提到曾訪談當年目睹熱振遺體者稱：「熱振的遺體背部、臀部有一種傷痕。」（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530），雖然該被訪談者說這種傷痕「可能是受到護法神的懲罰所致」，吾人以理性思考，縱然宇宙間果真有神靈，神靈也只的

「懲罰」人們的心靈，不會懲罰人們的肉體，可見這種傷痕必然是人為的，想來熱振這個「活的佛」在獄中遭到毒打，攝政打扎活佛是熱振的經師，其攝政之位，又是熱振讓予的，如果沒有打扎活佛的授意，獄卒或審案官員，豈敢對熱振活佛施以毒手？但願這只是喇嘛教格魯派政教合一制下的特例，而非常態，否則達賴所領導的喇嘛教就太駭人了。

依照藏地傳統習俗，熱振遺蛻運到了拉薩協德寺供信徒憑弔，當時在熱振臉部「用一塊紅綢緞蓋著面部讓人瞻仰，拉薩有成千上萬的人到這裏來向遺體告別，……我們看見從熱振的鼻孔流出了一股鮮血，浸透了覆蓋遺體的那塊布。……」（見《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頁 530）；此外，當時人在拉薩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英文秘書柳陞祺，於其所著《拉薩舊事》一書，也指出「屍體是活佛圓寂後的規矩盤膝坐著的，臉上有一方綢子，綢子上有從鼻孔或是口部流出的血漬。」¹⁰從而可證實夏格巴所說「我完全不認為他（指熱振）當時是被殺害的」，是一派胡言。然而美、歐所謂「藏學家」如范普拉赫者流，其有關西藏知識，多來此書（指《藏區政治史》），其謬誤乃是必然之事。

自熱振讓出攝政之位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一則清除噶廈中之親熱振官員，再則恢復之前被熱振罷黜之親英分子官位，更引進新的親英印群小，從此藏地政務面目全非，在英印政府心目中認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存在，象徵中華民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乃教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撤出，由是遂有之後的所謂「驅漢事件」。

三、駐藏辦事處的作為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後，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 年）四月一日，在拉薩成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全部僅有十餘人（上文有全部人員名單）。以此箋箋十餘人，不可能有多大作為，且其中僅有李國霖一人通曉藏語文，可見其不可能有多大作為，其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其所能發揮之實質功能；也唯其如此，引起英國注意，欲將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變成與英國、尼泊爾等國所派駐

¹⁰ 見柳陞祺《拉薩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 年，頁 50，按此書係其舊作，於其辭世後（2003 年辭世）始行出版。

西藏的代表機構一樣，成為「外國」駐藏代表單位，於是一手操導蠱惑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設立「外交局」，時為民國三十一年（1942 年）七月六日，噶廈政府任命扎薩索康及貢覺仲尼大喇嘛二人主管此外交局，並通知英國、尼泊爾駐藏辦事機構及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稱：「自本日起，一切事件請處長向該局（指外交局）接洽，勿直接與噶廈提說……」¹¹，英國自是對此「外交局」立予承認。孔慶宗於七月六日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電報中更明白指出噶廈之設立「外交局」形同自視為一個國家，在電文中稱：「查外交局性質係與外國洽辦事件之機關，今噶廈告職須向該局洽辦一切事件，是視中央為外國，示西藏為獨立國，如我予以承認，則前此國際條約所訂西藏為中國領土之文無形失效，而西藏與外國所訂明密各約未為中央所承認者，無形有效。事關重大，中央似宜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件。……」（同註 11），可見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政治嗅覺相當敏銳，因此，蒙藏委員會於 1942 年八月五日致電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轉達行政院八月一日給噶廈之訓令，明指「藏方為處理地方涉外事務而有設置機構之必要，則應遵守下列兩事：（甲）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乙）中央與西藏一切往還接洽方式，仍應照舊，不得經上述外務機構。」¹²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遵照中央指令，堅持不與所謂「外交局」接觸，甚至連「外交局」轉交由郵局系統寄給駐藏辦事處的內地來函也不接受¹³，孔慶宗堅守國家尊嚴與主權的立場，令人敬佩。

然而噶廈自認背後有英國為之撐腰，竟然不接受蒙藏委員會轉來行政院的訓令，更試圖以不當方式如無故在拉薩街頭捕捉漢人，施以毒打，然後放言只要駐藏辦事處向「外交局」交涉，即可釋放該漢人，企圖以此等下作方式，誘使駐藏辦事處與「外交局」接觸，及至同年十月初，噶廈更

¹¹ 見孔慶宗 1942 年七月六日《報告噶廈設立所謂“外交局”電》，此電文輯《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北京中國社科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藏社科院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30。

¹² 同上引書頁 532。

¹³ 見梅·戈爾斯坦（M. C. Goldstein）《西藏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1989 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頁 383。

借故停止供應駐藏辦事處的柴草，甚至撤走派到駐藏辦事處的聯絡人員及辦事處內藏籍服務人員、放縱軍警衝入辦事處進行騷擾，以此迫使駐藏辦事處與「外交局」接觸，但孔慶宗以大局為重恪守中央指令，絲毫不為所動（同註 13），彼此僵持至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國民政府為制止噶廈上述惡劣行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自召見西藏駐京（時已遷都重慶）辦事處處長阿旺堅贊等人，怒斥噶廈之作為有違國家主權統一，係屬不法活動，無論言詞與態度均極嚴厲¹⁴，此時已是抗戰後期，日本侵華態勢已呈強弩之末，而國民政府抗日之戰已見勝利曙光，在此形勢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不得不見風轉舵，於 1943 年六月十四日噶廈復電中央，表示不再要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要與其「外交局」接洽事務，同時也逐漸恢復對駐藏辦事處之柴草等供應，可見對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一味優遇未必有用，有時棒子較胡蘿蔔更易見效，雖則如此，其象徵西藏獨立之「外交局」，在英國支持下，仍然存在，直到 1951 年中共「和平解放」西藏後，始予撤廢。

從上述情況可見駐藏辦事處處境相當艱困，其日常工作不多，從已由蒙藏委員會編譯室於民國九十五年編印出版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中可看出，多半為濟助人藏研習喇嘛教法之漢人、在藏漢人喇嘛之類瑣碎事務。但對英國在藏活動頗為關注，按英國對西藏始終懷有野心，妄想將之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也是國民政府時期西藏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的最大障礙所在，1942 年春，英國妄圖利用國民政府迫切希望開通新的援華物資通道，乃藉口要經藏區運送援華物資，想加強對西藏的控制，英人盧得洛於 1942 年五月十日到噶廈交涉此事時，曾措詞強硬表示「無論西藏允否，（經藏區運送援華物資）此事必須實行，藏如不允，有勾結日本之嫌疑。」噶廈為此特於五月十一、十二日緊急召開民眾大會討論，駐藏辦事處探得此項訊息，更進一步獲知在民眾大會中，俗官擦絨等表示「西藏可允借路」，但僧官貢覺仲尼、曲丕圖丹等表示反應並堅持「應向中央報告探明真相，方好應付」，民眾大會最終決定「對英仍加拒絕」，同時，將此案「詳細電呈蔣委員長及吳委員長（按係指蒙藏委員會吳忠信

¹⁴ 見《蒙藏委員會秘書周昆田致孔慶宗電》（1943 年五月十三日），輯入《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三聯書局，1963 年頁 351，但此處係轉引自周偉洲主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年，頁 536。

委員長)」，並請噶廈約孔慶宗一談¹⁵，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為此遂與盧得洛接觸，欲了解英國真正目的所在，盧得洛稱借路一事已被噶廈堅拒，但表示此事「勢在必行」而「空言無效，將採切實辦法」¹⁶，且稱已致電英國政府請示方針，對此，孔慶宗認為英國「是否其實力藉護送（物資為名）先我控藏，實難預料。」（同註 15 所引資料），從而可見當時駐藏辦事處辦事相當認真，孔慶宗以極少人力，而有如許成就，許之為幹才誰曰不宜。

英國對我西藏懷有野心，固為世所習知，當時日本侵華戰爭戰火方熾，日本也欲染指西藏，並將之納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實因西藏位處亞洲腹地，地勢高亢，對南亞次大陸（印、巴等國）具有高屋建瓴之地緣優勢，深富戰略價值，如能控制西藏，就能以之為跳板，進而滲透中亞、南亞，此所以在十九世下半葉以來，俄國、英國無不想方設法要控制西藏，日本之發動侵華戰爭，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自不能放過西藏，何況西藏又是喇嘛教的發源地，所謂喇嘛教，是藏地傳統信仰「本教」為基礎，大量採納佛教，且自稱為佛教的一種宗教¹⁷，了藏族信奉之外，蒙古族聚居地區也盛行該教，即使遠在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西岸的喀爾瑪克蒙古族也信奉喇嘛教，喇嘛教派系頗多，其中以格魯派（俗稱黃教）最具聲勢，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章嘉呼圖克圖號稱喇嘛教黃教四聖，其攝化區政正好為青康藏、內、外蒙古，因此如能掌握達賴，就會對青康藏內外蒙古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因此日本對達賴、喇嘛教、西藏都下足工夫，日本對藏工作，分由關東軍及外務省兩個部門進行，茲大部分參採秦永章所著《日本涉藏史》一書¹⁸，分別敘述如次：

（一）關東軍之西藏工作

日本於 1931 年（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件，占領中國東

¹⁵ 見魏少輝《20 世紀 40 年代前期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涉外藏務調查研究》一文，該文刊載大陸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三期，頁 83~89。

¹⁶ 見張羽新、張雙志《民國藏事史料匯編(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但此處係轉引自註 15 魏少輝所撰之文。

¹⁷ 關於喇嘛教詳情，可參見孟鴻《且說喇嘛教》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203 期，中國邊政協會，2015 年九月。

¹⁸ 《日本涉藏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70~272。

北三省，其中有蒙古族聚居之呼倫貝爾部、布特哈部、哲里木盟，其後更占領熱河省，其中有蒙古之昭烏達盟及卓索圖盟，蒙人幾全信奉喇嘛教格魯派（黃教），也就是說在關東軍占領下我國東北四省，有不少喇嘛教信徒，既有信徒，便有不少喇嘛寺廟，自然就會有喇嘛、活佛，這就與西藏喇嘛教產生了聯結，蓋不時有藏籍活佛前來「弘法」、接受供養，如西藏高階喇嘛安欽呼圖克圖等，就為日本關東軍拉攏所收買（如給予極豐厚的「供養」）。如此作法確實得到若干西藏喇嘛的好感；其次日本關東軍直接派遣間諜潛入西藏，如 1939 年五月，日本野元甚藏就受關東軍派遣，隨安欽呼圖克圖進入西藏，在西藏逗留一年多，至 1940 年十二月始離開西藏；1940 年關東軍聘請與十三世達賴等西藏上層有密切關係之所謂「西藏通」多田等觀等，為關東軍的喇嘛教顧問可見日本關東軍為遂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對西藏事務也頗為關注。

（二）外務省之西藏工作

日本外務省對「大東亞共榮圈」自然較關東軍更為積極，因此對西藏工作也更為多元，約略分析其對藏工作，約有以下四個方式：其一，設法引誘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秘密到日本訪問，1942 年六、七月間，經日本外務省策劃，西藏地方政府派丹巴打扎等一行為代表，秘密到日本參訪一個多月；其二，向滯留在內地的西藏人中，蒐集有關西藏之情報，同時從中國內地秘密派遣蒙古族、藏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等省均有藏族）喇嘛到西藏收集情報；其三，派遣日本間諜潛入西藏，刺探情報，如 1943 年，日本為調查國際援華路線，派遣木村肥佐生、四川一三兩人潛入中國西北地區，然後轉往西藏，其後赴印度，直到 1950 年始由印度遣回日本；其四，注重學術性「西藏研究」，我人固然不宜輕論斷凡研究我國蒙古、新疆、西藏之國家，就是對我蒙古、新疆、西藏懷有野心，但絕對可以論斷，凡對我蒙古、新疆、西藏懷有野心者，必然從「學術」研究開始，揆諸近代史可證此說不謬，日本外務省就聘「藏學家」青木文教為顧問，負責具體的對藏工作。

由上述日本對西藏之作為，係事後從日本文獻所載經整理後之資訊（見秦永章所著書《后記》），因此均詳實可靠，但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情報單位雖也注意到日本對西藏之覬覦，惟對日本實際作為，缺乏可靠

資訊來源，常將道聽塗說之傳聞，要駐藏辦事處注意查辦，如 1940 年四月，從蔣委員長侍從室得到「情報」稱：西藏駐汪精衛之國民政府代表巴丹米達取道印度孟買入藏，此人奉有汪政府之命，並攜有大批古玩及禮金三十萬元、活動費五萬元，企圖游說時為攝政之熱振呼圖克圖歸附南京汪政府，進而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驅離西藏¹⁹，侍從室將此「情報」轉發蒙藏委員會，其時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立即致電駐藏辦事處孔慶宗處長，蓋此事對蒙藏委員會而言絕對是一重大事件，果若此一情報屬實，而其謀又得逞，則前此自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圓寂，以至吳忠信入藏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與藏中僧俗高層斡旋交涉所成立之駐藏辦事處，一切努力都將付之東流，孔慶宗對此自然特為重視，但就既有文獻及所能看到之相關論著，均未見到駐藏辦事處對此情報之回應，頗令人費解。同年（1940）十月中統局情報人員查悉（按當時國民政府有兩大情報系統，其一為軍統局，另一為中統局，彼此並無隸屬關係，反而經常處於競爭狀態）：「西藏喇嘛姊沁吉澤仁榮增堪布自稱係後藏政府代表，來寧（指南京，時汪政府在南京）響應汪逆（指汪精衛）和平，現寓南京偽逆疆委員會內」，吳忠信獲知該情報後，於十月二十八日致電孔慶宗，指示駐藏辦事處查明並「傳達藏當局注意」²⁰，按後藏系班禪額爾德尼轄地，但自九世班禪大師因懼被十三世達賴所害，率重要徒眾於民國十二年（1923 年）十月十五日夜逃到內地，十三世達賴及噶廈曾派千餘藏兵追往攔截，但因班禪一行係操小路，躲過噶廈之追兵，始安全到達內地²¹，之後，十三世達賴及噶廈政府就派僧俗官員接管札什倫布寺及後藏各宗谿，九世班禪一直在內地弘法，前後受到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之優崇與禮遇，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在玉樹圓寂，因此其時（1940 年）根本無所謂「後藏代表」，當孔慶宗接到吳忠信電報，駐藏辦事處在藏「密查」後，電復蒙藏委員會稱：「姊沁吉澤仁想係流落北平之濫喇嘛招搖撞騙之徒，汪逆拉來捧場耳」²²，可見姊沁吉澤仁榮增只是流落北平之閑散

¹⁹ 見蒙藏委員會編譯室《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2006 年，頁 37~38。

²⁰ 同註 19 所引資料頁 40。

²¹ 詳細逃亡過程見劉家駒《班禪大師全集》，班禪堪布會議廳，1943 年，頁 36~37。

²² 同註 19 所引資料頁 41。

喇嘛，汪精衛政府加以利用，誣稱其為後藏代表，而民國政府中統局內無人知曉西藏普通概況，竟信以為真，所幸駐藏辦事處認真「密查」，此一騙局始予揭穿，可見駐藏辦事處人員雖少，處事能力並不低。

國民政府軍情單位得到不少此類假情報，均轉駐藏辦事處查辦，結果都屬子虛烏有。不過 1941 年六月，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張家口地區嘉隆寺的嘉隆班智達（喇嘛教習慣上對精通五明者，給予班智達美號）經過印度到拉薩，沿途頗受噶廈之照顧，按張家口地區嘉隆寺為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即一般文獻所稱之德王）所管轄，而德王已投附日本，組織「蒙疆政府」，因此孔慶宗懷疑嘉隆班智達之來拉薩，或與日本或「蒙疆政府」之欲聯合西藏有關，因此孔慶宗於七月三日與代理攝政打扎活佛商談劉樸忱墓地問題時（按劉樸忱係隨黃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後，與蔣致余留在拉薩者，其後病逝，故有商談墓地問題，劉氏係蒙藏委員會委員、總務處處長），特別提醒打扎活佛：「嘉隆自淪陷區來藏，恐其隨從有軌外活動」應「注意防杜，免礙藏局」（同註 19 所引資料頁 51），可見孔慶宗相當機警能夠見微知著，而且其「語術」也極技巧，只說「恐其隨從有軌外活動」，而不涉及嘉隆活佛，按嘉隆活佛在內蒙古喇嘛教具有相當地位，如說德王之蒙疆政府果真有聯藏以自我壯大之意，則其「密使」人選，非嘉隆活佛莫屬，孔氏不直指嘉隆而委之以「其隨從」，實為極高明之話術。

1943 年六月十四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親自致電駐藏辦事處，稱有情報顯示「敵在拉薩活動日益加厲，現已採取公開方式，拉薩哲蚌色拉寺皆雜入喬裝蒙藏喇嘛之日人二百人，以川島為首領導進行煽動，並與達扎擦絨進行協商前藏獨立問題，希能與日人合作夾攻雲南，以擺脫中央統治」（見註 19 所引資料頁 71），指示駐藏辦事處速予查證，若果真有二百個日本人喬裝成蒙藏喇嘛混比拉薩哲蚌、色拉寺，則確屬茲事體大，孔慶宗自不敢怠慢，經明查暗訪，於同月二十二日回電吳忠信委員長，表示對六月十四日電文「所稱各節，詳加探訪，均無實據」，而川島與達扎、擦絨協商一節，「亦未探得迹象關於哲蚌與色拉寺內潛入兩百名日本人之事，孔慶宗認為是日本「利用淪陷區少數僧俗造謠惑眾事誠有之，但迄未發現真正日人」，而且「現西藏積極親英，如該情報不虛，匪

特可被我方察覺，即英方亦難默爾……」（見註 19 所引資料頁 72），可見當時蒙藏委員會所發來的情資，大多失實，因此孔慶宗在回電中特別建議「此類情報應請轉飭原報人慎重注意」（見註 19 所引資料頁 72）。

駐藏辦事處以極少數之人，且均未經受過特別訓練來追查這類假情報，可說是疲於奔命，但也正說明當時駐藏辦事處確實是勳力從公，為國家做事，與前清之駐藏辦事大臣衙門絕不相同。而今（2017）蒙藏委員會已被裁撤，回顧此段歷史，感觸特深。

四、驅漢事件

十三世達賴自北京返回拉薩後，即開始親英，辛亥革命之後，更是一面倒向英國，因此噶廈高階官員也多親英，十三世達賴圓寂後，由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熱振對中央態度較為友善，也曾將若干親英分子逐出噶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乃得以成立，稍後更設立國立拉薩小學，嗣後熱振惑於流言，以蛇年不利，乃暫辭攝政，力薦其經師小活佛打扎出任代理攝政，自己則返回熱振寺閉關靜修，其待三年後重任攝政，但打扎昏瞶而貪婪，被親英群小所收買，清除噶廈中親熱振派官員，甘受英國擺布，一步步走向西藏獨立，遂認為中央在拉薩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有礙西藏走向獨立，必欲去之而後快，何況幕後還有英國在鼓動，其後印度雖告獨立，但甫卸下被殖民的枷鎖，立刻穿上帝國主義的袍服，雇用前英國駐拉薩代表黎吉生，為印度駐藏官員，繼續鼓動西藏走向獨立，因此自熱振呼圖克圖被毒害死亡後，西藏與中央關係日益疏離。

中華民國經過八年浴血抗戰，最後日本雖告無條件投降，但中國已是民窮財盡，且國共內戰又告登場，在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始終居於劣勢，英國籍印度官員黎吉生乃為西藏出謀劃策，鼓動西藏噶廈設立外交局，以種種卑劣手段逼迫駐藏辦事處向其非法之外交局接觸（關於此一部分上文已有提及，於此不贅），只要我駐藏辦事處與其外交局接觸，形同已承認其獨立之事實，所幸孔慶宗處長洞燭其陰謀，無論處境如何惡劣，為維護國家尊嚴與主權統一，堅不與此非法之外交局接觸，此也為噶廈向中央要求撤換孔慶宗原因之一。

國共內戰越演越烈，而且國民政府明顯居於下風，中共將全面席捲大陸已是指日可待，駐藏辦事處處境既艱困又尷尬，已經有好幾個月領不到

薪資，員工生活陷入困頓，據尼泊爾駐拉薩的代表所說，噶廈官員曾經詢問當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官員「是否願意接受共產黨的中國政府的資金時」，駐藏辦事處的官員「作了肯定的回答」，因而，噶廈懷疑他們「同情共產黨」²³，此一說法係由尼泊爾駐拉薩代表轉述噶廈官員的說詞，不盡可信，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稱：「國民黨以“學經”為名向三大寺和扎什倫布寺等派遣了很多漢藏混血兒的僧人特務，在拉薩市內也住有一些挂名商人的漢人。早就想借故把他們驅逐出去。」²⁴可見噶廈根本就是要將在拉薩的漢人「借故」驅逐出去，在拉薩的漢人當然包括駐藏辦事處人員，這與辦事處人員是否幾個月領不到薪水無關。真正想將駐藏辦事處人員以及在拉薩漢人驅離的原因，羅家倫明白指出：「印度最初是要防止中共的軍隊進西藏，所以要黎吉生策動西藏的叛變，以免中共借駐藏辦事處的機構，滲透進西藏去。」²⁵

黎吉生原是英國派駐西藏官員，英國殖民印度期間，即想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因此在西姆拉會議中，竟想將有藏人聚居之地區，仿放內、外蒙古之例，劃為內、外藏，殊不知蒙古地區原無內、外之分，分布於漠南者，蒙人習稱之為腹蒙古，在漠北者稱背蒙古，清朝崛起之初，先綏服漠南各部，及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將準噶爾部噶爾丹逐出漠北，漠北喀爾喀三汗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自動歸附中國清朝，比照漠南各部蒙古之例編設盟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從此始有內、外蒙古之名，如《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明載：「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為部四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因此內、外蒙古乃是法律名詞，英國妄想將有藏人聚居之地區（其中許多地區有更多其他民族聚居，如土族、蒙古族、羌族……等，而清朝崛起之初，大漠南北幾全為蒙古人駐牧之地，兩者絕不相同），劃分為內藏、外

²³ 見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115。

²⁴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27。

²⁵ 見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五），最初登載1950年，十月七日《中央日報》稍後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1），1971年一月，台北雲天出版社，上引文字見頁84，再後該文又輯入《羅家倫先生文存》，國史館，黨史會合編，1976年，該文列頁813~837。

藏兩部分，妄想將外藏（今西藏）從中國領土中分裂出去，其後印度獨立，卻繼承了英國帝國主義之思維，因此仍雇用黎吉生為印度駐藏代表，而黎吉生原本就是英國分裂中國西藏政策的執行者，既蒙印政府雇用，當然努力執行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政策。

1949 年（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中共建政已是指日可待，雖則情勢對中共有利，但黎吉生認為中共雖將取代國民政府統治大陸，諒其尚無力進入康藏地區，而國民政府終將失去大陸，也是必然的結局，此時將象徵國民政府主權及於西藏的駐藏辦事處驅離，此際乃是最好的時間點，一旦將駐藏辦事處逐出西藏，則西藏等於已實質脫離中國（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的中國），黎吉生不愧是老牌帝國主義者英國培植下的高手。由於中共聲勢日壯，建政在即，西藏地方噶廈中親英分子正陷入「為如何阻止共黨入藏而冥思苦想」，黎吉生表示「願意從多方干預和阻撓共產黨進入西藏」，於是與西藏外交局官員相互勾結、頻繁往來，「秘謀反華反共策略」²⁶，黎吉生對西藏外交局局長柳霞·土登塔巴、索康·旺欽次登說：「拉薩有許多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這裡，將來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並「說出了不少人的名字和住址」²⁷，攝政打扎宣稱：「印度駐拉薩領事館代表黎吉生近期向我透露內部情報時稱，目前中國政局不定，要趁此機會把漢人驅逐（出）西藏。因為時下拉薩不僅有平措旺杰（巴康人）這樣的共產黨間諜，而且國民黨拉薩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中也有共產黨間諜。否則，他們內外勾結，共產黨進軍西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要立即把漢人從西藏驅逐出去」²⁸從而可見所謂「驅漢事件」乃是英人黎吉生一手操導。

不僅如果，黎吉生更對噶廈宣稱：印度可接受三百名離職的國民政府

²⁶ 見夏札·甘登班覺《原西藏地方政府驅逐國民黨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前後》，頁 490，但此處係轉引自張皓《印度政府與 1949 年之噶廈驅逐國民政府駐藏官員事件》一文，此文刊載於《南亞研究》2016 年第二期。

²⁷ 見土登旦達《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前後》，文載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一，頁 20，但此處轉引自《南亞研究》2016 年第二期。

²⁸ 見噶雪·曲吉尼瑪《英國人黎吉生平涉我國內政唆使噶廈製造驅漢事件及我被貶黜始末》，文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期，但此處係轉引自《南亞研究》2016 年第二期。

官員（指駐藏辦事處人員）、漢商、漢喇嘛，更進一步將此三百個漢人身份分為以下四類：

- 1.中國共產黨人。
- 2.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國民政府官員。
- 3.其他中國官員。
- 4.其他中國公民。

黎吉生早就與印度當局套好招，新德里則稱「以避免給中國和其他地方產生這樣的印象：印度贊同了西藏（噶廈）利用中國當前局勢，謀取徹底擺脫中國勢力的明顯政策」，所以只同意接受第一、二類的漢人，不願意接受後兩類漢人²⁹，這根本就是黎吉生、印度政府、噶廈三方面事前套好招，要噶廈以防共為名，誣指駐藏辦事處中有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聯繫者，將予以懲處，須知西藏高層無論僧俗，「懲處」對手時，手段極為殘酷，如剜目、刖鼻、捏睪丸、下毒、剝皮……可說是名目繁多且無所不用其極，與西藏高層僧俗談我佛慈悲，無異對牛彈琴，如稍早，幾年攝政、噶廈對聲望隆崇的熱振呼圖克圖之「懲處」，駐藏辦事處人員不但耳有所聞，且曾親眼目睹，可謂知之甚稔，此時駐藏辦事處人員如承認是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所聯繫，尚有印度可去，如堅持自己只是中國官員或公民，與共產黨無關，則面臨被西藏僧俗高層懲處，求生乃是一切生物之本能，自然選擇逃往印度，如是噶廈對國民政府自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說辭，可以宣稱所驅逐的都是共產黨或與共產黨有聯繫的漢人；而印度則以收留被西藏驅逐的漢人，既符「人道」精神，又討好了即將建政的中共，黎吉生這一招可說是刀切豆腐兩面光，一石兩鳥，老牌帝國主義所培養的爪牙，果然不同凡響。

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在黎吉生指導下，早就下定決心要將駐藏辦事處及在拉薩的漢人驅逐出境，黎吉生將駐藏辦事處官員、在拉薩漢人（西藏小學教職員、商人、喇嘛）與共產黨聯結起來，這使得噶廈將反共與反漢混為一談，除了彰顯西藏獨立，為了反共，必須將駐藏辦事處驅逐出境，在1949年三月的一次噶廈會議中，達成此項決議，並且認為此事「關係西

²⁹ 譚·戈倫夫著《現代西藏的誕生》漢譯，頁114。

藏政教安危，務必嚴守機密」³⁰，在最終宣布「驅逐」之前，噶廈政府中知道此一計畫並直接參與的官員，只有噶倫、孜本和仲譯欽莫等十二人，為嚴格遵守攝政打扎的保密指令，這十二位官員，「都在噶廈非常神聖的綠松石佛像前發過誓」，保證對此事嚴格保密³¹。

至於選擇在 1949 年七月八日通知駐藏辦事處處長陳錫章必須在兩週內全部離開，有人認為此一日期選擇與噶廈政府希望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靈童，能在班禪堪布會議廳所選定的宮保慈丹之外，增加噶廈所尋訪的另一靈童掣籤決定，換言之，噶廈想操控九世班禪轉世靈童人選，但青海、內蒙各界一再請求國民政府確定宮保慈丹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真身，其時（1949 年夏）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但仍堅持達賴、班禪轉世靈童之認定，係中央之權限，不容許噶廈操作，遂決定以宮保慈丹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真身，並決定在 1949 年八月十日於青海塔爾寺坐床，由中央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坐床大典³²，因此噶廈選擇七月八日通知駐藏辦事處於兩周離藏，以為報復，此說³³雖頗新穎，但未必確實，按噶廈在黎吉生教唆下，走向西藏獨立，而國民政府又無力加以阻止，與班禪轉世靈童之認定、坐床、關聯不大，不過其選擇宣布驅逐日期，或許與國民政府宣布十世班禪坐床日期有關，仍具參考價值。

一般文獻對於噶廈政府強迫蒙藏委員駐藏辦事處人員、國立拉薩小學教職員、電台、醫院及在拉薩漢商事件，也就是所謂驅漢事件，大多語焉不詳，其時任中華民國首任（其實也末任）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先生曾接待被驅離藏的駐藏辦事處代處長陳錫章一行，陳錫章必然會將被驅離的原因及經過情形，向羅家倫詳細說明，羅家倫曾於次年（1950 年）以《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一文，詳敘驅漢事件的來龍去脈，刊登於 1950 年十月七日中央日報（請參見本文註 25），茲將之引錄如次：

³⁰ 同註 28 所引噶雪·曲吉尼瑪所撰專文，但此處係轉引自趙崇榮、鄒敏《論述 1949 年噶廈對國民政府駐藏官員的驅逐》，文載《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四期。

³¹ 見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漢譯本，下冊 520~522。

³² 關於九世班禪轉世靈童之認定及噶廈欲加以操作詳情，可參見拙撰《從一件西藏噶廈公所致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函底稿，看 1948 年秋西藏地方與中央關係》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211 期，2017 年九月，中國邊政協會。

³³ 見註 26 張皓所撰之文《南亞研究》2016 年第二期。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西藏的變亂起來了。那天「噶夏公所」(就是西藏的內閣)最後決定將中央駐藏辦事處和其他一切中央機關在拉薩的人員趕走。那天下午西藏內閣的要員請駐藏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章去談話，告訴他噶公所的決定。說是凡是中央軍政人員所到之處，就是將來共產黨所到之處，西藏方面現請駐藏辦事處、學校、電臺、醫院及其他有重大嫌疑之人(按此指國防部人員)一律限期出境。當即把中央電臺加寺，不許對外通電，也不許他們向中央請示。七月十三日第一批人員離拉職。十八日黎吉生居然為陳錫璋餞行，十九日陳等向達賴辭行，二十日他們帶著悲痛的情緒離開拉薩。這個事變從八日起至二十日止，都經守住了絕對秘密，印方的電報機關也不讓任何中國人從拉薩和印度互通電報。這消息於二十一日傳到新德里大使館，我在得到相當的證實以後，立於七月二十三日訪問梅農外次。我事前教參事告訴他是為拉薩叛亂事件去和他談話的。梅農承認他收到拉薩的電報，說是西藏方面認為駐藏辦事處的人員之中，有共黨份子，已令其出境。他再重複一句話：「來電中確切說有共黨份子。」我當時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多年以前派去拉薩的，其中絕無共黨份子。萬一有一兩個也不應該牽涉全體，梅農外沉重的說「我們全體外交部都在憂慮，加爾各答的共產黨已經夠多了，再來這些中國共產黨，我們真不知道怎麼辦，只要他們能立刻走，我們印度政府願意給他們通行。」他的意思很為明顯，就是印度為了要幫助西藏，並且要討好西藏，去完成這件工作，所以不惜咬定這些在藏人員都是共產黨員，而不讓他們在印度停留，以免除西藏覺得還有後顧之憂。其實當時西藏驅逐中央人員的理由是恐怕有中央機關和人員在西藏，萬一中共勝利之後，會派員來接替，以致引共產黨的勢力進西藏，却並不曾說現在中央在西藏的人員都是共產黨員。事後把兩方面的話核對起來，顯然是印度要用這個藉口不讓中央人員在印度停留，以消除他們重新回到西藏的機會罷了。我為了這件事非常悲憤，所以在二十五日發表

一個談話，說明辦事處人員絕非共產黨，「要在過樣的高原上釣大海紅魚（“To fish red herring on such a high plateau”，筆者按「過樣」應為「這樣」之誤）的辦法，不但是太天真而幼稚，在政治上何等的不聰明。」這一句話當時不但為印度並且歐美各報紙用顯明字體標明出來，表示他們的欣賞，可是我始終不能說服胸有成竹的梅農先生。不但第一次的談話和這次的書面談話不能說服他，以後還有兩次正式的會談，也同樣沒有效果，當即遣派秘書赴噶倫堡邊界上迎接由西藏退出來的人員，於八月底我自己飛加爾各答和他們會晤，並且代表國家給他們一點小小却是很悲痛的安慰。於九月初我把他們送上掛著中國國旗的招商局的海地輪船，放洋回國。我和他們在船上握別的時候，於一把酸辛眼淚之中，大家重新振作精神，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三聲，然後說「再見！再見！」

我在加爾各答的陳錫璋處長和其他人員分別話談中知道這事變發生的時候，黎吉生在拉薩非常活躍，印度商務專員公署有門庭如市之概。黎吉生到現在不過四十餘歲，精力飽滿，雄心勃勃，若是他生在一百年以前，他可能是克萊武（Clive）哈斯丁（Hasting）一類的人物，建立奇功，封侯拜將。可惜他生在現在，做一個印度政府下的商務專員未免太委屈了！有人說，黎吉生是英國人，可能他是為英國做的。說這話的人却忘記了黎吉生是秉承印度政府意志並且是被印度政府雇用的一個中級公務員呀！

在西藏事變發生以後，印度即行派收錫金和統治錫金的行政專員達雅，冒了嚴寒，前往拉薩，住了幾個月。其確實任務，不得而知，據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在拉薩非常活躍，其商談的問題之中，最重要的是劃界問題，想趁西藏政府徬徨的時候，商議一個邊界的協定，可以撈摸一批。至於結果如何，要等將來才能清楚。」

按羅氏當時係我駐印大使，而羅氏本身也是一位學者，其所言自有其可信度，則黎吉生為西藏出謀劃策，其終極目的是為印度謀奪中國的領

土，一個曾經被英國殖民一、二百年的印度，剛卸下被殖民的枷鎖，卻立刻被上帝國主義的外衣，竟想謀奪中國邊境的領土，而西藏代理攝政打扎及噶廈只不過是被黎吉生操縱的傀儡而已。

五、結語

1949 年七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的驅漢事件，完全是帝國主義餘孽黎吉生一手操導演出的醜陋行為，黎吉生既蠱惑西藏獨立，因此鼓動西藏僧俗高層反漢，乃是必然之作為，既是反漢，當然不分國民黨（黑漢）、共產黨（紅漢），都在反對之列，以往均將 1949 年西藏噶廈驅逐駐藏辦事處人員稱之為驅漢事件，惟近年來大陸學界多將之窄化為「1949 年噶廈驅逐國民政府駐藏官員事件」，此種改變自有其政治含義，這可能與十四世達賴近年對藏獨言論有所收斂，如 2017 年六月二十三日，達賴在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演講時重申圖博不會尋求獨立（按「圖博」即 Tibet 之音譯，而 Tibet 又係吐蕃特、圖伯特之音譯，歸根究底，圖博就是兩《唐書》上的吐蕃，仍然是中國既有之詞稱，詳見劉學鈔《藏族源流蠡測》蒙藏委員會，1987 年）³⁴，而北京當局又強烈反對達賴「竄訪」各國，如此間媒體刊載北京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就表示：十四世達賴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人物」，強烈反對達賴「竄訪」各國³⁵，以今日中共的經濟實力，有心邀訪達賴的國家，自會加以衡量，另據「德國有一項研究首次發現，中國（指中共）崛起後，進出口貿易有所謂明顯受政治影響的『達賴效應』，西藏精神領袖一旦獲某國領導接見，之後該國對中國出口額減幅平均達 8.1%」³⁶，這還是 2010 年的情況，而今（2018 年）中國大陸經濟力量又增大了許多，所謂「達賴效應」，必然也更為明顯，經濟是最現實的，各國自然會權衡得失，因此十四世達賴「竄訪」各國的次數越來越少，而且他春秋也越來越高，是否適合頻繁的長途旅行不無疑問，換言之，他的路是越走越窄了，只得放軟說話語氣，他於 2017 年十一月在印度達蘭薩拉與不同團體會晤時說：他確信中國慢慢改變……他的目標始

³⁴ 見台北 2017 年六月二十三日《自由時報》A2 版。

³⁵ 見台北 2017 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A5 版。

³⁶ 見台北 2010 年十一月五日《聯合報》A25 版。

終是讓西藏擁有自治權來延續西藏文化，而非獨立³⁷，儘管這一段話言不由衷，但至少語氣放軟了，同月二十四日，達賴在印度加爾各答商會舉行的一場研究討論回答提問評論西藏與中國關係時表示：西藏不尋求脫離中國獨立³⁸，如果這句話是真的，他應該先澄清之前說過無數次「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說法是假的，而且絕口不提《西藏流亡藏憲章》前言中《為了將西藏三區建設成為民主、聯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國家與和平中心》因此他所說「西藏不尋求脫離中國獨立」，只是隨口應答，聽聽就好。再看另一面，中國大陸 U20 足球選拔隊此前在德國西南地區聯賽進行友誼賽時，有觀眾（很可能是流亡藏人）在看台上拿出代表藏獨的雪山獅子旗³⁹，可見達賴是說一套做一套，想以此混淆視聽。

另據印度媒體稱：達賴派特使訪中，其內容為：「印度新聞網站「連線」（The Wire）報導，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似乎已派曾任西藏流亡政府總理的桑東仁波且，低調訪問中國雲南昆明，此行始自十一月中旬，其中必定曾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密友、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尤權協助。達賴本人十一月二十三日並聲明：『過去就讓它過去，藏人想跟中國人在一起』。該報導認為，以前中國領導高層均阻礙達賴欲回到西藏的心願，但這次顯然可能會有結果。」⁴⁰此種看法太以樂觀，按大陸早在鄧小平時代就確定只要達賴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一部分，放棄西藏獨立，是可以回到大陸，但不是回到西藏，而是在北京，會授予適點職位，如人大副委員長之類；在江澤民時代，對於達賴之返回大陸除上述兩條件之外，又加上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今達賴除了口惠實不至的宣稱西藏不尋求獨立，其餘兩條件均隻字未提，而且是希望回到西藏，試想習近平豈有答應的可能，在美國的大陸學者胡平就明白指出：「習近平在西藏問題上更狠」，不認為中共當局要啟動和談（見註 40），這種看法應較正確，但印度「連線」卻認為「習近平如今發現，在解決西藏問題上，他處於過去的中國領袖從未有過之絕佳地位，他亦認為，一旦達賴去世，解

³⁷ 見台北 2017 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紀元報》A3 版。

³⁸ 見台北 2017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旺報》A12 版。

³⁹ 見台北 2017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國時報》A10 版。

⁴⁰ 見台北 2017 年十一月十日《自由時報》A9 版。

決此一問題的可能性將逐漸消失……」（同註 40），這種看與中共以往主張不大相同，中共一向認為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問題，可見印度對中共的認識不夠深入，從既往半個多世紀來看，達賴本身就是一個亂源，一旦圓寂，在喇嘛教圈中，班禪就成為最大的活佛，依照格魯派傳統無論十四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大陸或海外覓得，都得認十一世班禪為師，設若十四世達賴不轉世，則班禪將成為喇嘛教格魯派唯一大活佛，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豈會認為「一旦達賴去世，解決此一問題的可能性將逐漸消失」，顯然印度媒體對西藏喇嘛教傳統習俗也不甚了了，倒是國際問題專家史托布丹（P. Stobdan）指出：「流亡藏人與中共間的關係迅速變化，攸關印度切身利益，若流亡藏人與北京達成協議，印度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就會被嚴重削弱」（見註 40），這段分析倒接近事實，早期流亡藏人中的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解散後，多編入印度邊防軍，其第二、三代及一些流亡藏人也加入印度邊防軍，由於先天體質因素，流亡藏人能適應喜馬拉雅山區的特殊氣候與崎嶇地形，一旦十四世達賴、流亡藏人真得與中共妥協和解，回到大陸，則那些投身印度邊防軍的藏人，就可能離開印度邊防軍，這對印度而言，是不可承受的重，印度是否願放棄已經豢養了半個多世紀的達賴及十幾萬藏人，讓他們返回中國大陸，不無疑問題，而美國玩達賴牌也玩了幾十年，想來絕不肯輕易放手，十四世達賴之能否返回大陸（不是西藏），其中充滿了無限變數。

達賴最近之所以一再表示，尋求與中共和解，希望能返回西藏，如 2017 年十一月底西藏流亡政府主要負責人，日前在紐約出席「2018 年藏漢聯誼新春酒會」活動時，再度傳遞了達賴希望返回西藏的願望，以及流亡藏人不反中國和漢人的和解訊息⁴¹，其所以如此表態，原因可能為：歷輩達賴都在藏地圓寂，世上縱有靈魂不滅之說，絕無肉身不死之例，十四世達賴始今已是高齡八十有四（虛歲），在歷輩達賴中最稱長壽，希望未來能圓寂於坐床之地，始稱圓滿，此乃極自然之事，因此希望能與中共和解，始能返回西藏；其次，近年以來，美、歐、日各國對達賴之支持，不如以往之熱絡（此與中共之崛起有密切關聯），「達賴牌」在國際政治上邊際效應正在遞減之中，媒體寵兒角色不再，為喚醒美、歐、日各國注

⁴¹ 見台北 2017 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A9 版。

意，乃拋出願與中共和解、返回西藏之震撼彈，以期引起美、日、歐之重視。此種推測是否有當頗值各界討論。

由於十四世達賴近年一再表示不追求西藏獨立，願意重返西藏，較之前些年始終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恣態確實放低了許多，因此近年大陸學界也把 1949 年的驅漢事件，窄化為驅逐國民黨政府駐藏官員事件，顯然是在營造達賴或其流亡政府與中共和解有利條件，是耶？非耶？有待各界批評指教。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好看的花草勝過壁毯，聰明的百姓勝過愚蠢的可汗。（哈薩克族）

勇士和群眾在一起，罪人和法庭在一起。（哈薩克族）

兩座大山雖不能相遇，兩國人民卻可以相交。（哈薩克族）

山眾多的地方，河流總是奔流不息；群眾多的地方，智慧總是層出不窮（柯爾克孜族）

一個人不會有什麼力量，真正的力量在群眾之中。（維吾爾族）

老百姓不多說，說出來不會錯。（維吾爾族）

群眾的怒火，誰也無力把它撲滅。（維吾爾族）

有村莊，必有田地；有地方，必有首領。（黎族）

一群羊，進園子，總有一個帶頭的。（傣族）

籬笆不打樁就倒塌，士兵無統帥就渙散。（布依族）

見了壞人要拔刀，見了野獸要放炮。（景頗族）

幹部敢上山，群眾把山搬。（壯族）

一根羊毛拴不住一匹馬駒子，九條鐵鏈鎖不住一個奴隸心。
（彝族）

斷氣的雞還要蹬兩下腿，受官家欺凌豈能不動刀槍。（白族）

髮亂找梳子，心亂找朋友。（苗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清代盟旗制產生、作用和現代意義¹

吳楚克

盟旗制是成吉思汗創立的蒙古萬戶制與滿州八旗制混合而成的一種政治制度，是清朝初期統治者為籠籠蒙古各部而實施的有效統治策略，清順治五年開始逐步成為蒙古地區普遍實施的政治制度。據清代蒙古史專家達力紮布研究認為：“清代外藩蒙古會盟始於天聰三年，順治九年形成內紮薩克六盟會。康熙年間將會盟制度推行於漠北喀爾喀，雍正、乾隆年間又推行於青海、新疆蒙古各部。”²

蒙古“萬戶制”是最適合遊牧封建帝國的軍事組織制度，以百戶、千戶到萬戶這樣的層級結構，適應快速組織分散的遊牧部落家庭，並不會嚴重影響日常的單獨的遊牧生產生活。因為，遊牧生產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需要獨立的放養畜群，太靠近或者畜群太大，特別是馬群，都會增加相互間的競爭，從而導致畜群品質、數量下降，最終導致經濟收益下降。但另一方面，規模較小或者相對孤立的遊牧部落容易受到其他部落的攻擊，這也是古代蒙古草原上經常發生劫掠和部落戰爭的原因。所以，流動的草場和遊牧邊界是幾千年來遊牧經濟的“矛盾統一體”：這種生產方式需要相對廣闊自由空間，但又不能完全孤立單幹；遊牧組織的規模受制於牧地和畜群，但人口和馬的數量是決定因素；遊牧產生的產品滿足生存需要沒有問題，但提高生存品質卻需要跨行業產品交換。因此，出現強大的遊牧封建帝國是蒙古草原遊牧經濟發展到成吉思汗時代的必然要求：盡可能地擴大遊牧邊界，同時明確每個遊牧單位的層級管理制度，並明確管理層級的犒賞數量和獲取戰利品的權利。蒙古帝國時代的“萬戶長”制度爆發出的巨大戰鬥力寫就一部“世界征服史”。符拉基米爾佐夫也認為：“在成吉

¹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邊疆學原理研究”（AZD0019）前期成果，主持人吳楚克

² 達力紮布：《清代蒙古史論稿》，131頁，民族出版社，2015年出版。

思汗帝國的這些基本單位即‘千戶’形成之際，蒙古氏族、部落分支和部落的這種混合，對氏族制度是有十分重大影響的，氏族制度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劇烈的變化與消失。”³那些大的氏族部落，如塔塔爾、蔑爾乞惕、乃蠻等被分解離散，這是蒙古遊牧封建帝國強大的制度原因，也是封建集權制度之於氏族部落制度的進步。北元以後，蒙古政治制度趨於分裂和倒退，雖然經過幾次統一戰爭，但到滿州八旗興起之時，蒙古以族姓為代表的部落制度卻重新佔據統治地位，內部爭鬥和分裂加重。在此種情況下，後金政權對蒙古各部採取軟硬兼施、各個擊破的攻勢，蒙古諸部歸附並接受盟旗制就是必然。

滿州八旗與蒙古“萬戶制”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從時間上講，滿州八旗受蒙古帝國“千戶”制影響，即基於人口和兵丁構成不同旗色下的軍事政治組織，這種類型的組織結構本質上是遊牧生產方式的自然結果，就是圍獵過程中在不同旗色指揮下有效組織各類人馬各司其職、各盡其能的生產活動，儘管滿族不完全是遊牧民族，但當時滿族深受蒙古文化影響，滿族貴族大多會蒙古語，他們領受了蒙古帝國時代戰鬥力和號召力的影響，史載努爾哈赤曾講：“蒙古與吾兩國，語言異而受服制、各項風習皆似一國”⁴。從地緣上講，蒙古“萬戶制”普遍推廣，根本目的在於軍事，在長年的戰爭和地域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萬戶制剝奪了生產組織者的利益，讓部落民眾失去對中央集權的崇拜，轉而尋求部落內部的安全性。滿州八旗既是軍事組織，更是政治組織，從努爾哈赤肇始“八王共治”，到後來八旗呈“幾何級數”進行結構演變，完全符合政治體制的延展性，比如滿州八旗的每一旗下，隨著人口和兵丁的增加，又分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添為二十四旗。克服了地域限制，實現了政治結構的普遍適用性。從制度上講，滿州八旗由基層組織“牛錄”演化為更大規模的“固山牛錄”，到“旗制”，有一個制度發展演化過程，這是滿族民族自身政治實踐與周邊其他民族統治經驗的總結，但並沒有把這種制度在所有統治地方推廣實施。比如，在蒙古地區推行盟旗制，新疆實施“伯克制”，在西南

³ 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175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年版。

⁴ 《滿文老檔》（太祖卷 13），四年十月記事。

少數民族地區承續“土司制”，總之，“因俗而治”從順治開始就是一個明確的國策，這也是滿族作為一個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並穩固統治的必備之策。

任何歷史重大事項的出現都不是巧合，而是歷史轉捩點的聚合。蒙古地區經北元逐步走向分裂，其內部的部落制分割日趨嚴重，難以形成統一的趨勢和勢力，然而，藏傳佛教的傳播，在政治上維繫了蒙古民族的宗教認同，在精神上也維修了長期戰亂滋生漫延的殺戮氣氛，在文化上維持了蒙古民族的傳統內容。在此時刻，後金政權的強勢出現首先對蒙古東部地區產生影響，滿族統治集團也充分意識到必須依靠蒙古勢力才能實現逐鹿中原的夢想。從開始滿族統治者就對蒙古地區和民族狀況有準確的認識，據清太祖言：“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各部落，合則成兵，其散猶雨收雲止也。”⁵應該說這是早期滿族統治階層對蒙古社會的認識，因此，充分利用“分而治之”治理制度和控制“活佛傳世”的宗教策略，既迎合了蒙古部落內鬥導致離散態勢，又滿足了“同宗同教”的認同意識，成功促使蒙古各部落先後歸順清朝政府，當然，聯姻和身份待遇方面滿族統治者給予蒙古貴族極高禮遇。

“會盟”原本是蒙古遊牧民族政權施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蒙元時期把“會盟”稱作“忽裏台”，後金、清時期稱作“楚固蘭”。在北元和明後期，蒙古地區群龍無首，“會盟”有形無實。天聰三年（1629）正月，科爾沁土謝圖汗奧巴來朝表示順從之後，清太宗借勢派遣大臣與科爾沁十個執政台吉會盟，議定和頒佈了有關出征、驛遞及審案等方面的規定。這是有關史料記載的滿清政權主導下的蒙地部落正式會盟，此次會盟還以立法的方式規定了對會盟時間地點職責的管理。此後，“鑒於蒙古各部居住分散，後金（清朝）沿用蒙古原有的楚固蘭形式，通過派遣大臣如今各部首領集會處理政務，如頒佈詔令、議定法規、比丁、審理案件等，清代稱之為會盟。”⁶在清朝定都北京前，清廷與歸順的蒙古各部進行了三處會盟並議定每三年會盟一次，即是後來的哲裏木盟、烏達盟、卓索圖盟的雛

⁵ 《東華錄》，天命四，第20頁，轉引自李毓澍《蒙事論叢》，第4頁，1980年臺灣出版。

⁶ 達力紮布：《清代蒙古史論稿》，92頁，民族出版社，2015年出版。

形。還規定外藩接待欽差大臣的禮儀、會盟地點和選派盟長，會盟由大臣主持，處理外藩蒙古各項事務。清太宗時期，會盟制度已初步形成，但由於此時戰事頻繁，會盟的時間和地點沒有固定。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十的《理藩院尚書沙吉達喇等題請察哈爾等十一旗於固倫額附阿布鼐處會盟本》，又提出三處會盟，即後來的錫林郭勒盟、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察哈爾蒙古始終單獨會盟。康熙三十年（1691），喀爾喀蒙古部來歸，清廷令歸順的蒙古各部會盟於多倫諾爾。乾隆十五年起，會盟一般由盟長主持，中央政府不派遣欽差大臣前往。

總之，清代外藩蒙古會盟始於天聰三年，順治九年形成內紮薩克六盟會。康熙年間將會盟制度推行於漠北喀爾喀，雍正乾隆年間又推行於青海新疆蒙古各部。其作用主要從以下幾點來看：

其一，結交了一個打江山的“鐵杆盟友”。滿蒙結盟是滿族能夠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的必要條件，沒有之一。無論從人口、軍事實力、後方資源和領土面積方面，蒙古人的加入才使滿族政權登上中國歷史舞臺。但是，如何把“散雲彙聚成雨”？把離散的蒙古各部落凝聚起來同時又能服從滿清政府？這無疑是擺在努爾哈赤及後繼者們面前的一個世紀難題。從哪里入手開啟滿蒙結盟？顯然，會盟是最佳選擇：一是滿足了滿蒙“同根同源”說，這種政治策略和施政方式是蒙古人完全接受的。二是滿足了歸順蒙古部落內部要求統一的訴求，因為，歸順滿清政權就是要獲得安全和利益保障，會盟後，盟內各部落不得反悔，盟外有清中央政權保護。三是會盟制定各項規定和條例，組織比丁，審結案件，調解牧界糾紛，使加入會盟各部得到整備，局部獲得歸屬和安全感。

其二，早期推廣和編制旗制並最終形成盟旗制。會盟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給盟內各族姓部落編制旗制，依照滿州八旗制度，在外藩蒙古編制紮薩克旗。這是滿族統治者把歸附蒙古部落作為“一家人”看待的做法，滿州八旗實質就是“內藩”，蒙古八旗當然就是“外藩”。蒙古各部落在蒙元帝國時期編制，按照王公、貴族封地冠名，也有世傳族姓冠名，還有依照地理位置和特徵冠名。清統治者在早期會盟中，把這些部落組織通過“編旗”的方式固定在“盟下”，旗內原來的王公貴族台吉均領受相應紮薩克官職或者封賞，早期選出的臨時盟長被稱為“大紮薩克”，後來逐步

被指定和承繼下來，這就是盟旗制。一是蒙古部落結構幾乎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盟旗制，王公貴族階層利益得到保護，社會調動效率得到提高。二是蒙古上層很快與滿族社會內部形成聯姻，直接進入統治集團，盟旗制把滿蒙聯繫起來。三是旗的編制特點和管理方式適應蒙古民眾的遊牧生產特點，他們習慣來自“縱向的”部族內部的律令和管轄。

其三，盟旗制維護的是滿蒙統治階級利益，因而，兩個民族的利益便成為矛盾的交匯點。一是早期蒙古統治階級基本把滿清王朝的利益認同為自己的利益，所以竭盡全力支持清王朝統一全國，平定叛亂。很多蒙古王公貴族子弟通過聯姻進入統治集團，當然聽命於朝廷。二是所屬旗遭遇不公對待，利益分配不均時，“盟”會把矛盾轉嫁到中央，或者所屬旗直接訴諸於理藩院。理藩院的出現就是避免蒙古地區出現的矛盾衝突上升為兩個民族的矛盾衝突，控制在民族內部解決。也就是說，一些盟不能很好地解決旗之間和旗內部的矛盾，因為“盟長”本身也來自於一個“大旗”，導致盟的政治地位本身是虛弱的。或者說在中央和旗之間，盟的作用是上傳下達、組織兵丁、審結案件等，沒有內地省的權利和執行力度。這就是為什麼到清代後期，盟的行政作用和管理力度幾盡喪失，真正有盟長權威的大紮薩克少之又少，而旗的行政作用和管理依然存在。

其四，蒙地放墾與移民實邊的結果是漢族人口增加，漢族人口增加的結果就是實行縣制，縣制與旗制出現衝突就是必然。問題在於，當滿清統治階級的利益與主體國民漢族的利益存在矛盾時，這個矛盾本身兼有民族矛盾，結果必然是第三方民族利益損失。清朝晚期蒙地放墾依然是從最早歸順清王朝的那些旗地開始，因為這些旗的王公紮薩克與朝廷關係依然密切，而且距漢地較近。蒙地放墾的結果是引起蒙民暴動，蒙漢民族矛盾加劇。在清朝滅亡的諸多因素中，不得不注意到清後期蒙古族與滿族的疏離，喀爾喀蒙古與俄羅斯早期接觸，就內部原因來看，就存在潛移默化的民族分離的動因，當然，清政府對待喀爾喀哲布尊丹巴的態度也是引起喀爾喀蒙古上層疏離中央政府的原因之一。

關於盟旗制的歷史作用，上述觀點只是挂一漏萬，也異於通常的歷史研究。不過，如果以為這只是當下大陸學者的看法，那就錯了。臺灣著名蒙古史學者張韜 1968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蒙古問題新認識》一書，

在該書第 7 章第一節“滿清對蒙政策的檢討”中，他提出清朝對蒙政策的成就處：“確立盟制，統一政令。北疆地區遼闊，蒙胞的部落又特別多，因系游牧習性，遷徙不定。又因利害衝突，造成相互殘殺，爭戰不已。自清聖主於 1691 年駕幸多倫，大事會盟以後，外蒙各部的可汗，均被封為王、公、貝勒等爵位，聖主並仿照內蒙的參佐制度，編審壯丁。而滿州八旗制度，乃在蒙疆普遍推行。隨使散漫的游牧部族，有了統一的固定編制，對於蒙區政令統一，也是極大的貢獻。”⁷整整 50 年前他的觀點今天看來依然合適，儘管當時雙方立場“敵對”，但在認識蒙古問題上，我們當時是錯誤的。

2014 年 7 月臺灣著名邊政學者劉學鈞出版《外蒙古問題新論》，他在前言中說道：“人是屬於土地，而土地人不屬於人。這是探討民族與土地的基本認知，所以說某地屬於某族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論。”⁸80 多歲的劉學鈞教授長期任職已被臺灣蔡英文當局裁撤的蒙藏委員會，他對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相當認知。就他的觀點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對我們在反思盟旗制的現代意義深有啟發。

首先，必須充分認識清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性質，這是很多問題的根源。滿族在處理與北方少數民族關係方面有特別的優勢，集中體現在滿蒙關係，而滿蒙關係又決定了蒙藏，也主導了新疆各民族的關係。因此，滿蒙關係是解開當時民族矛盾的一把鑰匙，早期滿族統治者對爭取蒙古族結成同盟關係有充分的清醒的認識，除了宣揚“同根同源”外，在政治制度上以盟旗制籠絡歸順蒙古各部，順應了當時蒙古民族部落關係與民眾關切。今天解決少數民族問題也存在這樣一把鑰匙，正如習總書指出：“治國先治疆，治疆先穩藏”，是解決北方民族問題的指路明燈。

其次，實施盟旗制的核心是最高統治集團的指令與任命，依然是“縱向治理”關係，關鍵是會盟所要完成的任務卻是由當地王公貴族紮薩克共同協商議定，後期會盟的核心任務是註冊比丁和操練軍隊。把蒙古強大的軍事實力始終保持在備戰狀態，既滿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也適應了蒙古民族的特徵。清中後期，新軍出現，使蒙古實力在滿蒙關係中的比重下降，

⁷ 張韜：《蒙古問題新認識》，207—208，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出版。

⁸ 劉學鈞：《外蒙古問題新論》，1 頁，臺灣南天書局，2014 年出版。

漢族勢力在朝政中居主導，滿蒙關係出現不平衡。這是一種由客觀事實引導的發展趨勢，滿族統治者事實上處於被動方，漢族統治集團逐步成為決定事態發展方向的勢力，蒙古族也在被動中尋找出路。旗制與縣制的比拼中，勝者最終是人口居多的一方。所以，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旗依然是比縣好，儘管本質是一樣的。很多問題原本是習俗範圍，但執行政治制度的僵硬教條往往把事情引向政治對立。

其三，盟旗制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旗”，這是一種軍事備戰組織制度。旗下最基層組織是每 10 個旗丁分一組，凡男子 18 歲以上 60 歲以下者為適齡旗丁，即被納入名冊，每三個旗丁發給一套馬甲（軍服），如遇征戰調遣，兩旗丁參加調遣，一旗丁留在家中負責管理所屬旗丁的家庭責任。每十旗丁設一“牛錄額真”，類似班長；三十個班編一佐領，為一“牛錄”；每五個佐領合成設一個參領“甲喇額真”；五個“甲喇額真”設一個“固山額真”並設“梅勒額真”二人輔助。類似班、營、團、師的結構。據信清王朝時期在內、外蒙古共編制 197 個旗⁹，接近兩百個師的可動員兵力，這絕對是盟旗制的主要作用。但是，長期在旗制下，蒙古民眾的生產和生活發生變異：一是以出家當喇嘛脫離旗丁身份，這也造成男丁缺乏，客觀上助推寺院規模。二是無論是旗丁還是出家，都對男性勞動力的直接佔有，剝奪有效勞動力數量，導致蒙古社會生產凋敝，人口下降。三是盟旗制封賞的盟級官員還是旗級官員，事實上都處在國家制度範圍內的低級階層，單純在蒙古地區封閉和保守的情況下，好像還是王公貴族貝勒，但在整個國家統治範圍內，蒙古上層的地位不斷下降，這激發了蒙古各階層保守傾向的發展，反對放墾和移民，實質是對滿清統治階級的不滿。把盟旗制推向蒙古利益的象徵。所以，根本問題不在盟旗制，而在於民族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其四，根本上講，沒有所謂歷史的成功經驗或者失敗經驗，因為歷史只是按照已經發生的軌跡向前運動，對沒有運動的前方的任何預測都是預言，而且，回首以往歷史我們就會發現那些成功經驗在後來某個歷史過程被證明是失敗的前因，而那些失敗經驗同樣在某個歷史過程中被證明是成功的前因。盟旗制即是如此！撤盟置市還是撤旗置縣都應該順應歷史發展

⁹ 張韜：《蒙古問題新認識》，261—262，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出版。

的正常要求，不是刻意創造政績或者違背廣大民眾願望，就應該是好事。所謂經得起歷史考驗，就是百年以後，證明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憲法一二〇條有關西藏自治條文背景分析

劉學鈞

前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摘 要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二〇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據此項條文，似乎給予西藏任何一種程度之自治，概屬合憲，但其制定過程相當曲折、複雜，本文擬就自西藏國民大會代表之產生，到南京與國民政府交涉經過，加以分析。

關鍵詞：制憲國民大會、西藏自治制度

前言

自遜清末造以至民初，內則由於國力萎靡不振，外則英國蠱惑，而十三世達賴野心勃勃，於是西藏有攜貳之心，民國二年（1913 年）且與外蒙古簽訂所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為「獨立國家」，公然背叛國家，北洋政府對之莫可奈何，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國家統一，前景呈現光明，十三世達賴對中央稍有畏懼之心，對派往西藏之劉曼卿女士乃予以接待，十三世達賴也數度與之接談，對中央之態度略有改善（關於劉曼卿入藏詳情可參見其所著《康藏軼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且在首都設立西藏駐京辦事處，雖則如此，英國對西藏之蠱惑誘煽，未嘗稍減，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曆水雞年十月三十日），十三世達賴於羅布林卡格桑官附近之寢殿琪美喬基臥室圓寂，得五十八歲，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依清以來之定制，由其駐京辦事處向蒙藏委員會報喪，並請轉呈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立即呈報

行政院，國民政府對此至為重視，除追贈十三世達賴以「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外，並將派大員入藏致祭，以示崇優。

十三世達賴既已圓寂，藏地依傳統習俗由四大林三大寺、噶廈及民眾大會推舉出身錫德林之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遂派出數批活佛、喇嘛到各地尋訪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轉世靈童）。由於自 1908 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三世達賴親英之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之官員大多為親英分子，熱振呼圖克圖雖深知喇嘛教自元朝以來，與中央政府關係極為密切，且七世達賴政治權力之獲得，也係清乾隆所賜予，但以熱振活佛一人之力，實無法撼動噶廈中諸親英分子，遂著手清除一、二親英派官員，此舉自是引起諸親英分子之不滿，自然幕後之英帝國也對熱振活佛不滿，因此自十三世達賴圓寂後，藏地政務就充滿矛盾。

國民政府為優崇十三世達賴及重視西藏，「特派黃慕松為致祭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專使」，西藏地方對黃慕松之率團入藏十分重視，黃慕松入藏後與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廈官員多所晤談，情況頗為融洽（關於黃慕松在藏與藏方交涉詳情，可參看崔保新《黃慕松奉使西藏實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黃慕松離藏時，留下蒙藏委員會委員劉樸忱及蔣致余等少數人在拉薩，作為西藏地噶廈與中央聯絡之窗口，此少許人即成為後日蒙藏委員會設立駐藏辦事之嚆矢，此際西藏與中央之關係略見好轉。

幾年後於 1937 年在青海塔爾寺附近湟中縣祁家川一個藏族農民祁却才讓之子拉木頓珠，認為靈異特著，而藏地各界均同意此一靈童就是十三世達賴的呼畢勒罕，依前清法例一旦尋獲靈童，須經清廷批准，之後派大員監臨其坐床，如是新一世達賴始具正當性，也唯有經中央政府核准者，始會被蒙藏喇嘛教信徒所崇信，因此藏地政務雖在諸親英分把持下，恪於傳統規例，不得不報呈中央敘明已尋得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拉木頓珠一人，請免予掣籤簽（以往也有清帝批准免予掣籤之前例），國民政府為維持往例，及象徵國家對西藏擁有主權，乃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監臨靈童拉木頓珠（含有認證之意）及坐床典禮，事後在之前黃慕松留下人員之基礎上，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其規模與威權雖無法與前清駐藏大臣相提並論，但象徵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之政治意義，則

並無二致，也唯其如此，在藏地之親英分子及其背後之英帝國，對此深表不滿。

熱振呼圖克圖以其對中央持友善態度，遂引起親英群小之忌恨，雙方處於對立狀態，其時拉薩市井流言稱蛇年（1941 年、民國三十年），熱振將遭厄運，必須暫避攝政之位，始能避過此劫，熱振竟然信之，乃暫辭攝政之位，並舉其經師無甚名氣且已年邁之小活佛打扎為代理攝政，意在三年後重行攝政，親英派分子在此三年內大事興風作浪，操弄老邁昏聩而又貪婪之代理攝政打扎，竟將熱振呼圖克圖誣陷入獄，且在獄中將這毒害而死，時為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八日，熱振一死，英、印政府加大力度蠱惑西藏噶廈走向獨立，打扎接任攝政之後，任由親英分子擺布，而親英分子又唯英國之命是聽，遂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 年）七月設立「外交局」，更於同月六日通知駐藏辦事處自即日起，一切事件請處長向外交局接洽，勿直接與噶廈提說，也即是將駐藏辦事處視同英國、尼泊爾駐藏代表，視中央如外國，形同獨立，時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政治警覺性極高，堅不與所謂「外交局」接觸，噶廈政府以斷絕柴草供應，甚至在拉薩街頭濫捕漢人，施以毒打，派人向駐藏辦事處表示只要向外交局交涉就可恢復供應柴草，且釋放被捕之漢人，但孔慶宗以國家尊嚴及主權不容侵蝕為重，拒與外交局接觸，按打扎係出家喇嘛（渠等均自稱為佛教出家比丘），如此卑劣殘酷作為，實褻瀆了佛教，稍後（1943 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親自召見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阿旺堅贊等人，嚴詞怒斥噶廈之作為國家主權統一，係屬不法活動，按其時已是抗戰尾期，日本攻勢已如強弩之末，而我勝利曙光已現，噶廈乃不得不放軟態度，遂不再堅持駐藏辦事處，不必與其外交局接洽事務，也恢復供應辦事處柴草，從此可見對西藏地方噶廈高層僧俗官員實力比說理更有效，雖則噶廈不再堅持駐藏辦事處必須與外交局接觸，但也未撤銷外交局，直到中共「和平解放」西藏，外交局始予撤廢。

自打扎任代理攝政後，英國認為阻礙西藏獨立之障礙已除（所謂障礙，係指熱振呼圖克圖），遂蠱惑、煽動西藏快步走向獨立，而自抗戰後期以來，國內要求制憲之聲日亟，其後抗戰雖告勝利，由於八年浴血，已是國弱民窮，而國共內戰又起，此時中國可說是滿目蒼夷，但國民政府在

民意要求制憲壓力下，不得不進行制憲籌備工作，中華民國自肇建伊始。即主張西藏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因此自民元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至民國三十二年之《五五憲草修正案》之七次具憲法性質之法典或以列舉式、或以概括式，對於領土之規定，都將西藏包括在固有疆域之內，因此1946年之制憲，必得有西藏之代表參與，始稱完備，但其時西藏在英國蠱惑下，兼以噶廈中親英分心之野心，竟倡言西藏獨立，因此國民政府之制憲必須將西藏納入中華民國領土，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親英分子訴求西藏獨立，雙方可說是南轅北轍，形同一場博弈。

一、西藏之範疇

要論憲法上有關西藏地位及其自治位階，自然需先釐清西藏之範疇，欲釐清此問題，則需從歷史、政治面探討，始能確定西藏之範疇。前從歷史方面看，兩漢以前對後日所謂青康藏地區所知有限，但知其地為群羌所居，直至西元四世紀時，鮮卑慕容部有吐谷渾者，與其弟慕容廆，因所屬部眾因鬥馬失和，吐谷渾乃率其屬七百戶（一說一千四百戶）西徙陰山，後復西南徙止於枹罕（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一帶），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¹，考其地望，即今日之甘南及青海一帶，及其子葉延以吐谷渾為氏，其後人威服群羌，建立政權號曰吐谷渾，吐谷渾政權統治階層為鮮卑族慕容部，被統治階層則為遍佈今青康地區之羌族，至今四川省正北之阿壩藏族自治州之汶川、茂、理各縣，仍以羌族為主體民族。諸胡列國（即一般文獻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時鮮卑族禿髮部之南涼、鮮卑族乞伏部之西秦均轄有今青康地區，其時吐蕃（即清以後之西藏）尚處於蒙昧時代，還未登上歷史舞台，青康地區不可能為藏族傳統聚居地區。

及至唐代，吐蕃崛起，向外擴張，確實佔有青康地區，不僅如此，更向西佔有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區及今中亞費爾干那盆地，且一度攻佔長安，由是上述諸地始有吐蕃之人散居其間，在人數上自屬少數，但在政治上則為統治民族，青康地區一些早住民族不免有些逐漸吐蕃化（也即藏化），雖是如此，究竟與吐蕃人是有所區隔的；蒙古興起後，整個吐蕃降於蒙

¹ 見《北史·吐谷渾傳》。

古，自是有許多蒙古人進入青康乃至吐蕃地區，元朝建立後，正式將今西藏納入中國版圖，關於此點《元史、百官志》有詳細載如次：

「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為分院往鎮，亦別有印。……至元初（1264年，至元係元世祖忽必烈（據《元史》列傳九十二載：“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而領以國師，（至正）二十五年（1288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成宗鐵穆耳完澤篤汗）元貞元年（1295年）增院判一員……（文宗圖帖睦爾札篤牙汗）天歷二年（1329年）……蒙古必闡赤二人、回回椽史二人、怯里馬赤四人……）」

上引史料已明白說明中國元朝已將吐蕃納入中國版圖，不錯，元朝皇帝與喇嘛教薩迦派大喇嘛之間有著檀越關係（其時喇嘛教尚未發展出轉世活佛這一套制度），但這絕不等於元朝與吐蕃只是檀越關係（或作共施關係），試看成吉思汗之孫闊端曾向吐蕃薩迦派大喇嘛薩迦班智達發出「詔書」，要薩迦班智達到涼州會面，並要薩迦班智達勸吐蕃各部歸順蒙古汗王，如所周知只有統治者始能對所屬臣民或藩屬下「詔書」，接受「詔書」者，必然是下詔書者之臣民或藩屬，當薩迦班智達奉闊端之命，從涼州（今甘肅武威）致函吐蕃各部首領要求渠等歸順蒙古汗王，函中稱「衛」、藏、康三地的僧徒及施主們」、「都心悅誠服地」同意歸順蒙古汗王。忽必烈建立元朝後，雖封薩迦派喇嘛八思巴為「國師」、「帝師」、「大寶法王」，並以八思巴領宣政院，其為元帝之臣僚，已是不言而喻，義大利藏學家杜齊（G. Tufci）將「帝師」八思巴等大喇嘛在朝廷中的官職稱為「大住持」且明確指出：「住持們並不是國王或王公，而是官員，每次都須經過皇帝下詔頒賜印信加以任命的官員。因為他們是帝師，總是享有極高的尊敬榮寵。」²可見八思巴等雖貴為帝師，但在政治上仍是元朝的臣子，絕不是什麼檀越關係。何況元世祖忽必烈給西藏所頒

² 見杜齊著、李有義譯《西藏中世紀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1980年，頁24，但此處係轉引自王貴、喜饒尼瑪、唐家衛編著《西藏歷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頁69。

的詔書明白的說：「朕為教法及僧眾之主」³，這那裡是檀越關係？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高薪僱用荷蘭籍所謂「法學家」范普拉赫（Van Praag, Michael C. Van Walt）在其所著《西藏的地位》一書中說：元朝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的關係不是政治上的上下級關係，而是施主（皇帝）和被施者（喇嘛）之間的關係⁴，這簡直是無視既存的史實，等同睜眼說瞎話，而藏人夏格巴·旺曲德典之《藏區政治史》也指稱：「成吉思汗和薩迦派結成檀越關係」⁵，按成吉思汗薨於西元 1227 年，直到 1244 年，成吉思汗之孫闊端始下詔召吐蕃薩迦班智達到涼州與之會，此時成吉思汗已入土十七年，如何能與薩迦派結成檀越關係？可見夏格巴之說乃是一派胡言。

如果再進一步看，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 年），忽必烈第七子奧魯赤受封為西平王，鎮守吐蕃等地，西藏（吐蕃）如果不是中國元朝領土，忽必烈如何能派其子率兵鎮守？吐蕃為中國元朝領土，實無庸置疑。及至明朝建立，朱元璋於其洪武二年（1369 年）五月，遣使持詔諭吐蕃，告以中國已統一於明朝，但一時之間，吐蕃並未歸順，未幾，明太祖平定陝西，復遣官賁詔招撫吐蕃，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吐蕃諸酋長，舉元故官赴京。攝帝師喃加巴藏卜（此人即元末退居吐蕃薩迦寺南之達倉地方的末任攝帝師郎杰桑波）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監贊等人，於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 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明太祖大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係地區名稱，包括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甘肅的一小部分地區）、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見《明史》卷 331、列傳 219，西域三）。按明朝接替元朝為中國正統王朝，同時也繼承對西藏（時仍稱吐蕃）之統治權，上述朵甘、烏思藏二都指揮使司，隸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據此，雖然不能確指吐蕃已納入中國明朝，但可確認吐蕃與中國明朝

³ 見《薩迦世系史》德格版，頁 98。

⁴ 見范普拉赫《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 in international Law》，Boulder, Colorado, USA: West view Press, 1987，但此處係轉引自徐明旭《西藏動亂的來龍去脈》，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年，頁 69。

⁵ 見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央京娜姆、茨仁拉姆所譯《藏區政治史》第四章，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52。

關係極為密切，則是史實。

明成祖朱棣（1403~1424 年在位），以吐蕃之眾信奉喇嘛教、大小教派各踞一方，為便於治理，遂對吐蕃各地喇嘛教領袖封以「法王」、「王」、「灌頂國師」等名號，這一類喇嘛名號的繼承，必須經過中國明朝皇帝的批准、遣使冊封，繼承者始稱合法即位；另依照朝廷規定，每年元旦，這些「法王」、「王」、「灌頂國師」須遣使或親自晉京參加朝賀典禮、呈遞賀表貢物，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廟內還保存著當年必須朝拜的皇帝「萬歲牌」（見舒知生編《西藏今昔》（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12，此書係中英合訂本）。

按元時，甘肅、青海、四川、雲南等地，雖有藏族散居其間，但從來不屬吐蕃管轄之下，朝廷在吐蕃地方建政立制、任命官員、括戶置驛、征兵徵稅，充分行使對吐蕃之統治權，在中央設宣政院（初為總制院）以掌管今西藏及其他有藏人散居地區，分別設置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後者所管轄範圍就只限於今西藏地區，無權管理其他兩路的任何事務，換言之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無權過問甘肅、四川、雲南等地藏人散居地區事務；明時情況大致亦復如此，及清雍正四年（1726 年）既已設置駐藏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設置年代，雖有不同說法，但以雍正二年似較正確），朝廷乃進一步明確劃分西藏（清時始有西藏一詞）與四川、雲南之轄區界線，將昌都、洛隆宗、桑昂曲宗等地劃歸西藏；將中甸（今改名香格里拉）、阿墩子（德欽）、維西劃歸雲南；將巴塘、理塘、康定、德格等仍歸四川管轄，同年，四川、雲南、西藏三方面均派員會勘地界，在金沙江以西之寧靜山頭豎立界碑，以金沙江為界確定川藏、滇藏界線；雍正九年（1731 年）清廷又明確劃分駐藏辦事大臣與青海西寧辦事大臣之轄區界線，將原屬蒙古和碩特部所轄藏北及黃河源以南之七十九族游牧部落分割，其中三十九族劃歸西藏，此即所謂霍爾三十九族，餘下四十族歸青海，此即形成後日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從而可見西藏、四川、雲南、青海各有其轄區，絕不是凡有藏人聚居之地，都是西藏，因此所謂西藏只能是四川、甘肅、青海、雲南這幾省（這幾省雖有藏人聚居，但都不是主體民族）以外，以藏人為主體民族的「西藏地

方」(依中華民國地方行區劃稱西藏地方)。

二、清季西藏受蠱惑而攜貳

清雍正(1723~1735 年在位)時設置駐藏辦事大臣⁶，將西藏正式納入中國清朝行政管理體系之下，乾隆(1736~1795 年在位)時且在西藏建立噶廈制度，由駐藏辦事大臣與噶廈共同治理藏地政務，其晚年鑑於蒙藏地區多崇信喇嘛教之格魯派(俗稱為黃教)，而格魯派之大活佛轉世，多在原大活佛家族，或貴族中轉世，幾乎形同世襲，失去活佛轉世原意，乃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下旨設立金瓶掣籤制度，在此上諭中明白指出前此之轉世不無弊端，今將此一上諭全文引錄如次：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二大喇嘛乃西方布行黃教，掌管佛法之宗，但南北所有地方一切事務僧俗人等，皆係達賴喇嘛管轄，必須聰慧有福相之人，方能護持佛法而有裨益于黃教。從前呼畢勒罕⁷，皆恃拉穆吹仲看龍單于此，拉穆吹仲或受賄恣意舞弊，或偏庇親戚妄指，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暗中受益。令其指誰，此等皆有之事，朕悉知之，而與法教中甚為無益。即令達賴喇嘛一家之中，大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出有數人，而此輩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又係拉穆吹仲之外孫，即如內地漢僧等傳依鉢，皆各傳各弟子，相沿已久，竟成蒙古王公、八旗世職相同。如此謀利舞弊，則不但不能振興黃教，而反致于壞其教。何則出家之人，當萬慮皆空，無我無人，淨持佛教。昨據生擒之廓爾喀(按即尼泊爾)賊供稱，沙瑪爾巴呼圖克圖，即前輩班禪班額爾德尼(按係第六世班禪羅桑貝丹耶歇，此一班禪赴京祝賀乾隆七秩嵩壽，後患痘症，圓寂於北京)之兄。而班禪額爾德尼遺留物件，伊亦有分，是其所供，

⁶ 關於清朝設置駐藏辦事大臣之時間有各種不同說法，但非本文主題，不擬深入探討，此處採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之說，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雍正年間開始介入西藏事務，應為設置駐藏辦事大臣之嚆矢，見頁 80~84。

⁷ 「呼畢勒罕」係蒙古語，意為「自在轉生」，可引申為「身死後，能不昧本能，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的職位」，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1961 年，頁 34。

皆為爭財。此次廓爾喀賊搶掠後藏之事，皆伊（指沙瑪爾巴呼圖克圖）誘唆所致者，即是不慎認呼畢勒罕之明證也。從前喀爾喀四部落人等，共爭哲卜尊丹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時，有郡王桑多爾濟尚然具奏，嗣後請一阿歌作為呼畢勒罕之語。朕彼時將桑多爾齊訓誡責斥。以此觀之，不拘何人均可以謂之呼畢勒罕。若果呼畢勒罕者，必能前世所誦經典，記所持過物件，則始可以謂之呼畢勒罕。倘惟計其親屬，徇其情面，即作為呼畢勒罕，焉能振興黃教以服眾心哉。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內。嗣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卜尊丹巴、噶勒丹錫勒圖、第穆、濟隴等，並在京掌印大呼圖克圖及藏中大呼圖克圖等圓寂，出有呼畢勒罕時，禁止拉穆吹仲看龍單，著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將所出呼畢勒罕有幾人，令將伊等乳名各書簽放入瓶內，供于佛前虔誠祝禱念經，公同由瓶內掣取一籤，定為呼畢勒罕，如此佛之默祐，必行得聰慧有福相之真呼畢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且不能主定，拉穆吹仲更不得從中舞弊，恣意指出，眾心始可以服。欽此。」⁸

從上項引文可以看出：中國清朝皇帝規定了達賴、班禪等位階之活佛轉世，要經過朝廷所規定之金瓶掣籤，如僅覓一個呼畢勒罕時，也須經皇帝批准始得免予掣籤，流亡在外的十四世達賴、西藏流亡政府及夏格巴等始終叫嚷著達賴或西藏與中國中央只是壇越關係，請問施主可以決定達賴、班禪……的轉世方式嗎？可見那一夥罔顧史實睜眼說瞎話。

自中國清朝設置駐藏辦事大臣後，西藏即與中央維持良好關係；乾隆七十嵩壽時，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晉京祝賀，乾隆帝還特別在熱河仿照札什倫布寺興建了一座喇嘛寺廟，供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住錫，此寺稱須彌福壽寺，為熱河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之一，另在北京也修繕西黃寺，供班禪大師在京居住之所，乾隆為此次會面，還特別向章嘉呼圖克圖（為喇嘛教格魯派所謂「四聖」之一，另三「聖」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哲布尊

⁸ 見吳豐培校訂《番僧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但此處係轉引自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頁 24~25。

丹巴呼圖克圖）學習一些日常用到的藏語⁹，可見乾隆對班禪額爾德尼之優崇，也象徵中國清朝對西藏之重視，在十三世達賴親政之前，無論達賴或西藏地方噶廈，對中國清朝無不奉命唯謹，克盡臣禮。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嗣以痘症在北京圓寂，清廷更予以大量賞賜。

六世班禪圓寂後，遺下大筆財物，依據喇嘛教傳統習俗前一世大活佛圓寂後，其遺產由轉世新一世活佛及其寺廟所有，換言之，六世班禪圓寂後，其遺產歸七世班禪及札什倫布寺所有，但六世班禪之兄沙瑪爾巴呼圖克圖為覬覦此龐大財物，竟勾結廓爾喀（即尼泊爾）出兵掠奪後藏，洗劫札什倫布寺，中國清廷特為此出兵進擊廓爾喀，直至其京城加德滿都，廓爾喀降，始罷兵，試想若西藏非中國領土，清廷何須萬里出兵翻山越嶺，遠征廓爾喀。

清初對西藏事務確頗用心，但整個「理藩」政策（清朝在入關前即已設置「蒙古衙門」，稍後即改為「理藩院」以治理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出發點採與漢人隔絕的民族政策，此因建立清朝之滿族，本身是邊疆民族，深恐其他邊疆民族與漢人交融，未能建立國族觀念，是為清廷治邊政策之一大敗筆¹⁰，而派駐西藏、內外蒙古、新疆之辦事大臣、將軍、都統、副都統等治邊官員，固不乏精明幹練者，但更多庸碌貪婪之輩，朝廷刻意採行民族隔離政策於上，邊臣疆吏昏瞶無能尸位素餐於下，由是邊疆與內地隔閡日益加深，當中央國力強盛之時，尚無大礙，但清朝自嘉慶、道光之後國勢每下愈況，咸、同之後，更是不堪聞問，歐洲各國拜工業革命之賜，國力蒸蒸日上，向外掠奪爭先恐後，中國遂成帝國主義侵略之標的，與之抗爭，則每戰皆敗，賠款之不足，繼之以割地，喪權辱國日甚一日，邊疆與內地既被政策性隔絕，遂無從產生邊疆與內地係命運共同體之意識，更進而輕視中央，此乃清廷邊疆政策及邊臣疆吏作為使然。

清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世達賴圓寂，循傳統儀制尋訪其呼畢勒罕，經一年多尋覓，僅尋得貢嘎仁青之子羅布桑塔布克甲木錯一個靈童，

⁹ 見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著，陳慶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許德存譯《西藏通史》，西藏社科院、中國西藏雜誌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下冊頁805。

¹⁰ 見劉學鈔《論清代邊政之得失》一文，原載《中國邊政》季刊，後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年，頁7~98。

乃奏請朝廷免於掣籤，清光緒帝降旨諭曰：「貢嘎仁青之子羅布桑塔布克甲木錯，即作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毋庸掣籤。」¹¹此即十三世達賴，其坐床伊始，俄羅斯即派其境內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到拉薩，名為學經，實則從事間諜工作，道爾吉或作德爾吉、德爾智、佐治也夫、道濟也夫、羅桑姑馬，出生於貝加爾湖西之上烏丁斯克，曾在沙俄學校就讀，後受俄羅斯政府間諜機關吸收利用¹²，於光緒七年入藏，攜有大量金錢，用以賄賂藏地僧俗高層，得以擔任十三世達賴之「侍講」（有人誤以為是十三世達賴之經師，不確），藏人多稱之為參寧堪布。俄國之所以要染指西藏，以西藏地勢高亢，向有世界屋頂之稱，可鳥瞰中亞及南亞次大陸，具高屋建瓴之地緣優勢，英國也以同一理由欲覬覦西藏，但俄國以其境內有布里雅特及喀爾瑪克兩部蒙古，均為喇嘛教格魯派信徒，輕易混入西藏，因此在對藏滲透方面，俄國較英國先鞭一著，為此，英國乃不擇手段急起直追，想方設法要進入西藏。

道爾吉既為十三世達賴之侍講，得以朝夕在達賴身旁，遂藉機灌輸「離中、親俄、反英」思維，其時十三世達賴尚在童稚之年，深受道爾吉之影響，英國多次欲強行進入藏地，清廷無力阻止，兼以駐藏辦事大臣多不能認真任事，如布里特蒙古喇嘛俄人道爾吉，而能任十三世達賴之侍講，駐藏大臣對此竟然一無所悉，其非尸位素餐而何？無怪乎藏中人譏駐藏大臣為「熬茶大臣」，其瞞頂無能於焉可知。

十三世達賴既受道爾吉蠱惑，面對英國之欲進入西藏，清廷對英國之節節進逼，一再讓步，引起藏大極大反感，而道爾吉復趁機進言稱：唯俄國能保護佛教，更宣稱喇嘛教傳說之中「強祥巴拉」（一般習稱之為香格里拉）即為俄國¹³，遂使十三世達賴一面倒向俄國，且兩度派道爾吉為「使」，代表西藏達賴出訪俄國，且獲俄皇接見，而駐藏大臣對此竟一無知，著實令人難以理解，對此只有更加速英國對藏之進逼。

¹¹ 見顧祖成主編《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416，但此處轉引自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517。

¹² 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頁156。

¹³ 關於唯俄國能保護佛教及「強祥巴拉」即俄國，詳情可參見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

1904 年（光緒三十年），英國終於出兵強行進入西藏，攻進拉薩前夕（1904 年七月二十七日，但另有說法為六月十五日，如牙含章之《達賴喇嘛傳》，此應為藏曆），十三世達賴率少數親信（含道爾吉）向北逃亡，過青海、出嘉峪關，進入外蒙古，如此近百人之大隊人馬，沿途各關卡居然沒有地方官員發現，可見其時清朝地方吏治已敗壞至極。十三世達賴之所以向北逃往外蒙古，顯然是受到道爾吉影響，意欲進入俄境，接受俄國保護，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年（1904 年）在我國東地區發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而英日又係同盟，因此俄國不敢接納十三世達賴，而達賴人格特質怪異，在庫倫（外古首府，即今之烏蘭巴托）作客，竟與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但又不願返回內地，只得向西到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注意此部不稱汗）各旗名為弘揚喇嘛教法，實為接受蒙人供養¹⁴，十三世達賴之到外蒙古，外蒙古對其供養、已是「力盡筋疲，大約二、三年元氣難復」¹⁵，可見其「吸金」能力何等強大。之後，清廷認為任十三世達賴游走外蒙古，實不妥當，乃命大臣赴外蒙將之召回。

十三世達賴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只得返回內地，但其時中英仍在談判藏事，英國堅持此時達賴不可返回西藏，清廷只得命達賴暫時住錫青海塔爾寺，但以其妄自尊大之人格特質，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能，清廷為息事寧人及優崇十三世達賴，乃將阿嘉呼圖克圖調往北京「當差」，形同達賴鳩占雀巢，居無何，奏請欲赴五台山（時稱清涼山）禮佛，清廷准其所請，遂往五台山，此消息經報導後，各國駐華官員竟爭赴五台山與之會晤，至是達賴乃知己身乃是「奇貨」，既是「奇貨」遂抬高恣態，未幾知探悉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有意晉京，向朝廷稟報近年西藏情況，達賴唯恐班禪晉京或將不利於己，立即馳奏清廷也欲晉京，清廷仍優崇達賴晉京而婉拒班禪晉京，達賴在京期間，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所接觸，雖然之前歷世達賴降生於不同地方，但幾全在拉薩圓寂，十三世達賴急於返回拉薩，在與朱爾典會晤時，宣稱之前藏英之不睦，概屬誤會

¹⁴ 十三世達賴在外蒙古詳情，可參看劉學鈞《英軍侵藏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入蒙》一文，該文輯入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主編《二十世紀之蒙藏問題》台北南天書局，2002 年，頁 139~170。

¹⁵ 見李廷玉《游蒙日記》，此書在光緒三十三年以手抄本在東京出版，1990 年北京中國社科院予以影印出版。

¹⁶，由是向英輸誠，未幾（1908 年），光緒、慈禧先後崩殂，達賴趁清廷忙於國喪之際，奏請返藏，清廷在忙亂之間未多加思索，即准其返藏，達賴於臨行前一日（1908 年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兩名親信赴英國駐華公使館，向朱爾典表示：「希望能與英國印度當局保持友好關係，並稱這是其北京之行的最重要收穫之一。」¹⁷

十三世達賴返藏後，立即由原先反英轉而全面親英，俗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官員遂轉而親英，未幾，清廷為推行新政，派川軍入藏，該批川軍紀律敗壞，而藏地又反對新政，由是拉薩陷入混亂，十三世達賴逃往印度，英印政府以大禮接待，達賴對英國更是感激莫銘，辛亥槍響、中華民國建立、川軍內訌，終被驅逐出藏（此為首次驅漢事件，有關詳情可參看《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自是達賴與肇建伊始之中華民國形成對立，民國二年（1913 年）更與外蒙古簽訂所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為「獨立國」，在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之前，西藏與中央幾無聯繫。十三世達賴為謀求自主，大事擴軍，擴軍必得有財政支援，遂向後藏屬班禪額爾德尼之札什倫布及谿強行徵稅、徵兵，班禪派高級官員赴拉薩協商，噶廈竟將之逮捕，九世班禪認為己身已陷入險境，如不出逃，恐有生命危險，遂於民國十二年（1923 年）十一月十五日，帶隨從親信十五人輕騎簡裝，「乘黑夜赴納當，岡金涉藏青大河，經節耶而入曠野草地，此路平常商人，需二月之程，佛等（佛，指班禪）星夜遄行，僅七日七夜而到，時藏中尚無人知覺。是月十八晚，班禪之索本堪布羅桑堅藏、曲本堪布旺堆諾布……及僕役共一百餘人，乘月夜逃出，追趕大師，……向南再走三日，可合大路，佛忽改而北馳，眾隨之，過後始知若南去，恰遇追兵，共仰大師之神異。」¹⁸設若九世班禪大師被噶廈所派追兵追及，則其後果實難想像。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到內地後，備受北洋及國民政府之禮遇，也為蒙漢

¹⁶ 見榮赫鵬（Younghusband）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台灣學生書局，1973 年。該書早在 1934 年即由商務印書出版，列《內政研究邊政叢書》，又該書原名《India & Tibet》。

¹⁷ 見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頁 171~172。

¹⁸ 見劉家駒《班禪大師全集》班禪堪布會議廳、中國邊疆學會，1943 年，頁 36。

人民之崇奉與膜拜。十三世達賴對付班禪尚且如此，其受英國蠱惑而有攜貳之心，以是昭然若揭，及至民國十七年（1928 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中央氣象煥然一新，國家前途呈現光明景象，深以西藏乃中國領土，不容分裂，西藏地方各派政治力量，向對內地政治十分關注，如中央力量壯盛時，即表示願意內向，反之，則與中央背道而馳，當下眼見中央前景看好，遂派五台山堪布羅桑巴桑到南京謁見蔣介石，試探國民政府對藏態度，中華民國始終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不容分裂，至於給予何種程度之自治，則是可討論之課題，此種方式，理應為西藏地方所接受，但英國自始就要西藏脫離中國，使西藏成為中印間的緩衝地區，因此任何增進西藏與中央關係之作為，英國都必從中作梗，加以反對；國民政府曾派文官處書吏劉曼卿女士入藏（劉女之父為漢人，其母為藏人，其藏名為雍金，通曉漢藏語文），曾面晤十三世達賴數次，雖然改善若干西藏與中央關係¹⁹，但其與中央之關係，仍處於若即若離狀態。

西藏民族原極淳樸善良，但其政教高層則「儘自柔順而內狡獪」（此評引自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 262），因此當中央與其談到班禪大師返藏問題、康藏界務問題，拒絕英國蠱惑誘煽等問題時，十三世達賴美其言稱：「吾與班禪原有師弟之誼，決無若何惡意，聞渠近日旅居蒙古（按係指在內蒙古弘法），想亦有不適之苦，吾至以為念。」、「至於西康事件，望轉告政府，……都是中國領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恃，藏軍素彪悍，吾決無法制止其衝突，兄弟鬩牆，甚為不值」、「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不兩容，故彼來均虛與周旋，未嘗與以分厘權利。」²⁰其話雖極中聽，但實際決非如此，以九世班禪大師返藏而言，達賴堅持中央不得派軍隊護送，試想班禪之逃往內地是為保命，如若返回後藏而無中央軍隊護送，豈非自投羅網，其餘談話多類此。

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藏曆水雞年十月三十日），十三世達賴圓寂，得年五十八歲，雖尚未及花甲，但已是自八世達賴以來

¹⁹ 關於劉曼卿入藏經過及其與十三世達賴晤談情形，可參見劉曼卿《康藏軼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

²⁰ 引號內達賴所說之話，均見劉曼卿《康藏軼征》。

最長壽者，此項消息傳到中央，國民政府特派大員黃慕松為致祭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專使，入藏追贈十三世達賴上項名號及致祭，事後留下劉樸忱，蔣致余在拉薩，成為後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嚆矢。十三世達賴圓寂後，藏中循例推舉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此人對中央頗為友善，但也因此與噶廈中之親英派官員不合，最後竟被親英派逮捕下獄毒害而死²¹。稍前，藏中循舊例尋訪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轉世靈童），經尋獲青海湟中之拉木頓珠為十三世達賴之呼畢勒罕，中央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監臨十四世達賴坐床典禮，事後正式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其規模及權威雖不若清代之駐藏辦事大臣衙門，但象徵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之政治意義則無二致，雖則如此，藏中由於親英派分子受英印政府誘煽，謀求脫離中國邁向獨立動作不斷。

三、國民政府對西藏的立場

自孫中山創建中國國民黨以來，就力倡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也同時希望合國內各民族融鑄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說合漢滿蒙回藏五族於一爐而冶之，使成中華民族；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政府遵其遺教，於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七日大會通過《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其中涉及蒙藏與新疆部分，稱：「本黨致力於國民革命，既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舍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二要求。……中國境內之民族，應以互相親愛，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為達到完全排除外來帝國主義目的之唯一途徑。誠以本黨之三民主義，於民族主義上，乃求漢、滿、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團結，成一強固有力之國族，對外爭國際平等地位之。於民族主義上，乃求國內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權，參與國家之政治……」。「誠心扶植各民族經濟、政治、教育之發達，務期同進于文明進步之域，造成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同年六月十七日，國民黨第三屆二中全會通過《關於蒙藏之決議案》，此決議之要點為：「闡明蒙藏民族

²¹ 熱振事件非本文主題，從略，有關熱振呼圖克圖事蹟，可參看劉學鈞《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與熱振呼圖克圖》蒙藏委員會，1994年。

為整個中華民族之一部，並釋明三民主義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以此說明蒙藏兩族所處地位之危險、帝國主義者侵略陰謀之惡毒，以及第三國際曲解民族自決之真義而誇大煽動宣傳；按「民族自決」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意謂各弱小民族可自行決定其前途，口號動聽，對煽動各國境內少數民族，具有極大之吸引力，但吾人當知，各國境內之少數民族，既是少數，必然力量微小，居於弱勢地位，設若要獨立，而該國主體民族（即該國之多數民族，往往是執政之民族）同意其獨立，當然皆大歡喜，但此種情況極為罕見，因此當主體民族不同意時，而少數民族（或弱勢民族）仍堅持自決訴求獨立，則除兵戎相見外，似別無他策，既是少數民族必是人寡勢弱，訴諸戰爭，勝算極微，因此所謂「民族自決」，絕非解決民族問題之萬靈丹。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新帝國主義者，而且是霸權主義者，何以不在美國境內對各族印地安人、黑人、亞裔實行民族自決？而向其他國家推銷民族自決，當然美國此舉對於早期帝國主義者，在國境外憑藉優勢武力，掠奪殖民地，奴役殖民地人民具有瓦解意義，但對傳統上就是由多民族所建構之國家，如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許多民族共同建構而成的國家，談民族自決就有分化、裂解中國的意圖。因此國民黨的民族政策是反對任何邊疆少數民族脫離中國，但同意邊疆各少數民族實施不同位階之自治。

民國十八年（1929 年），十三世達賴見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形式統一了中國，國家前途呈現光明景象，乃主動派貢覺仲尼為代表到南京晉謁蔣介石，蔣氏明白告以：「中央應本總理之寬大主義，許藏人完成自治」²²。由是蒙藏委員會擬具「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具體辦法」，呈請蔣介石核定，此項具體辦法其中要點略為：「一、西藏與中央關係恢復如前，……四、外交、軍事、政治均歸中央辦理；五、中央予西藏以充分自治權。」²³對此，蔣介石又提出問題徵詢十三世達賴意見，蔣氏之問題約

²² 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趙戴文為派貢覺仲尼會見蔣介石聲明達賴喇嘛不背中央不親英人等意致閻錫山電》，納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但此處係轉引自張雙智《國民政府民族研究》，第 25 卷第三期，2014 年 7 月，頁 108~118。

²³ 見趙戴文為派員與貢覺仲尼等洽商會呈蔣介石解決西藏具體辦法致閻錫山電納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此處係轉引自張雙智前揭專文。

有以下三項：「一、中央與西藏之關係應如何恢復？二、中央對西藏之統治權如何行使？三、西藏地方自治權如何規定？範圍為何？」為使此三項問題能正確向十三世達賴轉達，國民政府乃以貢覺仲尼為「赴藏慰問專員」身分，代表政府入藏，時蒙藏委員會對貢覺仲尼之入藏，極為重視，也做妥許多應備工作，貢覺仲輒攜帶有蔣介石及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十八年一月五日宣誓就職，十九年四月五日免職，事實上閻於宣誓就職後，即返回山西，蒙藏委員會會務均由副委員長趙戴文掌理，閻則在山西遙控）致十三世達賴信函，以及蔣介石、閻錫山致西藏噶廈噶倫察絨信件，在蒙藏委員會草擬信函之初，曾派秘書張天樞向西藏駐京代表處徵詢意見，時西藏駐京代表處負責人即是貢覺仲尼，渠提供以下三點意見供中央參考：「一、中藏不通往來者已十餘年，此次棍、楚來京陳述達賴意旨及苦衷（棍，即棍却仲尼，後以所用漢字欠雅，乃改為貢覺仲尼；楚則為楚稱丹增之簡稱，曾與貢覺仲尼、巫懷清自北平到南京代表十三世達賴向政府表達意見，貢覺仲尼原為北平雍和宮堪布喇嘛），所有十餘年經過，中央已完全諒解，遂派棍堪布回藏宣達中央意旨，以收和衷共濟之效；二、中央本總理扶植蒙藏民族之主義，一秉大公，與蒙藏團結，一致對外；三、達賴如有可中央申述意見，閻總司令無不盡力幫助，至一切詳細情形，棍堪布當可面述也。」²⁴中央對此給予相當尊重，從蔣介石致十三世達賴之信函即可看出，該信函全文如次：

「達賴大師法座：前以統一告成，中外禔福（禔；意提，禔福，意為安福），特致兩函詢問起居，並示中央眷戀西陲之至意，諒達座右。傾棍、楚二堪布來京，轉陳一切，備見法座傾誠心向，愛護共和，至為佩慰。自先總理領導革命、創立民國，一切力求中華民族自由平等為職志。政府秉承遺訓，奠定寰區，對於藏衛人民，無時不思以至誠博愛之心，為謀安定。前因道途遼遠，致法座維持地方，皈依主義真誠無由悉達。茲幸具聞宗旨，如撥重雲，五族振興，已可覩其朕兆。政府必本

²⁴ 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六冊，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著、趙秀英整理《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頁114。

先總理親愛精誠之教誨，與以扶持。際此赤白帝國主義鯨吞蠶食之秋，我中華民族務必團結一致，共同對外以爭存。法眼精詳，必能遠矚高瞻，則外人拓殖之陰謀，當無所施其狡矣。茲特派雍和宮堪布棍却仲尼赴藏慰問，並宣布中央意旨，希與接洽，並選派負責大員來京商洽一切，是所盼望。專此布達。」²⁵

從上引資料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對西藏的立場，始終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在擁有西藏主權情況下，可同意西藏擁有相當高度之自治，此蓋鑑於自民國肇建以來，始終未能真正對西藏行使統治權，因此對於西藏之自治採取較寬鬆態度（對外蒙古情況亦然，抗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元首在俄國克里米亞半島雅而達舉行秘密會議，簽訂所謂《雅爾達密約》，迫使中國承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予維持，其後趕在制憲國民大會開議前，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承認外蒙古獨立），按貢覺仲尼既是西藏地方駐京代表，此時又蒙國民政府任為「赴藏慰問專員，集雙重身分於一身，實為極巧妙之安排。而西藏地方或十三世達賴與中央之關係，固然受英國之影響，但中央之是否強盛，也為重要因素，中央之強大與否，與受英國影響程度，恰成反比，此時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奠都南京，國家呈現一片榮景，故西藏地方放低姿態，願與中央接觸，注意！僅是接觸而已，試看貢覺仲尼以中央「赴藏慰問專員」入藏交付中央所提問題後，復銜十三世達賴之命，於民國十九年經印度抵達南京，帶回西藏地方噶廈對中央所提問題之八項答復，茲將之引錄如下：

「1.西藏與中央關係應如何恢復？噶廈答稱：『中央能將中藏施主關係，照前至誠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係至誠相見，現在更要竭力擁護中央。』

2.中央對於西藏統治權應如何行使？噶廈答復：『西藏政教謀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約後，必更穩妥。』

3.西藏地方自治權如何規定？範圍如何？噶廈答復：『從此中藏施主誠意謀西藏安全，其範圍自應照舊，若原係西藏地方，該下未在香港治下者，自應仍歸西藏範圍，久後必安。』

²⁵ 同註 24 所引資料，頁 114~115。

4.達賴、班禪加入中國國民黨，噶廈答復：『達賴喇嘛現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務甚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居巴僧俗官員未經同意之前，不能來京。至班禪現住內地，除札什倫布廟宇教務外，素無其他政務可管，自應就近加入國民黨，但素無解決藏事之發言權。』

5.達賴、班禪在西藏政教上地位與權限一律照舊？抑或另有規定？噶廈答復：『西藏政教，向歸西藏地方政府掌管，班禪早在後藏有廟宇。至札什倫布係第一世達賴所修建，後一輩達賴到拉薩時，無人掌其廟宇，特選班禪掌管札什倫布，並贈予班禪。後由五輩達賴因屢次師徒關係，將札什倫布給予班禪，若照以前舊規辦理，西藏人民無不悅服。』

6.班禪回藏，達賴如何歡迎？中央如何護送？噶廈答復：『班禪左右人等，造前後藏名目，意在分離，素不遵守藏政府法令，往往以下犯上，思想行為均係惡化。甲辰年（按係 1904 年，是年英軍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出逃外蒙古）英人到拉薩時，班禪前往印度，與英人密謀，不得結果，仍回札什倫布。又辛酉年（係 1921 年，民國十年），班禪同聯欽使設法謀奪達賴政教各權，後由三大寺僧及全藏人民反對，不得已仍回札什倫布。又向章班禪應出軍糧四分之一，不但任意不交，還作不法行為，彼時若照西藏法律，著實解決，焉有現在之事？因思前輩達賴與班禪師待關係甚深，竭力忍讓，彼等不但不悔悟，還擁班禪舍札什倫布而逃，當時俱函請其回，並未容納。因與庫倫共產黨有謀，雖往庫倫，因庫倫圓寂（按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於 1924 年），方到內地。而此間將札什倫布廟宇，業經派員妥為保護。至班禪左右人等，時常挑撥，現在未聲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碍難歡迎。』

7.達賴是否在京設立辦公處以便隨時接洽？至於經費可由中央供給。噶廈答稱：『先設辦公處於南京、北平、西康三處，以後若有加添之處，再當陳請。』

8.西藏對於中央有無其他希望？噶廈答稱：『為防侵略守土之

故，目前只希望中央接濟軍械，以後謀地方安全，如有所需，再當陳請。』」²⁶

從上引西藏地方噶廈對國民政府所提問題之答復，可看出其根本否認西藏是中國領土此一史實，把隸屬於中國清朝鐵一般的事實，說成是供施關係，我人如翻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²⁷一看，就知道西藏不折不扣是中國清朝的領土，在《理藩院則例》中，明白規定了駐藏辦事大臣的職權，對活佛喇嘛的管理，甚至細到對不同等級的喇嘛所著袈裟顏色都加以規定，如有違規，則以懲處，試問這只是施主和福田的關係嗎？中國清朝可以在拉薩設置駐藏辦事大臣衙門、可以在西藏重要地點派兵駐防，這像供施關係嗎？有關班禪返藏問題，噶廈別然表示「西藏碍難歡迎」；按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之所以逃到內地，肇因於十三世達賴於 1921 年在噶廈內成立軍糧局，擴充藏軍，強行向札什倫布寺徵收四分之一軍糧，又要札什倫布寺所屬莊園、牧場援以往抗英戰爭先例，承擔軍費四分之一，此皆班禪轄區僧俗民眾所無力負擔，之後，班禪派札什倫布達四名官員到拉薩商洽此事，噶廈竟將其中三人逮捕入獄²⁸，班禪始意識到已然身處險境，如不出逃，恐有生命之危，於是始出走內地，而今噶廈竟對班禪作出許多負面批評，有失公允；至於對中央僅希望接濟軍械，更屬怪異，按十三世達賴自民元之後，已一面倒向英國，英國自不會再進兵西藏，此際只希望中央接濟軍械，莫非將用中央供給之軍械攻打西康？總括以觀噶廈此八項回答，完全看不出有願意隸屬中國之意念，而且是由十三世達賴具名回答，顯然誠意不足，骨子裡仍存有西藏獨立意圖。

其實中央未嘗不知西藏地方噶廈之攜貳思想，但以當時國家實力而言，尚不足以武力強行統一，況且日本對中國早已虎視眈眈，自不宜兄弟鬩牆，招來外侮，果而次年（1931 年），日本就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由於中國無力抗拒，未幾日本更招來遜清廢帝，在東北成立「滿洲國」之傀儡組織，中國為厚植國力，準備長期抗戰，自是更不想

²⁶ 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頁 278~279。

²⁷ 《大清會典》為清代所有法律會編，等於清朝的《六法全書》，其中《理藩院則例》等於治理邊疆地區、民族的法令匯編，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版本。

²⁸ 見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547。

在藏事方面採強硬措施，但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的立場，則毫未鬆動，但對於西藏等邊疆地區之自治，已有採取放寬立場之認識，如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七日，蔣介石在南昌演講時，即提出：

「……在此惡劣環境下，對於複雜之邊疆問題，既無實力可用，便不可不有相當之政策，在各個帝國主義義利衝突之中求生存之路，一面充實國力，靜待時機，……由於過去所得之教訓，吾人應知一種切實而得當的政策之確立，乃今日對付邊疆問題最切要之事，……簡言之，即採允許邊疆自治之放任政策。誠以國大事，完全為一實際的力量問題，國際關係，乃純粹決于實際的利害打算，依此而籌邊，在今日情勢之下，雖欲不放任，事實上也只能放任。……」²⁹

從上引蔣氏演講中，已可看出受制於國家實力，在國家實力不足情況下，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不得採放任政策（也即高度自治），此乃無可奈何之決定，與何人領導、政策如何均無太大關係聯，直言之是國家實力問題。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三世達賴圓寂，國民政府派大員黃慕松入藏致祭，拉近西藏與中央關係，並奠下後日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基礎，而西藏地方也由立場不親英之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依理西藏與中央關係應日臻和睦，然而藏中親份子及其背後之英帝國，自不肯就此罷手，以諸種方法置較親中央之熱振攝政於死地³⁰，於是西藏地方噶廈完全由親英派所掌控，英國在幕後慫恿邁向獨立。未幾，日本全面侵華，中國不得不起而抗戰，由是更無力對西藏問題作出強有力之決定，但對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之立場，則毫無鬆動。

全國軍民經過八年浴血抗戰，至1945年春，日本攻勢已如強弩之末，勝利曙光業已呈現，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初，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十八日，大會通過《本黨政綱政策案》，在此案中稱：「實現蒙（按此處之蒙，係指外蒙古）、藏各民族之

²⁹ 見林思顯《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國立編譯館，1994年，頁193~195。

³⁰ 關於熱振之死，非本文主題，略，欲知詳情可參看（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劉學鈔《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與熱振呼圖克圖》等書。

高度自治，並扶助各民族經濟、文化之平衡發展，以奠定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之基礎。」可見國民政府自奠都南京，以至抗戰勝利前夕，始終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但對其自治則可以「放任」，甚至可以達到高度自治位階。

四、制憲國民大會關於西藏自治制度之規定

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即有類似憲法之《臨時約法》，禪位於袁世凱後另立《中華民國約法》，民國十二年，北洋政府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北伐完成奠都南京，國民政府依據中山先生遺訓，認為應經過「訓政」時期，始進入憲政時期，遂於民國二十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但人民望治心切，一再要求儘早制訂憲法，政府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一般稱之《五五憲草》），供全國充分討論修正後，成為正式憲法，不料次年（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進入全面抗日戰爭，制憲一事遂告停頓，及至抗戰後，勝利曙光業已在望，人民要求制憲之呼籲日殷，日本投降後，全民要求制憲，制憲已是不可遏止，但蔣介石深知憲法乃是國家根本大法，必得有各民族共參與始稱完備，如無西藏代表參與制憲，則無法證明西藏屬於中國，因此如何促成西藏地方派出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遂成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廉之重大任務。

沈宗廉原為軍隊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四組秘書，於1943年入藏工作，此一人事案係由蔣介石親自任命，打破用人慣例（一般慣例係由蒙藏委員會提出人選呈請行政院同意後任命），此舉足見蔣介石對西藏事務之重視，此一既係蔣氏所親自任命，顯示沈宗廉可以略過蒙藏委員會向層峰直接言事，沈宗廉入藏前蔣氏曾指示：應著重于宣揚德意，盡力為藏胞謀福利，以增進感情，泯除隔閡，故對於當地社會福利事業尤應注意云云³¹，因此沈宗廉入藏後，擴大駐藏辦事處組織，由兩科增為三科，人員也略增。兩年後，抗戰勝利後九天（1945.8.24），蔣介石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稱：

³¹ 見張雙智《國民政府與噶廈圍繞西藏高度自治的較量》，文載《青海民族研究》，第25卷第三期2014年七月。

「我今天代表本黨的同志根據國父的遺教說明我們今後對省區以外邊疆民族問題，換言之，就是對於外蒙和西藏民族問題的方針，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外蒙古就派代表來參加祝賀，我們國父對他們的禮遇，有如上賓，從沒視他們為藩屬的意念與態度，決不像北京政府對他們視為殖民地加以壓制。我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僅對於外蒙如此友愛，就是對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國同胞必須知道如果我們忽視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們獨立自治的能力，這不僅違背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們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紛擾，貽誤我們建國的百年大計，……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獨立的願望，我們政府自當予以承認。……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服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³²

在蔣介石這一段講話中，明白看出國民政府對外蒙古與西藏的立場有所不同，蓋此時已知稍前美、英、蘇三國元首在俄境克里米亞半島雅爾達簽下密約，出賣中國，也即要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才說「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獨立的願望，我們政府自當予以承認」，因當時尚無任何法律規定領土變更，須經何種法律程序，《五五憲草》只是草案，並無約束力，而外蒙獨立已是既成之事實，且在美國壓力之下，脅迫中國必須承認外蒙獨立³³，且蔣氏深知來年（1946年）制憲已是勢不可免，一旦進入制憲程序，全國民意必然全力反對外蒙獨立，蔣氏在無力抗拒帝國主義壓力下，搶先宣佈同意外蒙獨立，但西藏並無此種情形，因此只同意其高度自治。

為堅持西藏為中國領土，制憲國民大會必得有西藏代表參與始稱合法，此一任務即由駐藏辦事處處長沈宗廉擔負。沈宗廉於1944年四月經

³² 見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一卷《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出版。

³³ 關於外蒙獨立詳情，可參看劉學鈺《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2、2014兩次出版。

印度入藏，四月十五日抵加爾各答，停留閱月，其間以私人身分與英印政府外交部長作了五次談話，藉機試探英國對戰後西藏地位之態度，英印外交部長卡羅稱：「在西藏人之觀念中，西藏為獨立國家，事實上三十年來亦確如此；在中國人看來，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此兩種觀念距離過遠，不易融合。在英人態度，一面不願令藏人感覺不快，一面對中國之宗主權亦向所承認，此實為一種折衷辦法。」沈宗廉則稱：「中國正在推行憲政，全國各處均實施自治制度，西藏當然可以配合其特殊之人情風俗實行自治。宗主權雖可有各種解釋，然宗主國對其屬地必須有外交代表權，否則宗主權無異不存在」³⁴，從此項對話中，可看出英國雖無占領西藏地方之意，但希望西藏成一獨國，卻又認為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相當矛盾，至少說明英國鼓動西藏獨立的立場從未改變，至於說一向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乃是檯面話，毫無意義。沈宗廉入藏後，積極宣揚中央實行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政策，且對西藏願給予高度自治，據沈宗廉向蒙藏委員會之報告稱：「全藏官員對於中央深仁厚德，同深感戴，在民眾方面，久苦差役繁重，極度剝削，縱能獲得自治，仍望中央予以扶持，出諸水火；在僧侶方面，向來傾中央。……在官吏方面，老成一派深知西藏缺乏獨立條件，惟冀保全祿位、財產，今得中央許以自治，認為私人權利不受影響，表示欣慰慶祝，推選代表在渝參加國大。此派在藏政府會議中極力主張，可見中央政策已實效。此外僅有少數意志薄弱者，則在中央勢力未達前，不敢吐露真意。揣其心理，一係懾于英人虛聲，且亞東、江孜有英駐軍威力，幸未有所畏懼；一面心存觀望，欲挾英以自重。倘我能向英交涉，取消駐軍，此少數人之心理亦將大有改變，中藏關係必易調整」云云³⁵。沈宗廉此一報告，仍不脫傳統公務員報喜不報憂積習，且對藏人習性也不甚瞭解，蓋藏人長期受喇嘛教「薰陶」，對今生所受的苦楚，皆前世所作之「業」，因此只會默默忍受，以求來世之改變，而不會有「久苦差役繁重、極度剝削」之怨懟看法；對諸僧侶（喇嘛）方面之分析，頗為

³⁴ 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但此處係轉引自張雙智所揭專文，頁111。

³⁵ 《沈宗廉為報藏中各方對高度自治之態度致羅良鑑（時羅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電》，輯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但此處係轉引自張雙智前揭專文頁112。

正確，對官吏之分析，則完全與現實脫節，自熱振呼圖克圖被毒害而死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幾皆為親英派所把持，何來「老成一派」？親英派分子在英印蠱惑、撐腰下，一味向藏獨方向邁進，不過沈氏所稱「少數意志薄弱者，則在中央勢力未達前，不敢吐露真意」，則相當正確，曾有西方人分析西藏民族特色為「外柔順而內狡獪」³⁶，而熱振呼圖克圖對藏人性格也有「藏人多疑少斷、根性使然」的分析³⁷，可見沈氏稱一些藏人在中央勢力未達到前，不敢吐露真意，採觀望態度，算是相當深入的觀察。

西藏地方噶廈親英官員其政治手腕相當靈活，一方面鑑於二次大戰後，印度人不停反對英國之殖民統治，反英浪潮日益澎湃，西藏方面對英國之實力，已有所懷疑，且英國政府從未公開支持西藏獨立，多數喇嘛均傾向與中央接觸，但攝政打扎及噶廈親英官員，仍不願放棄藏獨思維，只是一則由於大多數喇嘛主張接受中央要求派出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形成一種壓力，另一方面又想從制憲國民大會中得到中央承認其近乎獨立的要求，於是很巧妙地以「慰問同盟國勝利」名義，派出西藏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就沈宗廉而言，西藏地方總算派出代表參加制憲國大，也可以說完成「任務」。

不過打扎及噶廈深知拉薩三大寺之活佛喇嘛一向主張親近中央，因所指派赴中央參與制憲之代表中，無一人為三大寺堪布，而且在 1945 年十一月三日，打扎及噶廈曾召集僧俗官員開一秘密會議，不邀三大寺堪布參加，會中決定向中央提出若干若干要求，但絕對保密，對此不但三大寺堪布不知其內容，沈宗廉對之也是一無所悉。噶廈希望這些代表在面見蔣介石時當面遞交，使中央惶促之間無法答覆，且借此拒絕出席制憲國民大會，何況其代表團名稱為「慰問同盟國勝利」，可以避開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之困擾，可見其手腕何其靈活，為了徹底保密，將其開會意見派專人秘密從青海走陸路到重慶，參與制憲制的代表及十四世達賴之二兄嘉樂頓珠，姐夫塔克拉彭措扎西等，則經印度轉往重慶，可見其意見書仍不脫西

³⁶ 見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 262。

³⁷ 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19，但此處係轉引自魏少輝《國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九世班禪返藏之磋商》一文，文載《青海民族研究》第 25 卷第二期，2014 年，頁 119~124。

藏獨立等內容。

此際（1945 年十一月），英印政府新任錫金政治官霍金森出面恐嚇西藏官員、貴族，指稱：「如西藏派員參加國民大會，是無異承認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則西藏現行政治體制自不容存在，現任官吏及貴族亦在淘汰之列。」³⁸顯然意在欺騙噶廈官員及貴族，中央所提高度自治，基本上只要求西藏為中國領土，其餘一切完全照舊，沈宗廉必然曾此意詳為解釋，因此霍金森之恫嚇並未發生作用；不過打扎及噶廈也自有想法，1946 年元月打扎召集噶廈重要官員，決定參與制憲之西藏代表在月內首途出發，但對代表作了以下三項規定：（一）以保持現有特殊地位為原則，不可任意發言，引起中央對藏用武力之決心；（二）如中央仍採懷柔政策，則要求獨立，最低限度要求完全自治；（三）如獲准獨立，則中藏地界之劃分依據西姆拉會議之條款。從而可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仍幻想西藏獨立。

西藏地方派出以下諸人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札薩喇嘛圖丹桑批、札薩凱墨·索朗旺堆（此二人為僧俗團長），土丹桑布、策旺頓珠、土丹參烈、土丹策丹等四人，另有家屬，達賴二兄嘉樂頓珠、姐夫塔克拉·彭措扎西（此二人均曾在中央政治學蒙藏班就讀，能操流利漢語，嘉樂頓珠更娶朱姓漢人女子為妻）、僕從等分兩批於 1946 年元月十四、二十五日從拉薩啟程赴印度，預計於四月底達上海。為此，沈宗廉特於元月二日先行赴印籌劃，並請准全程護送。

英印政府對西藏指派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感到非常不滿，想方設法要加阻攔，但卻找不到合適理由，由於印度氣候濕熱，毒蚊處處，這些代表們都是生長在乾冷的高原，對印度的濕熱很不習慣，都長了痲子，英印政府的霍金森卻說他們患了傳染病，並且親自陪同他們到醫院治療，更恐嚇地說：你們得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傳染病，不能熱帶地方住下去，如果繼續留在加爾各答，警察會把你們抓起來關到監獄裡，你們還是回到崗托，那裡天氣較涼爽。這些代表聽霍金森如此說，心裡非常恐懼，後來問久居加爾各答的藏人，才知道只是痲子，不是什麼傳染病，可見英印政府已是黔驢技窮，意想出這種下三濫的騙術，代表們知道自己得的只是痲子，當然不肯回到岡托，霍金森仍然堅持傳染病之說，代表們就找沈宗

³⁸ 同註 37 所引資料。

廉，在沈氏的協助下，將代表們安置到中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³⁹，到了中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後，受到熱情的接待，儘管英印還想阻攔，但已是無計可施。這些代表八人（另四人早已到印度），眷屬一人、達賴親屬二人、僕役十人，於四月四日搭機飛往南京。

按中華民國肇建伊始，以至 1946 年，對領土之規定，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至 1946 年擬制定之《中華民國憲法》，前後共有十部具憲法性質之法典，採兩種方式，其一為列舉式，其二為概括式，其為列舉式者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文字為：「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文字為：「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其文字為：「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蒙古、西藏等…」，明白一一列舉，其為概括式者，其大略均為：「中華民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或依其固有之疆域）……」，《五五憲草》係採列舉式，時為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其時國家正處於「黃金十年」，對國家前途充滿希望，因此採取列舉式，明白向舉世宣告蒙古（含內、外蒙古）西藏係中華民國土，不容侵掠，但次年（1937 年）即進入全面抗戰，且戰況不利，半壁江山為日本所占領，抗戰末期雖勝利曙光已現，但已是國窮民疲、滿目倉夷，民國三十二年（1943 年）對《五五憲草》進行修正，有關領土部分從列舉式改為概括式之「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⁴⁰，「固有之疆域」當然係前一個政權之疆域，中華民國係繼承大清帝國，則大清疆域即是中華民國疆域，清朝統有外蒙古、西藏，乃是世所公認者，設若西藏不是中國清朝領土，則英國之染指西藏，何須與中國清朝簽訂諸如：《西藏尼泊爾條約》（清咸豐六年，西元 1856 年）、《中英煙台條約》（光緒二年、西元 1876 年）、《中英藏印條約》（光緒十六年、西元 1890 年）、《中英藏印續約》（光緒十九年，西元 1893 年）、《中英拉薩條約》（光緒三十年，西元 1904 年，或稱《英藏條約》）、《中英新訂藏印條

³⁹ 見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但此處係轉引自張雙智前揭專文頁 113~114。

⁴⁰ 有關歷次具憲法性質之法典有關領土之規定，可參看荊知仁《中華民國立憲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92 年。

約》（光緒三十二年、西元 1906 年）等⁴¹，因此西藏為中國清朝領土，乃無庸置疑者。1946 年制憲時，對領土之規定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當然包括西藏，此也無庸置疑。

對此，英印政府仍不死心，透過霍金森將制憲中有關領土之條文告訴西藏地方噶廈，其目的仍在設法阻止西藏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而英國駐拉薩官員黎吉生認為只有設法使制憲國民大會無限期延會，使西藏代表無法參加具西方國家國會性質的國民大會，不參予制憲，則仍可表達西藏非中華民國領土；如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西藏代表參加了制憲國民大會，希望西藏代表團出面否認，為此，黎吉生拜訪攝政打扎、然巴噶倫及「外交局」索康扎薩（為索康旺欽格勒之父）等官員，仍想阻止西藏代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⁴²，制憲國民大會於民國三十五年底始召開，而西藏代表於四月即抵達南京，其間有半年多時間在內地，其所有食宿、交通、禮品、參觀費用全由蒙藏委員會專案報請由政府負擔，甚至每人還發給零用金，其他省區的制憲國代均無此等待遇，足見國民政府對西藏代表的特殊禮遇，而此項支出高達五億多元⁴³。

西藏代表到京後屢次表示要面謁蔣介石遞交西藏方面的意見書（前此由昌都方面派專人送到內地），不肯交由蒙藏委員會轉呈，蔣介石認為在未知意見書內容的情形下，如接下意見書而又不能同意西藏方面所提的條件，則有可能西藏代表拒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如是則不僅前功盡棄，且在憲法上將西藏納為領土的合法性，會遭到外國（尤其是英國）的置疑，因此一方面責成蒙藏委員會設法瞭解該意見書的內容，另一方面在制憲國民大會開議，蔣介石不接受這份意見書，事實上，西藏代表到南京後，蔣介石不止一次接見西藏代表或宴請前、後藏代表、嘉樂頓珠及塔克拉、彭措扎西，但都不讓西藏代表有呈遞意見機會，這是一場鬥智的博弈，顯然蔣氏智高一著，在制憲國大開議前，始終未接下這份意見書。1946 年十二月十三日，西藏代表團長圖丹桑批設宴，邀請西康、後藏制憲國代劉家

⁴¹ 各條約詳細內容，見王光祈譯《西藏外交文件》，有關簽訂各該條約經過情形，可參看劉學銑《中英有關西藏之條約》，蒙藏委員會，1988 年。

⁴² 見張雙智前引專文。

⁴³ 見車志慧《1946 年制憲國大與國民政府對西藏的政策》，該文刊載《甘肅社會科學》2014 年第五期，頁 148。

駒、計晉美、嘉饒嘉措、黃正清、麻傾翁、鄧珠娜姆、益喜達估等數十人，圖丹桑批在席間稱：「一、希望後藏代表對本大會（指制憲國大）或向政府任何機關及長官要求條件時，應本過去前後藏一家之精神，保持政教合一不受外來干涉；二、希望甘青康等區所屬藏族同胞及各位代表應以釋迦牟尼佛之傳統精神設法保護西藏；三、西藏是佛教國，故對西藏之政治地域等不能絲毫變動，更不希望在藏地駐扎國軍或政府對藏方有任何舉動，以免有污和平神」等語。這一段話仍然透露藏獨思維，受邀的喜饒嘉措、計晉美等當場加以駁斥。

制憲國民大會幾經拖延，終於決定在 1946 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開，西藏代表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得於十一月九日將意見書（正式名稱為《西藏僧俗官員全體大會要求西藏自治等九項呈文》）交蒙藏委員會轉呈國民政府，此九項意見大意如下：

- (一) 歷輩救主達賴在全藏各地完全有政教主權，……此種成規良法，永不改變，……
- (二) ……對於政教並施之國家，無須用彼有所損害之一切革新政策……西藏關於政教之一切主權應繼續由自己照舊掌握……
- (三) 上阿里三部、中衛藏四部、下西康四水六部等地皆為救主觀音達賴喇嘛之主要管轄區域，……
- (四) 漢藏施主情感能否永久融洽，全繫於漢藏邊境之安寧與否。語言文字服裝顯異于漢族的純粹藏族地區之……等地受邊境各省官吏之欺侮，次第被其侵占，……請國民政府悉予恢復及保護，俾佛教得以振興……
- (五) 西藏政教各法律命令以及內外文武一切大小之權……悉由西藏自主統領……
- (六) ……請國民政府將常駐西藏官員（按係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予以取消，至于漢藏施主間內事洽商，有西藏駐京代表長居內地，彼此可以電洽，……南京北平康定各設辦事處……未成立者（康定）似應成立。
- (七) 西藏如應派辦事大員至內地時，須由藏政府給以證明，……無藏政府證書者，不論僧俗何人，應請國民政府允予決不置理。

- (八) ……漢商者不論何人如須入藏者，先由國民政府通知藏政府，經藏政府認可後發給詳細證書，由邊界負責官吏查驗放行，……
- (九) ……西藏邊界如被外國發生爭端等情，應由有土地人民主權的西藏政府自行交涉解決……由漢藏施主關係，應需幫助之處，臨時請國民政府幫助……⁴⁴

從這份意見書可以看出西藏完全以獨立國家自居，也等於向中華民國中央提出獨立宣言，蔣介石之前之所以不願接受此項意見書，確有先見之明，如之前接下此意見書，當然不可能予以同意，是則西藏代表很可能打道回府，直到國大開議前三天始由蒙藏委員會接下此意見書，然後由該會轉呈，在時間上西藏代表不得不參與國大開議，按藏族制憲國代除前藏噶廈派出之八人外，尚有由後藏班禪堪布會議廳、西康藏族、青海藏族之代表，國民政府利用憲法草案各審查委員會之代表分配，促成班禪系統之代表與前藏噶廈所派之代表有了直接接觸，也讓西藏噶廈明白，前藏並不能代表國內所有藏族，有關藏族事務，不是噶廈說了算，這是很微妙的安排，按當時國民黨邊疆黨務處處長是蒙古籍李永新（字鶴齡，其本人也是制憲國大代表）很可能作出了相當貢獻，可惜李氏為人沈穩保守不喜誇耀自己的成就，對這一部分沒有留下紀錄。

在第一審查委員會中（係審查關於憲法前言、總綱、人民之權利義務及選舉），既有噶廈所派代表，也有班禪堪布會議廳所派之代表，而《總綱》第四條即為關於國家領土之規定，其文字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議決，不得變更之。」所謂「固有疆域」，前文已有說明，西藏噶廈所派出之制憲代表，既參與此條文之審查，等於認同西藏地方為「固有之疆域」，其為中華民國領土，已無庸置疑。參加此審查委員會之藏族制憲國大代表計有土丹策丹、土丹參烈、黃正清、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此為既成之史實，既無法篡改，更無從否認。1959年三月，十四世達賴及其家人，在康巴「四水六嶺衛教軍」簇擁下逃往印度後，即一再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可知其為無根之叫囂而已。至於第八審查委員會係審查關於蒙藏地方制度，噶廈所派出八名制憲國代與班禪堪布會議廳所派三位制憲國代均加入此一審查委員

⁴⁴ 見國史館《西藏國大代表問題處理》（1946年七月至九月，1946年十二月十九日）。

會，其人選為：土丹桑布、土丹策丹、策旺頓珠、土丹參烈、益西達估、絳巴阿旺、多吉歐珠、圖登生格（以上八人為噶廈所推派者）、計晉美、何巴敦、喜饒嘉措（以上三人為班禪堪布會議廳所派者）、黃正清、滇增堅贊（青海藏族代表），此一審查委員會藏族代表參加最多，所審查的蒙藏地方制度，攸關內蒙古（1946年元月五日中華民國已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憲法上之蒙古，只能指內蒙古，此處用內蒙古一詞，乃泛指外蒙古以外，中國境內各部蒙古而言，詳情可參看本文注 33 所引書）、西藏之地方制度，其中第一一九條「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第一二〇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這兩條內涵有頗大差異，對西藏而言，極為寬鬆，換言之，西藏地方無論實行何種程度的自治，包括所謂的「高度自治，都為憲法所保障，可說在中國境內給予最高規格之待遇，如論民族之差異性，聚居於新疆之維吾爾、哈薩克（也有部分散居於甘肅、青海）等族與內地漢人之差異，遠大族藏族與漢人之差異，其所以予西藏以極寬鬆之自治制度，英國之蠱惑、挑撥固有原因之一，更主要之原因實為自民國肇建以來，中央之力量從未到達西藏，其所以然者，中華民國之誕生，猶如早產兒，先天不足，而肇建伊始初有袁世凱之帝制自為，繼之以軍閥割據，每一軍閥之背後，均有一帝國主義者為之撐腰，終於引起日本之全面侵華，八年浴血抗戰之後，已是國疲民罷，對西藏之攜貳，已然心餘力拙，因而給予西藏以極寬鬆之自治。

五、結語

西藏之所以成為問題者追本溯源，肇端於有清一代之治邊政策（或可稱之為民族政策），創建清朝之女真族，興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原係邊疆少數民族之一支，入主中原之後，對中原漢人人數眾多，成為中國主體民族，深具戒心，遂想聯合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以與漢人對抗，又擔心各邊疆民族聯成一氣，因而採取民族隔離政策，既不讓漢人介入邊疆事務，如在中央的理藩院（部）中，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還有三個不重要的職位由漢人出任，康熙三十八年以後，連這三個「漢缺」都取消了⁴⁵，而清廷

⁴⁵ 見余梓東《清代民族政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

派駐邊疆地區之將軍、都統、大臣等，也全無由漢人出任⁴⁶，使漢人與邊疆地區、民族隔離起來；不僅如此，也不准各邊疆民族互相往來交流，如漠北喀爾喀蒙古歸附清朝之前，即嚴禁大漠南北之間蒙古人之往來（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康熙朝版），因此各邊疆民族形同孤立，而漢人既不能從事邊政工作，等於不知邊；而邊疆各民族與中國主體民族形成隔閡，此種情況在清朝實力尚強大，而無外力誘煽，尚無大碍，但清朝嘉慶、道光之後，國力停滯，而歐西各國拜工業革命之賜，國力突飛猛晉，不斷向外擴張，相形之下，清朝等於落後於歐西各國，咸同之後，更是每下愈況，遂形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之局面，西藏遂成俄、英競逐場域，而清廷所任駐藏辦事大臣，大多瞞頂無能尸位素餐，西藏與中央遂漸行漸遠。

民國肇建之後，雖倡言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但並沒有使西藏產生內向之心，反於民國二年與外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之獨立，而英國對西藏更是毫不鬆手，就在這一年英國命其駐華公使朱爾典以「威迫利誘」方式（引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一文，該文發表於1950年九月，後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①，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年，頁62），要袁世凱派員到印度西姆拉談判有關西藏問題，此即有名之西姆拉會議，商訂了一份草約，竟然創造出所謂「內藏」、「外藏」兩詞，並擅自劃下所謂「麥克馬洪線」，將西藏南部一些地方劃入印度，不過無論《西姆拉草約》或「麥克馬洪線」，中國政府既未批准、也不承認；雖則如此，西藏之離心未嘗稍遏。

國民政府北伐奠都南京之後，國家進入「黃金十年」，前途露出曙光，並想方設法與西藏當局展開接觸，也獲得若干進展，而有西藏駐京辦事處之設立。之後，十三世達賴圓寂，及其轉世靈童尋獲、坐床，國民政府運用智慧派大員入藏致祭、監臨坐床，並趁機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當時國民政府雖號稱統一，事實上地方勢力依然割據，中央力量並未能進入西藏，而有以上成就，實屬不易，因此對西藏之自治不得不採寬鬆政策，憲法一二〇條就條文表面看所謂「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究竟指西藏舊有之制度？或依據憲法另行制定自治制度，兩者似乎均合於憲法規定。十四世達賴流亡印度後，始終高喊西藏獨立，試想中共已經實

⁴⁶ 見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65。

質控制西藏，豈有可能讓西藏獨立，十四世達賴想利用美、歐、日等國欲分化、裂解中國（此處中國非僅指中共，泛指無論何人何黨執政的中國⁴⁷）的心理喊出西藏獨立，正投外人之所好，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十四世達賴一直是西方媒體的寵兒，但美、歐、日各國領袖或其政府高層的智商並不低，對達賴的態度往往只限於口惠而實不至的地步，兼以中共已從世界工廠轉化成世界市場，其對國際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德國曾有一份發現，西方國家領袖一旦接見十四世達賴，之後該國對中共之出口額平均減幅平均達 8.1%，這是所謂「達賴效應」⁴⁸，可見「達賴牌」的邊際效應，已在遞減之中，美、歐、日各國「玩」達賴牌的「興趣」也在遞減，「智廣如海」的達（按「達賴」係蒙古語「海」或湖的意譯，係蒙古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賜給宗喀巴三傳弟子鎖南嘉措的名號，可以延伸為智廣如海，鎖南嘉措不敢接受一美號，乃向上追尊宗喀巴嫡傳弟子為一世達賴，再傳弟子為二世達賴，自為三世達賴，從此代代轉世）了然此一趨勢，所以從高喊「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漸次降低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然而都沒有得到中共的回應，2017 年底西藏流亡政府主要負責人在紐約出席「2018 年藏漢聯誼新春酒會」時，再度傳達了達賴希望返回西藏的願望，以及流亡藏人不反中國和漢人的和解訊息⁴⁹，截至 2018 年元月 1 日止，大陸當局尚未有何回應，流亡藏人至今沒有「放棄藏獨」的任何具體作為，仍只停留喊話階段，中共豈會輕易允諾，更何況美、歐、日、印各國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十四世達賴投下不少金錢，豈肯輕易「放」他返回中國大陸（注意！中共僅同意達賴在履行中共所提條件下，返回大陸，而不是回西藏），達賴及其流亡政府似乎高估了自己，除非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實現中共所提出的三個條件（放棄西藏獨立、承認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三項係

⁴⁷ 歐洲曾兩次受到來自東方的攻擊，第一次為匈奴阿提拉，間接迫使西羅馬帝國覆亡，稱之為「上帝之鞭」；第二次為蒙古西征，統治俄羅斯百餘年，震驚歐洲，稱之為「黃禍」，而今中共崛起，又稱之為「中國威脅」，因此分化、裂解中國遂成為美、歐、日，對待中國之基本思維，其不承認蒙古、維吾爾（渠自認係突厥之裔）、西藏為中國人，也具有分化中國之意味。

⁴⁸ 見 2010 年十一月五日，台北《聯合報》A25 版。

⁴⁹ 見 2017 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A9 版。

1997 年十四世達賴訪台後新增加者），否則想回西藏難矣！

不過提起歷史上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問題，不難發現當中央政府力量強大時，幾乎沒有所謂邊疆民族問題，一旦中央國力衰微時，四周少數民族就開始躁動不安，推究其因邊臣疆吏的素質不良占很大成份，而作中國主體民族的漢人（所謂漢人，其最初期已包括華夏、東夷、百越及荊吳四大系民族，其後不斷吸納四周各少數民族，越到近代漢人之內涵越多元），樂於安土重遷，不若歐洲高加索種（即習稱之白種人）各民族之勇於冒險探索新地域，漢人寧可擠在內地過著地狹人稠、糧食不足的飢餓生活，而不肯向廣袤的邊疆地區墾拓，使邊疆民族與漢人無法交融而形成隔閡。自漢代以來的屯墾戍邊，原是促進民族融合的好方法，可惜歷代都以戍邊為主，屯墾為輔，一旦戍邊任務結束，屯墾也跟著撤離，以致屯墾不能落地生根⁵⁰，始終無法使邊疆與內地融為一體，形塑中國國族意識（此處用「中國國族」而不用「中華民族」者，實因「中華」等同「華夏」，而「華夏」與「夷狄」（泛指非華夏所有各民族）向為對立之一組詞稱，華夏民族係炎黃之胄，固無爭議，如強夷狄後裔之邊疆各民族也為炎黃之胄，這對邊疆各民族而言，真是情何以堪，按中國係由各民共同建構而成，各民族均為中國民族之一分，完全立於平等地位，因此稱中國國族應較合適），如是始能促進邊疆各民族對國家之認同感。

當然國家力量維持壯盛，從潛意識上平等對待邊疆民族以及鼓勵身為中國主體民族之漢人走向邊疆，促進交流創造融合，固為消彌邊疆問題作法；但對於外國之蠱惑，誘煽也應加以注意，如十四世達賴流亡印之最初十年尚頗安份，之後美、歐、日各國似發現攏絡達賴可以對中共產生制衡作用，或至少可以讓中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感到離堪，而達賴也發覺玩「國際牌」或可使中共讓步，達到其幻想中的獨立；於是美、歐、日各國或假「民間」團體邀達賴或達賴主動表示要出訪各國，截至 2005 年，渠出訪各國達二百四十九次，之後至 2015 年訪美次數更多達四十次⁵¹，自

⁵⁰ 有關歷代屯墾戍邊詳情，可參看馬大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和現狀》，該文輯入《馬大正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462~487。

⁵¹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275，及劉學鈔《2015 年媒體對新疆、西藏報導之分析》，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205 期，中國邊政協會，2016 年三月。

1991 年至 2014 年，美國連續四位總統接見達賴合計有十二次之多，具體情況是老布希接見一次、柯林頓接見五次、小布希接見三次、歐巴馬接見三次⁵²，可見美國、達賴都在彼此利用對方，但從結果論看，似乎都沒有達到目的。

十四世達賴如果真的「西藏不尋求獨立」（見 2017 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A9 版），應該首先宣布廢除《西藏流亡藏人憲章》，回歸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二〇條明白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任何形式的自治，都合於憲法的規定。

⁵² 見張穎《民國時期的藏獨鬧劇與反藏獨的鬥爭》，文載《理論學刊》2015 年十月第十期，總第 260 期。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拋棄惡妻假友，才能獲得安樂。（藏族）
壞人一個就多，好人過百嫌少。（藏族）
摯友背後誇你，仇人當面誇你。（維吾爾族）
休言沙漠沒有狼，莫道身邊無敵人。（維吾爾族）
有一千隻綿羊，不如有一百個朋友。（維吾爾族）
流水靠溪流匯成，美人靠服飾裝扮。（怒族）
離開了人群，遇上了強盜。（烏孜別克族）
一碗甜酒臉紅潤，十碗甜酒病纏身。（黎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十頓吃傷，十頓喝湯。（苗族）
睡久的人站不得，餓久的飽不得。（彝族）
好吃的宜吞，好嚼的宜吐。（傣族）
不要吃著甜的就咽，不要吃著苦的就吐。（德昂族）
人選合適的衣帽穿戴，鳥擇高大的樹木搭窩。（滿族）
喝酒不要過量，用牛不要過度。（蒙古族）
一年糧不接，十年趕不上。（布衣族）
女人無丈夫好似沒有頭的斗笠，男人無妻室像匹沒有
繮繩的馬。（水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西蒙梟雄噶爾丹

章維淳
大學教師

提起蒙古就令人想到滾滾黃沙遮天蔽日的戈壁大沙漠，以及一望無際的莽莽草原，如果就蒙古地理景觀而言，沙漠跟草原確實占了極大的比例，其實「蒙古」不純然是地理名詞，她還是民族的稱謂，說到蒙古民族，固然首推令世人既敬佩又畏懼的成吉思汗鐵木真，但是除了成吉思汗外，蒙古民族還有許多值得稱道的人物，本文擬挑選一個不同面向的梟雄式人物，他就是令康熙大帝頭痛不已的噶爾丹。

要說噶爾丹之前，先要把蒙古民族作個概略的介紹，否則對噶爾丹的背景會有茫然之感。按蒙古原先大約在唐朝時（西元 618-907 年）還只是個小部落，生活在大興安嶺以西，接近呼倫泊，貝爾泊一帶地方，也就是靠近額爾古納河（是黑龍江上游，在蒙古文獻中稱之為望建河），是八部室韋中的一部，稱為蒙兀室韋，這是最早的蒙古部落，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蒙古部落，成吉思汗就是源出於這一部分的蒙古族，後來《新元史》就稱這一部分的蒙古族稱為黑達達或蒙古本支。隨著契丹遼的沒落，蒙古部落卻逐漸壯大了，到了女真金的時候，蒙古族或多或少已經給金朝造成了若干威脅，所以金朝曾對蒙古下了「滅丁」之令，所謂「滅丁」，就是要殺盡蒙古族男子，然而蒙古族並沒有因此就被消滅。後來蒙古族越過呼倫泊、貝爾泊，進入現在外蒙古東部土拉河、鄂楞河一帶游牧，蒙古部族更為強大了，周圍許多不是蒙古族的部落，像篾爾乞、塔塔兒、汪古……等民族，都慢慢的或者是被蒙古征服了，或者自動的併入了蒙古。在整個北亞洲，東起大興安嶺，一路向西到薩彥嶺，都是崇山峻嶺有著茂密的森林，其間散佈著幾十百種不同的民族，在《元朝祕史》這部書中，泛稱之為「林木中百姓」，成吉思汗崛起後，一一加以征服，以及在今外蒙古中部，西部的克烈部，乃蠻部（這兩個部落都是突厥系民族），也都被成吉思汗給征服了，這些原本不是蒙古族，後來被征服或自動歸併到蒙古族裡，《元史》、《新元史》稱之為野達達或白達達，也就是蒙古別支。噶

爾丹是準噶爾部，其前身是林木中百姓，所以不是蒙古本支，是屬於野達達或白達達的蒙古別支，蒙古本支和別支之間，始終有些隔閡，從元朝以後的歷史發展，時時可以看到蒙古本支和別支之間對立的情況，曾經捕獲明英宗朱祁鎮的瓦剌，就是準噶爾部的前身。

林木中百姓原是種類繁多的部落，所以《元朝祕史》裡稱之為「禿棉幹亦刺特」，就是上萬種的林木中百姓，後來被征服後統歸哈刺忽刺統轄，哈刺忽刺姓綽羅斯，他的後人分別成為杜爾伯特、準噶爾兩部，其實準噶爾原來不是部落的名稱，只是因為這一部在左邊游牧，蒙古話讀左邊為準噶爾，就慢慢成為部落名稱了。前面說過蒙古有本支、別支兩大部分，本支部分原先統稱之為喀爾喀，幾乎都是聚居在東北以及今外蒙古中部、東部以及漠南內蒙古；蒙古別支則由準噶爾、杜爾伯特、克烈部後裔的土爾扈特，輝特以及由本支分出來的和碩特幾部所構成，他們彼此結為聯盟，稱之為「衛刺特」（這個說法還有商榷的空間），明朝時稱之為外刺或瓦剌，其中以準噶爾部最為強大，常常恃強占有水豐草美的牧地，所以在明末崇禎朱由檢時（西元 1628-1644 年），和碩特部遷往青海，土爾扈特部遷到伏爾迦河下游、裡海北岸去游牧，但是各部之間仍保持互為婚姻的關係；所以在明末清初時，準噶爾的大本營在天山北路，杜爾伯特則在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基本上跟明朝或清初都是處於對立的狀態。

元朝之後，各部蒙古都篤信西藏式的佛教，也就是自明清以來所謂的喇嘛教，準噶爾部也不例外，噶爾丹是準噶爾部巴圖爾琿台吉汗的兒子，小的時候曾到西藏拉薩出家當喇嘛（也就是漢人社會所謂之和尚），由於他是準噶爾貴族，所以一到寺廟，就給了他「呼圖克圖」的稱號，所謂「呼圖克圖」，是蒙古語，最簡單的說，就是轉世活佛，是清朝為了籠絡蒙古喇嘛而給的一種稱號，「呼圖克圖」圓寂後可以轉世，地位較高的，在清朝主管邊疆事務的理藩院，都列冊予以登記。可見號稱眾生平等的佛門之中，貴族子弟還是享有「特權」，想必釋迦牟尼對此也無可奈何。不過這中間蘊藏著一段極微妙的政治動機，事情是這樣的；西藏佛教原有薩迦、噶舉、噶丹及寧瑪四大派，以及希解、覺囊等小派，自元朝遵奉薩迦派的八思巴為帝師之後，薩迦派就掌握了西藏地區的政治權力，元朝滅亡後，西藏內部宗教也有了變化，噶舉派興起，取代了薩迦派，成為西藏地

區政治的主宰，如所周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西藏地區僧侶也就是喇嘛，在享有世俗的政治權力之餘，也忘記佛門悲天憫人，慈悲濟世的宗旨，而故弄玄虛，專持密咒甚至以吞刀吐火、幻形移遁、眩世惑俗，類同巫術，盡失佛家戒、定、慧的要求，以致竟有娶妻生子、私行不檢的情況，當時有高僧宗喀巴（本名羅桑札貝巴）起而進行宗教改革，創立格魯教派，嚴行戒律，力求慈悲濟世的佛門宗旨，一時大受藏人歡迎，取代了噶丹派而成為四大教派之一，但是政治權力仍操在噶舉派手中，不但對推展教務諸多不便，有時還會受到某種程度的迫害，於是聯合了在青海的和碩特蒙古，由和碩特固始汗率兵入藏。一舉摧毀了噶舉政權，可是固始汗卻長川駐在拉薩，實際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權，固始汗死後，他的子孫仍然在拉薩統治著西藏，這對格魯派想一手掌握政教兩權，是落空了，於是便想藉著強大的準噶爾力量，來遂行這個政教合一的美夢，因此對噶爾丹給予特別的禮遇。

噶爾丹的父親巴圖爾琿台吉，是準噶爾部的首長，而準噶爾又是衛刺特四部中最強大的部落，領袖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各部，跟東部韃靼部蒙古（元帝妥歡帖木爾退出北京後，既未改國號，也一直稱皇帝，還傳了好幾位皇帝，後來鬼力赤殺元帝脫古思鐵木兒，這才去掉元國號改稱韃靼，改皇帝為可汗）相抗衡，所以巴圖爾琿台吉在當時是一位極有地位，也極有影響力的蒙古領袖人物，他有至少六個以上的兒子，噶爾丹是他第六個兒子，此人野心勃勃而且極具智慧，深知蒙古人非常迷信喇嘛教，如果自己能有喇嘛教上的經歷，必然會得到多數人民的信賴，這樣在未來競逐準噶爾汗位時，會增加一項有利的條件，因此他到拉薩當喇嘛時，是懷著極大的目的，他也深知喇嘛也是人，其中能夠摒除物質享受的高僧固然所在多有，但是深受物質誘惑，甘願以心為形役的也為數不少，噶爾丹到拉薩時，就帶了許多金銀珠寶，用來賄賂寺廟中高級僧侶，換取免受戒律的約束，再以「呼圖克圖」的名號，廣事結交，所以他雖著袈裟，卻跟花花公子無甚出入，據清代梁汾在《西陲要略》卷七〈噶爾且傳〉（按噶爾且就是噶爾丹）所載說噶爾丹「不甚學梵書（是指佛教經典而言），顧時時取短檠摩弄」，可見噶爾丹絕不是潛心向佛之人，他之進入佛門，只是要累積爭取汗位的政治資本而已。

噶爾丹雖然身在佛門，但他卻心繫塵世，他視野開闊，聰明點慧，他觀察當時客觀的政治情勢，東方有新興女真族所建的大清帝國，正在開疆闢土，銳不可當，是碰不得的，而北邊有大國俄羅斯，也難與抗衡，而西藏當時也還沒有納入大清版圖，跟自己準噶爾一樣，正在設法不讓大清力量向西擴張，在這種情勢下，準噶爾要想有所發展，只好向東尚未被滿清征服的喀爾喀蒙古（也就是漠北外蒙古）下手，何況漠北喀爾喀蒙古人也



9.1 噶爾丹像

篤奉喇嘛教，自己這一身架裟跟呼圖克圖的名號，在向喀爾喀發展的途徑上，都派得上用場。噶爾丹雖然在拉薩出家，但是卻經常跑回準噶爾，以便掌握準噶爾部的實際情況，以及部署自己的力量，噶爾丹的這一套如意算盤，正打到了當時西藏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的心坎裡去了。前面說過五世達賴喇嘛為了要摧毀噶舉政權，不惜勾結和碩特部蒙古固始汗，率兵入藏一舉擊垮了噶舉政權，可是固始汗自己卻常駐拉薩，實際上統治藏地，這對一心想獨

攬政教兩權的五世達賴喇嘛而言，無異是換湯不換藥，更何況滿清帝國如旭日初升，來勢洶洶，也要設法加以阻止，以免藏地落入大清帝國之手，而西藏雖然地大卻是物瘠，人口稀少，想憑藏地之力阻止大清，是絕無可能之事，所以如果想要擊退掌控藏地政權的和碩特蒙古需要假手準噶爾，想要阻止大清向藏地擴張，需要在別的地方點火，使清廷忙於救火，而無力向藏地擴充，而這個在別的地方挑釁的工作，也需要假手準噶爾，培植噶爾丹是個長程工作，假設有朝一日噶爾丹奪得準噶爾汗位，那麼準噶爾就會成五世達賴喇嘛手中的一把利刃，以之對付大清帝國，雖未必遊刃有餘，但是卻可以延緩大清帝國向西藏下手的時間，事後證明五世達賴喇嘛算盤打得既精且準，無愧「達賴」智廣如海的稱號，（按「達賴」這個辭是蒙古語海洋的意思，可以延伸為智廣如海，原來是漠南內蒙古阿勒坦汗，有些文獻寫作俺答汗贈送給格魯派高僧索南嘉措的稱號，索南嘉措向上追溯了兩世，自己只稱達賴喇嘛三世，而一世達賴喇嘛根登珠巴就是宗喀巴的弟子，從三世達賴喇嘛之後，世世代代都稱為達賴喇嘛。）

自古以來沒有長生不老的人，準噶爾汗巴圖爾琿台吉於西元 1653 年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 10 年）冬去世，（關於巴圖爾琿台吉去世年份，眾說紛紜，這裡用的是《咱雅班第達傳》，因為咱雅參加了巴圖爾琿台吉的喪禮，也許比較可靠些），消息傳到拉薩，當然會有一段時間，噶爾丹聞訊，兼程趕回準噶爾，臨行前五世達賴喇嘛以「博碩克圖汗」的稱號，給了噶爾丹用以拉抬他在準噶爾部的聲望，同時又派了喇嘛奈沖鄂木去準噶爾，以便「協助」噶爾丹競逐汗位，但是汗位則由巴圖爾琿台吉較年長的兒子僧格繼承，但是內部情勢並不穩定，噶爾丹以靜制動，在這個時間他靜下心來對各種情勢作深入的判斷，發現可以結交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正向東部西伯利亞發展，勢必會跟大清帝國發生衝突，這時如果準噶爾向東掠奪漠北喀爾喀蒙古，應該會是一個很適當的時機；只是自己尚未奪得汗位，一切計畫只能暗中進行，恰巧此時有一位俄羅斯使者叫伯林的，到準噶爾地方來，於是噶爾丹就跟伯林搭上了線，主動表示自己親俄的主張，以換取俄羅斯的支持，因為他深知如果沒有俄羅斯的支持，縱然自己成為準噶爾的汗，一旦發動掠奪喀爾喀時，俄羅斯正可以襲擊自己的後方，從這一點看，噶爾丹並非有勇無謀的一介莽夫。

僧格當準噶爾汗六年後，被異母兄弟車臣汗跟卓特巴巴圖爾殺死了，當時和碩特、杜爾伯特以及一些衛拉特蒙古貴族，都覬覦這個汗位，結果噶爾丹在西藏喇嘛奈沖鄂木的協助下，以及達賴喇嘛所給的「博碩克圖汗」的名號，奪得了準噶爾部的汗位，從此大權在握，逐步遂行他向外擴張，建立準噶爾汗國的計畫。

噶爾丹當上了準噶爾汗之後，積極向外擴張勢力，天山南路也就是後代習稱的塔里木盆地，以及中亞細亞東部都被噶爾丹征服了，準噶爾汗國的輪廓形成了，由於噶爾丹曾經是五世達賴喇嘛的入門弟子，所以無形中準噶爾汗國也成為喇嘛王國的版圖，噶爾丹固然有勇有謀，但是他不知道他始終只是「智廣如海」的五世達賴喇嘛手中的一顆棋子，下棋的人想把棋子擺在那裡，棋子就只好擺在那裡，棋子本身是沒有主見的。雖然噶爾丹最後覺悟了，可惜為時已晚，那只不過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已，這事後話，留待最後再說。

原來衛刺特蒙古是蒙古別支，依照成吉思汗的規定，只有蒙古本支裡成吉思汗嫡系子孫，也就是史家所稱的「黃金氏族」，才有資格繼承蒙古

大汗的寶座，蒙古別支的衛刺特，不論才華如何出眾，都不能成為蒙古的大汗，噶爾丹的祖先也先所領導的瓦剌，勢力盛極一時，且曾經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之西）活捉了明英宗，但是也仍然沒當成蒙古大汗。噶爾丹明知「非黃金氏族，不得為蒙古大汗」，是草原上流行已久的鐵律，但他卻不死心，胸懷統一全蒙古的雄心壯志，想要達到這個願望先要拿下漠北喀爾喀蒙古，所以他在威服天山南路，中亞東部之後，就把目標放在漠北喀爾喀了。

提起漠北喀爾喀蒙古，許多人誤以為漠北蒙古（也即大家所習稱的外蒙古）才是蒙古族的中心，這種看法絕對是錯的，蒙古自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歷任皇帝都還有一個蒙古大汗的名號，例如忽必烈的漢文廟號是（元）世祖，他的汗號是薛禪可汗，現在將歷任元朝皇帝的本名、廟號，漢文諡號跟蒙古汗號，列表如下：

本名	廟號	漢文諡號	蒙古汗號	備註
忽必烈	世祖	勝德神功 文武皇帝	薛禪可汗	使用中統、至元 2 年號， 共在位 34 年
鐵木耳	成宗	欽明廣孝皇帝	完澤篤可汗	使用元貞、大德 2 年號， 共在位 13 年
海山	武宗	仁惠宣孝皇帝	曲律可汗	使用至大年號，在位 4 年
愛育黎校力 八建	仁宗	聖文欽孝皇帝	普顏篤可汗	使用皇慶、延祐 2 年號， 共在位 9 年
碩德八剌	英宗	睿聖文孝皇帝	格堅可汗	使用至治年號，在位 3 年
也孫鐵木兒	無	無	無	使用泰定年號，在位 5 年
阿速吉八	無	無	無	使用天順年號，在位僅 1 月
和世琜	明宗	翼獻景孝皇帝	忽都篤可汗	使用天歷年號，在位 1 年
圖帖睦爾	文宗	聖明元孝皇帝	札篤牙可汗	使用至順年號，在位 3 年
懿璘質班	寧宗	沖聖嗣孝皇帝	無	在位僅 1 月，無年號
妥權帖睦爾	惠宗	無	烏恰克圖可 汗	使用元統、至正 2 年號， 在位 38 年，明人謚之為 順帝

本名	廟號	漢文諡號	蒙古汗號	備註
愛猷識理達臘	昭宗	無	必里克圖可汗	使用宣光年號，在位 8 年

乃至後來去元國號改稱韃靼，去帝號改稱可汗，所有可汗都在漠南蒙古，也就是大家所習稱的內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是達延汗巴圖蒙和統一諸部蒙古後，把漠北地方封給他最小的兒子，這個小兒子叫格埒森札札賚爾，後來又逐漸分給三個後代，自行稱車臣汗、土謝圖汗跟札薩克圖汗，其下共有七個「鄂托克」（蒙古語部落），這就成為外蒙古三汗七旗的由來。外蒙古也即漠北喀爾喀蒙古，只是整個蒙古民族或蒙古文化的邊陲地帶，所以自元世祖忽必烈以來，從來沒有一個蒙古大汗出身自外蒙古，或死後葬於外蒙古，現在無論國內或國外，有許多人誤以為外蒙古才是蒙古的主體，這只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一種錯覺，這種錯覺並無法改變歷史既成的事實。這裡費了這麼些文字，只是要說明漠北喀爾喀蒙古不是蒙古的主體，噶爾丹看清了這種情勢，認為向漠北喀爾喀下手，不會引起整個蒙古民族的注意如果以事後發展來看噶爾丹的判斷顯然是正確的。

前面說過噶爾丹想要東侵略喀爾喀，就先得先安撫俄羅斯，這樣才不會有後顧之憂，而此時俄羅斯正在向東西伯利亞擴張，要趁大清帝國尚未統一全中國之前，趕快侵城掠池，搶到一塊是一塊，奪得兩塊成一雙，聽說準噶爾噶爾丹要東掠喀爾喀，而俄羅斯也正要掠奪喀爾喀北方自貝加爾湖至額爾古納河之間 30 幾萬平方公里之地，布里雅特蒙古人聚居的地方，如果能跟噶爾丹同時發動攻勢，大清帝國必然是顧此失彼，而喀爾喀緊鄰漠南各部蒙古，清朝一定先救漠南各部蒙古，甚至出兵討伐準噶爾，這麼一來，清朝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來抵禦俄羅斯向東擴張的行動，所以俄羅斯對噶爾丹示好結盟的要求，自是欣然應允，準噶爾跟俄羅斯的軍事同盟，於焉形成，這一段歷史經過，由於國人一向漠視邊疆事務，所以無論大學裡的「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或國高中的本國史幾乎一字未提，反而是外國人的論著中像前蘇聯學者，伊、亞、茲拉特金所著的《準噶爾汗國史》（馬曼麗譯，198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法國人勒尼·格書塞所著的《草原帝國》（魏英邦譯，1991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文獻，都記載了這段史事，講到這裡身為中國人能不覺得汗顏？



17 世紀末，俄羅斯正積極向東擴張，力量已到達布里雅特蒙古族聚居地區，甚至已達到黑龍江上游的額爾古納河西岸，而噶爾丹也正向東發展，在北、西兩路壓迫下，清廷不得不重視，於是在清帝愛新覺羅玄燁康熙 22 年 9 月（西元 1683 年）命使者警告噶爾丹所派遣使者到北京朝貢時（當時噶爾丹雖然野心勃勃，但以羽翼未豐，還不敢正面跟清廷衝突，所以還向清廷貢方物，其實也不是真心進貢，而是貪圖清廷的高額賞賜，同時調使團人數多達 1、2 千人，有時更多，在進京的途中，順便從事貿易，清廷的賞賜加上貿易所得，對準噶爾的經濟，有相當的幫助，這種情形從上古的匈奴到準噶爾，都沒有多大改變，所以向來北方游牧的胡族，都樂於向中原地區的王朝「進貢」，在北方胡族而言，這種「進貢」只是經濟行為，但是中原王朝卻一律從政治角度解讀，總認為是北方胡族歸向「天朝」的一種具體表徵）不得沿途搶掠。同時還派人招諭羅剎人（就是俄羅斯人，是 RUSSA 的音譯）不得擾掠黑龍江沿岸的居民。這種溫和的言詞警告，當然起不了實質的嚇阻作用，噶爾丹的使者沿途搶掠，俄羅斯的繼續東進，都依然故我的進行著。

但是康熙大帝不是因循苟且等閒之輩，他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幾個具有高瞻遠矚而又能洞燭機先的帝王，豈能容許俄羅斯蠶食式的侵略行為，

就在康熙 24 年（西元 1685 年）5 月，命彭春等人率軍攻下俄羅斯人所修築的雅克薩城，將城摧毀，強制俄羅斯人撤離，但是當大清軍隊撤退後，俄羅斯人又進入雅克薩，於是次（西元 1686 年）年又命薩布素再圍攻雅克薩，這樣逼得俄羅斯彼德大帝不得不派人來華希望商議中俄國界，次年，也就是康熙 27 年（西元 1688 年），清廷遣索額圖跟俄羅斯商議劃界問題。但是就在這一年夏天，準噶爾噶爾丹趁中俄商議劃分國界的關鍵時刻，



率準噶爾大軍越過抗愛山，把漠北喀爾喀三汗打得落花流水，最妙的是，在噶爾丹軍中，居然有五世達賴喇嘛所派濟隆呼圖克圖等許多喇嘛，這些披著袈裟，口宣慈悲為懷的出家人，在噶爾丹軍中似乎負有某種使命，（可參見《清聖祖朝實錄卷 181》，當時濟隆呼圖克圖是第六世），這一次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跟中俄商議劃界，竟然同在一個年份發生，可以說是巧合，如果說是噶爾丹跟俄羅斯事前有過周密的協商，似乎更為合理，因為這樣可以讓大清帝國顧此失彼以致手忙腳亂，如此一來，無論準噶爾噶爾丹或俄羅斯彼德大帝都易於各取所需，果然在康熙 28 年（西元 1689 年）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將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劃歸俄羅斯，從此布里雅特蒙古人成為俄國人，康熙之所以這麼做，是要騰出力量對付準噶爾噶爾丹，因為當時漠北喀爾喀三汗，還沒有歸附大清帝國，而漠北喀爾喀距北京近在咫尺，如果不能將噶爾丹逐出喀爾喀，北京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傾全力協助喀爾喀將噶爾丹趕出漠北，如果能完成這一目標，說不定漠北喀爾喀蒙古，會在感恩的情況下，親近大清進而成為大清的藩屬，所以在兩權相害取其輕的衡量下，跟俄羅斯簽下了「尼布楚條約」，犧牲了 30 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幾十萬布里雅特蒙古人。康熙一世英明竟然會簽訂這種喪失土地的條約，如果要探究原因，噶爾丹脫不了關係的，至於噶爾丹跟俄羅斯到底誰占到了便宜，看看

後來噶爾丹的下場，就應該清楚明白了。

且說噶爾丹跟好些個西藏呼圖克圖（就是活佛）率著準噶爾大軍打進漠北喀爾喀三千里之地，一路姦淫擄掠，濫殺喀爾喀蒙古人，可以說是無惡不作，喀爾喀三汗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外蒙古大活佛）共同集會討論後，決定向南投靠大清帝國，於是幾十萬人馬向南邊逃到大清王室上駟院所屬的達里岡厓牧場，並請求清廷救助，當時喀爾喀三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跟貴族集會研商時，曾有向北投靠俄羅斯或向南投靠大清帝國兩個意見，最後哲佛認為大清帝國跟喀爾喀蒙古人種相近、信仰相同，所以決定向南投靠大清，哲佛在漠北喀爾喀蒙古王公貴族間說話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而清廷也不負其殷切的期盼，立刻補給了許多牛、馬、羊等物質，濟助流亡的喀爾喀蒙古人，對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決定來歸，更是慰勉有加，這也是以後康熙大帝對哲佛始終優予禮遇的潛在原因，同時也承諾奪回漠北草原，好讓喀爾喀蒙古人重回自己的牧場，康熙後來果真實踐了這項承諾，親率大軍討伐噶爾丹，將他逐出喀爾喀，這事後話。

當噶爾丹大軍擄掠喀爾喀草原時，沿途燒殺絕不手軟，而那些個以「慈悲為懷」為修行宗旨像第六世濟隆呼圖克圖等西藏大喇嘛，並沒有加以勸阻，至於有沒有助紂為虐，以文獻沒有記載就不得而知了。據清廷所派出使喀爾喀的使者錢良擇在他所撰的《出塞紀略》中的記載，其情況為：「以木為匣用盛小兒，置於駝背」，「死者相枕，臭聞數里」，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中國人的記錄，不足為憑，且看看當時俄羅斯派有使者到噶爾丹軍中，充當策劃工作，隨準噶爾大軍穿越喀爾喀沿途所見的情形有如下的描述：「在那些蒙古草原上，住所都被卡爾梅克人（指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就是噶爾丹）洗劫一空了。那些屢遭洗劫的殘餘的蒙古人，在山溝和草原上飢餓地流浪著，並且人相食」（見俄使基此列夫的報告書）請問這時候濟隆呼圖克圖到那裡去了？如果說五世達賴喇嘛想借準噶爾噶爾丹的力量，掠奪喀爾喀，使大清帝國把主力投注到北方，延緩甚或無力對藏地的經略，這應該是很合理的推論，至於上天有好生之德或慈悲與否，就暫時不考慮了。

清廷一方面收容了南來投靠的幾十萬喀爾喀蒙古人，並請給予濟助，另一方面趕快解決跟俄羅斯的邊界糾葛，所以在戰勝（摧毀俄人所修築的

雅克薩城）的情況下，確定了割地的尼布楚條約，這是為了騰出兵力，以便全力對付噶爾丹，如果不把噶爾丹逐出漠北外蒙古，讓噶爾丹盤距外蒙古的話，就會威脅到北京的安全，何況集中全力征剿噶爾丹，將之逐出漠北，喀爾喀三汗必然會產生感恩之心，說不定可以不經過征討，就可以將漠北外蒙古納入大清版圖，後來事實的演變，都如康熙大帝所預料。康熙於其 29 年（西元 1690 年）親率大軍討伐準噶爾，命皇子愛新覺羅允禔出古北口，簡親王雅布出喜峰口，康熙自率中軍，與噶爾丹大戰於烏蘭布通（位於庫倫與張家口之間，離北京約 7 百里），康熙所率的清軍擁有由耶穌會教士所製造的大砲，轟得準噶爾軍隊落荒而逃，清軍原可趁勝追殺，一舉殲滅噶爾丹，這時西藏喇嘛六世濟隆呼圖克圖等 70 多人，向清軍表示上天有好生之德，噶爾丹只是輕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爾濟（都是西藏喇嘛）之言，入侵喀爾喀，確實不合理，現在已經吃了敗仗，請求大清放過一馬，原來西藏喇嘛在噶爾丹軍中，還負有戰敗求和的妙用。噶爾丹除了要濟隆呼圖克圖向清軍求和外，又派了達爾漢格隆等人帶了請罪誓書，到清軍福全大營請罪求和，並且說噶爾丹已經向大佛發誓，保證不再侵略喀爾喀，福全居然相信了，於是不再趁勝追殺，讓噶爾丹逃過一劫。

噶爾丹回到科布多後，休養生息整軍經武，統一蒙古的美夢再度萌芽，希望成為新成吉思汗的幻想（法人格魯賽在所著《草原帝國》一書中的用語），也重新湧上了心頭，新的東略行動，又再佈局醞釀之中，這邊大清軍隊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大草原後，喀爾喀三汗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幾十萬喀爾喀蒙古人，回到原來的駐牧地，心中對大清帝國充滿了感激，而康熙大帝更是善於把握機會，在康熙 30 年（西元 1691 年）刻意在靠近外蒙古的多倫舉行閱兵大典，並且邀約喀爾喀三汗前來觀禮，喀爾喀三汗親眼目睹大清八旗軍隊陣容堅強，而且噶爾丹的威脅仍在，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本身既無力抗衡噶爾丹，不如歸順大清帝國，接受八旗軍隊的保護更能高枕無憂，幾經考慮終於決定歸順大清，從此外蒙古納入了大清帝國的版圖，於是清廷也在漠北喀爾喀地區推行盟旗制度，清廷的收服外蒙古的過程，就像照康熙所編的劇本演出一樣的順利。噶爾丹野心既未戢，而雄心又蠢蠢欲動，經過五、六年的養生休息，在康熙 34 年（西元 1695 年），勾結漠南內蒙古一些王公再度東掠喀爾喀，於是康熙再度披

掛親征，他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軍為東路進入外蒙古，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為西路，率軍從寧夏進入外蒙古，康熙本人親統禁軍為中路，從獨石口進入外蒙古；康熙的中路軍在莽莽草原沙漠中走了 70 多天，沒有遇到噶爾丹大軍，反而是西路的費揚古在昭莫多其地（今稱宗莫德，在烏蘭巴托之南，按昭莫多，蒙語意為大樹林），遇到噶爾丹大軍，兩軍接戰，殺得噶爾丹大敗而逃，噶爾丹窮兵黷武，連準噶爾人民都不支持他了，因此噶爾丹的侄兒（前準噶爾汗僧格的兒子）策妄阿喇布坦受人民擁戴佔領了阿爾泰山以西的廣大地方，當噶爾丹在昭莫多大敗之後，無法回到伊犁一帶，他一方面派人向俄羅斯請求讓他逃到俄境，但是被拒絕了；另一方面派人入藏求援，可是使者又被清廷青海副都統給抓到了，這時噶爾丹就像喪家之犬一樣，感到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地，已經是窮途末路了。

可是康熙大帝深謀遠慮，確實瞭解如果不能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準噶爾始終會因為深度迷信喇嘛教，匍匐於達賴喇嘛座前，甘心成為其爪牙，所以要生擒噶爾丹，曾經多次派使者到噶爾丹那裡去，勸噶爾丹投降，但是以噶爾丹的梟雄性格，當然寧死不屈，康熙見勸降不成，只有臨之以兵威了，於是在康熙 36 年（西元 1697 年）三度御駕親征，噶爾丹逃到阿爾泰地區的阿察阿穆塔台地方，已經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雖然還想作困獸之鬥，但是一看身邊只有幾十個人馬，這時噶爾丹的處境，猶如秦末楚漢相爭時的西楚霸王項羽，被困於垓下，據清初官方史料記載，噶爾丹在走投無路而又有追兵在後的情況下，服毒自殺了，像魏源的《聖武記》，溫達的《親征朔漠方略》都做這種認定。但是西方的文獻卻另有看法，像法國人格魯賽的《草原帝國》一書頁 577（魏英邦譯，1991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就說噶爾丹在 1697 年（康熙 36 年）5 月 3 日病後死了。另外俄國人茲拉特金所著的《準噶爾汗國史》頁 300（馬曼麗譯，198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也說噶爾丹是病死的，當代大陸學者呂一燃先生曾經撰有〈噶爾丹“服藥自殺”辯偽〉一文，也認為是病死的，而非自殺（該文收入呂氏所著《中國北部邊疆歷史研究》一書中，中、外史料，古今文獻之所以會有這種出入，很可能是清朝的大臣為了討好康熙皇帝。反正噶爾丹已經死了（噶爾丹死於西元 1697 年，中外古今文獻所記載都是一致的）），說噶爾丹畏罪自殺，自然可以討得康熙皇帝的歡心，只要這個說

法，一旦被康熙認可，那麼以後所有文獻都必須記載成噶爾丹畏罪仰藥自殺，西方學者或現代學者，沒有這一層顧慮，所以可以秉筆直書，現在我們何妨依據噶爾丹的出身、性格加以判斷，看看他究竟是怎麼死的，按噶爾丹性格桀驁不馴，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了，還不肯投降，仍然想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一息尚存，總有東山再起之日，所以他不會自殺；其次，他曾到拉薩出家當喇嘛，也就是和尚，據佛教教義是要戒殺生的，而最大的殺生，就是自殺，所以在佛教教義裡，自殺的人，永世不得超生，儘管噶爾丹從不曾潛心修煉，也不可能有多高的道行，但是戒殺生，尤其不能自殺的基本佛教常識，他應該還是知道的，基於這點理由，他不會自殺，所以他應該是病死的，噶爾丹死時才 52 歲，算年齡並不大，噶爾丹自西元 1676 年從西藏拉薩趕回準噶爾爭奪汗位，到次年如願以償當上了準噶爾汗，到他死時，前後 22 年，可以說幾乎都在戰鬥之中，就一個軍人而言，他應該是無愧的。

當噶爾丹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時，回想自己 20 幾年北伐，西征所建立的準噶爾汗國，只因為輕信五世達賴喇嘛的話，向東掠奪漠北喀爾喀，而今落得如喪家之犬，不免感慨萬分，回顧來時路，對五世達賴喇嘛有了抱怨，他說：「我初不卻來克魯倫地方（指庫倫一帶，泛指漠北喀爾喀蒙古），為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是達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眾人矣！」（見日本人若松寬著，馬大正等編譯的《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一書頁 87，該書於 1994 年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清代溫達等所撰。《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一書，也記載了噶爾丹死前這一段追悔的話），噶爾丹一生可以說只是五世達賴喇嘛手裡的一顆棋子，或者只是西藏跟清廷鬥爭的馬前卒，如果從政略，戰略層面來看，噶爾丹只是五世達賴喇嘛的玩物而已，所以就政治智慧而言，噶爾丹之於五世達賴喇嘛，有如小巫之與大巫，被五世達賴喇嘛玩弄於股掌之間而不自覺，等於被人家賣了，還興沖沖幫著數鈔票，最後不但害了好幾萬準噶爾青年死於疆場，而自己也賠上了性命，雖然臨終前覺悟到自己始終只是五世達賴喇嘛的馬前卒，可惜為時已晚。

綜觀噶爾丹東侵一事，如果從較大面向觀察，牽涉到準噶爾噶爾丹、大清帝國康熙皇帝、西藏五世達賴喇嘛以及俄羅斯四方面，先說俄羅斯，

他承襲了蒙古金帳汗國（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及其子巴都所建）無限向外擴張的天性，西方有一位史學家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把斯拉夫人（指俄羅斯人）的皮剝掉，就是達旦人（此處指蒙古人）。」，俄羅斯之向外擴張可以說是天性使然，當然他發現準噶爾噶爾丹有意東掠喀爾喀，而且請求跟俄羅斯結盟，這下正中下懷，因為噶爾丹的東侵，可以吸引大清帝國的注意，這樣會減低對俄羅斯在更北的東部西伯利亞掠奪行動的注意力，俄羅斯趁噶爾丹東侵喀爾喀時，向清廷提出中俄劃界的要求，結果在雅克薩戰敗的情形下，卻在尼布楚條約中得到額爾古納河以西 30 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在這一場中俄蒙藏四方競爭行動中，俄羅斯成為最大贏家。

其次，西藏的五世達賴喇嘛，以其超乎常人的智慧、敏銳的觀察力，在宗教法王外衣的包裹下，透過宗教理想的誘惑，以空虛的名號像呼圖克圖、博碩克圖汗等，把噶爾丹玩得團團轉，讓噶爾丹為其擴大喇嘛教王國的「救贖」理想而鞠躬盡瘁，以口惠而實不至的方式，鼓勵噶爾丹向外擴張，並且派了在喇嘛教裡地位很高的濟隆呼圖克圖、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等高僧（在黃教也就是達賴喇嘛所屬的格魯派裡，有所謂四聖跟八大呼圖克圖，四聖是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跟章嘉呼圖克圖；八大呼圖克圖則指：章嘉、濟隆、錫埒爾、敏珠爾、阿嘉、喇果爾、桑薩及察罕；濟隆有時也作土觀）到噶爾丹軍中既是監督，又是協助，說監督是要看噶爾丹軍隊是否用心用力討伐喀爾喀，說協助則是當噶爾丹吃了敗仗時，好出面向清軍求和，這兩種目的，濟隆呼圖克圖等這些喇嘛都做到了。而鼓勵噶爾丹東侵最大的目的，則是想拖垮清軍，使清廷無法向西藏邁進，或者延緩經略西藏，就西藏而言，這種想法也不算錯，就政治謀略而言，甚至還可以稱之為高明的招數，只是從宗教家慈悲為懷、眾生平等的立場，驅使準噶爾人挑釁新興的大清帝國，等於拿準噶爾人當砲灰，這種「死道友，不死貧道」的做法，在道德上留下了很大爭議的空間；不過無論如何，大清帝國確實因為準噶爾的東掠喀爾喀，延緩了對西藏的經略，就這一點來看，五世達賴喇嘛也是一個贏家。

再說康熙皇帝這面向看，前面說過康熙是國史上極為少見的英明帝王，他深知如果不給準噶爾予以痛擊，任由噶爾丹侵占漠北喀爾喀草原，那麼大清帝國將不得安寧，只是當時喀爾喀三汗尚未內附，如果主動出

擊，將是師出無名，說來也巧，當噶爾丹東掠喀爾喀時，三汗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商議決定向南投奔大清，這就給了康熙討伐噶爾丹的藉口，前後三次御駕親征；這在國史上也是極其少見的，就憑這一點，許康熙以大帝之號，應該是很恰當的。只是為了集中全力對付噶爾丹，在中俄劃界時，竟喪失了自貝加爾湖至額爾古納河間的土地，使聚居在其間的布里雅特蒙古族，淪為俄羅斯國民，布里雅特蒙古人受俄羅斯統治二百多年後，到了 20 世紀初期，竟然鼓動十三世達賴喇嘛親俄，而且還在日本人支使下，從事「泛蒙古建國運動」，為中國帶了極大的困擾，如果就中、俄、準噶爾、五世達賴喇嘛的「賽局」而言，康熙大帝雖然贏局，但也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最後從噶爾丹方面來看，以噶爾丹當時的處境，實在沒有實力統一全蒙古，但是他雄心萬丈，並且深知要完成這個「美夢」，必得向外尋求助力，所以他向南方的拉薩希望得五世達賴喇嘛的贊助，因為他知道當時蒙古民族迷信喇嘛教，他以為他得到呼圖克圖跟博碩克圖汗的名號後，可以增加他的實力，其實從來只有「實至名歸」，徒擁虛名不會增加實力。另外，他忘了他自己對喇嘛教的虔誠信仰，會削弱了他理性判斷，自己成為五世達賴喇嘛向外擴張喇嘛王國的工具而不自知，就政治判斷而言，跟五世達賴喇嘛相較，要差多了。不過他北聯俄羅斯同時向大清帝國進逼，以便趁機取利，就戰略而言，也不算錯，只是他高估了俄羅斯能給他的助力，又低估了康熙的反應，最後竟連自己的生命也賠上了，不過他想統一全蒙古的想法，源於他的祖先也先、脫歡，希望由衛刺特蒙古誕生一個新成吉思汗，這種雄心壯志，自元朝覆亡後，一直是許多蒙古貴族的夢想，噶爾丹可以說是實踐的最轟轟烈烈的一個，許之為一代梟雄，應不為過。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解飢餓要靠自家飯，知冷暖只有貼心人。（回族）
城需要堅固的城門，人需要知心的朋友。（滿族）
畜靠肥膘，人靠知己。（滿族）
水深魚樂，情深人知。（毛南族）
人重感情，狗戀吃食。（土家族）
蜂蜜再甜，甜不過知心話。（哈尼族）
愛朋友勝過生命，縱然死去還留友情。（蒙古族）
與其牛羊多，不如朋友多。（蒙古族）
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舊的好。（蒙古族）
有了新交莫棄舊友，買了珊瑚蒙扔琥珀。（藏族）
只有箭一樣直的心，才能求得誠摯永恒的支情。（藏族）
哈達要潔白的好，朋友要知心的好。（藏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茶水喝足，百病可除。（維吾爾族）
十個遠親，不如一個近鄰。（瑤族）
遠山使木，近水食魚。（達斡爾族）
好吃不如寬住。（布依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張字檔〉的明代舊公文紙考析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 要

《滿文原檔》是清朝早期所記載的史料，許多人對於當時部分檔案將滿文紀錄於明代舊公文紙上，形成滿漢文雜處的現象，感覺好奇。因而有推論認為，清太祖努爾哈齊主政的天命年間，遼東紙張緊缺，以致不得不採用公庫中奪來的公文紙，勉強在漢字夾縫中紀錄軍政大事。對於這種說法，有人提出史料加以質疑，就是在天命八年（癸亥，1623）二月初六等紀錄裡，明明寫著庫房中有充公的紙張九十五刀等，為什麼不拿來使用，卻還要繼續使用明代舊公文紙？不過又有學者對此作出解釋，說女真人從汗、王、貝勒到一般平民，基於對上蒼神祇及祖先冥靈的尊崇，每年在各類祭祀活動中要消費大量紙張，自然其價極貴，所獲極難。在紙張奇缺的情況下，天命六年（辛酉，1621）〈張字檔〉捨高麗紙而用舊公文紙記注是合乎情理的。對於以上諸種說法，經過查核得知，〈荒字檔〉、〈晟字檔〉等所記最早起自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是以高麗紙書寫，似乎並沒有缺紙的情形。僅在天命六至九年（辛酉、壬戌、癸亥、甲子，1621-1624）這四年間，例外採用了明朝公文舊紙。而天命十年至十一年（乙丑、丙寅，1625-1626）這兩年間，再度回復使用新紙，此後清太宗天聰朝則完全採用高麗紙，再不曾使用明代舊公文紙。對此現象，本文以〈張字檔〉為例，得出統計數據，說明公文紙上的滿文紀錄，並非勉強寫在

漢字夾縫之中，而是完全凌駕在漢文之上，中規中矩，無視於漢字的存在。其狀況似非節約採用舊紙，而頗類似於《史記》所述「匈奴王以月氏王之頭顱為飲器」的故事，十足反映出天命三年（戊午，1618）努爾哈齊書寫〈七大恨〉告天起兵後的心態。當年後金兵鋒及於遼東諸城之後，搶奪而來的兵籍名冊等公文，意外成為最佳的洩憤目標，必加以拆毀、覆寫而後快。事實上當時明朝遼東七十餘城悉降，接收的官民物資充沛，要說後金天命政權缺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較可能的解釋則是，努爾哈齊針對明朝武力，除了直接加以打擊摧毀外，對於戰利品的兵籍名冊等，也同樣施以報復及羞辱，以享受征服者的樂趣。正如志費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上所說「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劫掠，然後他們離去」。在連寫四年舊紙，情緒發洩完畢之後，明朝舊公文紙的魅力不再，才又回歸正途，採用一般常見的高麗紙書寫記事了。由此可見所謂的「缺紙說」、「祭祀奢費說」等主張，雖能部分說明女真社會的生活與祭祀活動，卻不盡然能解釋〈張字檔〉上滿漢文雜處的奇特現象。

關鍵字：〈張字檔〉 征服者 努爾哈齊 蕭伯芝 明代舊公文紙 滿文

壹、前言

《滿文原檔》是清朝早期所記載的史料，¹該書的前身，稱為《舊滿洲檔》，²兩者刊行相差三十六年。

對於《滿文原檔》與《舊滿洲檔》的來龍去脈，學者陳捷先在《滿文

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

²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滿文原檔》與《舊滿洲檔》名稱雖不一樣，所錄檔案卻是相同的，只是照相、印刷技術的不同而已。

原檔》〈序〉言中有著詳細的說明：

十六世紀末葉，滿族興起，五十年間，由叢爾「小夷」躍升為大清國主，成就可謂神速。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父子於創建龍興大業之時，族中文臣以其草創新舊滿洲文字，記錄早年大小史事，前後歷時三十年，得四十冊，約五千頁，此即日後著名之滿洲開國舊檔也。乾隆年間，內閣官員發現舊檔因年久擦損而糟爛，乃有「托裱裝訂」並以當時流行之滿文重鈔分藏北京宮中及盛京（瀋陽）崇謨閣等處之事。按清朝制度，中秘收藏，外人不得共見，而此項檔冊又皆滿文書寫，更非一般人所能閱讀，故此一珍藏從此深藏宮中，形同湮滅。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本學人內藤虎次郎遊歷遼瀋，得窺乾隆時重鈔珍品，後影印回日本，命名《滿文老檔》，並專文介紹，世界學界乃漸知滿洲有舊檔矣。清末民初，清八旗族人金梁又用《滿洲秘檔》等名義，以漢文摘要譯述舊檔，刊行問世，從此清代「三百年來之祕史」遂部分公諸於世。民國五十八年（1969），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為便利專家研究，應世界學者請求，特將院藏此一瑰寶景印成書。余亦參與其事，時因付梓倉促，乃暫以《舊滿洲檔》為書名，用符乾隆帝當日諭旨中「舊滿洲檔冊」之語，並有別於乾隆時重鈔本亦即日人命名之《滿文老檔》也。《舊滿洲檔》不惟係滿洲檔冊中最原始之文件，實亦滿族崛興時唯一豐多美備之史料；蓋有關早年之行政事務、法律規章、官員任命、對外交涉、八旗組織、戰績紀錄、經濟生活、社會風俗、族內紛爭、殘殺亂倫等大小事件，應有盡有。後世清太祖、太宗實錄雖據以纂修，然隱諱刪飾處頗多，真相大改矣。又《舊滿洲檔》多以老滿文寫製，故語文學家欲探求新舊滿文之演變，亦必參考是檔也。據此可知：《舊滿洲檔》史料價值極高，為新舊滿文研究之偏師，當滿族歷史文化之瑰寶文獻，均無不可也。《舊滿洲檔》刊行迄今已三十六年，出版早罄，而學者專家求閱作研究參考者仍眾。今年又欣逢故宮博物院成立八十週年，院長石守謙博

士慧眼別開，決定再版此一珍藏，並重訂書名為《滿文原檔》；此誠大喜信息，亦造福學界之事也。月前該院圖書文獻處處長馮明珠教授萬里來書，索序於余，余不敢辭，爰書片語，以為推轂。陳捷先。謹識於加拿大溫哥華山邊屋。民國九十四年八月。³

陳捷先在〈序〉言中以稱許滿族興起，能在五十年間，由蕞爾「小夷」躍升為大清國主，成就神速作為開場。

接著介紹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父子，於創建龍興大業之時，不忘指派族中文臣草創滿文，記錄大小史事，歷時三十年，得四十冊滿洲開國舊檔。

然按照清朝制度，中秘收藏，外人不得共見，故此項檔冊珍藏深宮，形同湮滅。直到民國五十八年（1969），臺北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為便利專家研究，應各界請求，特將此一院藏瑰寶景印成書。由於陳捷先參與其事，負責為該書的命名事宜。根據他的說法，當年檔案出書時，因為付梓倉促，乃取材乾隆皇帝諭旨中「舊滿洲檔冊」的話語為書名，而命名為《舊滿洲檔》，以有別於日人命名的乾隆時重鈔本《滿文老檔》。

陳捷先的〈序〉言中將《舊滿洲檔》總共提了六次，最後話鋒一轉，才提到該書的新名稱《滿文原檔》。言下之意，對《舊滿洲檔》書名似乎舊情難捨，而不太認同《滿文原檔》這個新名稱。其實陳的欲言又止，這中間是有些緣故的。

因為當年為了這批史料出版的命名，曾經有過一番激辯。據學者李學智所寫的專書中稱，故宮的這批檔冊，應該稱為「老滿文原檔」才對，因為清高宗乾隆所說的「舊滿洲檔」，其實另有所指，並不是在稱這一批檔案：

由以上兩件史料，再參以陳先生靈感所據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敕命稽查「舊滿洲檔冊」開列清單札寄盛京、吉

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一，頁 iii。文中「推轂」一詞，較為罕見，說明如下。其注音：ㄊㄨ ㄇㄨˋ ㄍㄨˇ。漢語拼音：tu ī g ŭ。解釋：. 推動車輪軸，使車前進。《宋史·卷三六八·魏勝傳》：「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比喻推舉人才。《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比喻助人成事。

林、黑龍江將軍等補繪戰蹟圖的上諭，或可知臣工們就是「滿文老檔」中的地名史蹟，也無法一一鉤考，從戰蹟與圖所附的另一上諭及乾隆帝親題的六韻序文中所載，或知道戰蹟與圖所據的史料，僅是從清太祖、太宗實錄內所有的地名開列的清單。並不是據所謂「舊滿洲檔冊」。或可知所謂「舊滿洲檔冊」之難識了。不要說老滿文原檔了，就是當時重鈔的「滿文老檔」滿洲大學士尚且難據以開列清單，而乾隆帝也只有求其以「實錄」中的事蹟開列了。假若以上所論為不誤，那麼陳先生僅憑靈感而將乾隆所指重鈔的「滿文老檔」一時的異名「舊滿洲檔冊」，驟而張冠李戴的命名這四十冊的「老滿文原檔」，恐怕不太名實相符吧？這是我們對陳先生在「述略」第一節對我們命名「老滿文原檔」一名的批評，以及陳先生命名所提的理由及史料的辯證。⁴

李學智說明，乾隆所提及的「舊滿洲檔冊」，是當時按照《滿文原檔》重鈔而成的「滿文老檔」，也就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後來所整理、編譯，再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內閣藏本滿文老檔》，⁵卻並不是《滿文原檔》。

因此李學智大聲疾呼，指出陳捷先「張冠李戴的命名這四十冊的『老滿文原檔』」，這番論述，言之鑿鑿，尚屬可信。因而後來台北故宮以故宮博物院成立八十週年名義再版《舊滿洲檔》時，從善如流，採用了李的觀點，更改名稱為《滿文原檔》，而不再延續前稱的《舊滿洲檔》，總算還了李學智一個公道。

不過李、陳的爭論，不只是一部書名而已。對於檔案的內容判讀，雙方也曾有過激烈的交鋒。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書中滿文何以要寫在明代舊公文紙上」這個議題。其中牽涉到檔案寫就時序的認定，而歷史研究，常與時間先後有關，因此不能不謹慎將事。

於是用紙這種小問題，提出後就成為了大辯論。後來李學智甚至還拉

⁴ 李學智，〈評「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所謂「舊滿洲檔」〉，《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12-13。

⁵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

扯到大陸學者，加入自己陣營，聲勢看來頗為壯盛。但是學術上只講究是非對錯，並不是以投票多寡來決定勝負的。因此誰是誰非，還是需要針對議題，加以探索並詳細說明理由才行。

貳、回顧

只要翻開《滿文原檔》，除了第一冊外，第二冊到第五冊，所有天命朝的檔案，幾乎都會發現，滿文背後不時會跑出許多無關的漢字，形成一種奇觀，相當具有特色。

早期滿文專家廣祿、李學智，曾經對《滿文原檔》中這些特別的用紙，加以命名，稱其為「明代舊公文紙」。對於這類紙張，他們有如下的看法：

按現存的四十冊老滿文檔冊，其內容並不如中外學者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與整齊。它的內容，正和它的外貌(冊形)長短、寬窄、厚薄不一的情形，完全一樣；可謂表裏一致。就數年來整理所見，似乎清太宗一朝的檔冊；雖然其中亦多有殘闕與重複，但是若與太祖朝的檔冊比較起來，那就單純整齊的多了。現存清太祖朝的檔冊，雖僅有二十本；可是這二十本檔冊中，據我們的初步檢證，事實上並不完全是原檔，其中包括大部份書寫的真正老滿文原檔，以及一本可稱滿文最早木刻印刷的敕書檔（見圖八、九）。其他有一小部份是曾經後人重鈔過的滿文老檔。而所謂原檔，大致皆是利用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所寫或印成的。至於曾經後日重鈔的老檔，類皆用所謂高麗箋紙所書寫。太祖朝的二十本檔冊，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及印刷的原檔佔十一冊。用高麗箋紙所寫的老檔有九冊。但是這兩種檔冊的記事，常相互重複。而且不但是原檔與老檔的記事重複，就是原檔與原檔的記事也有重複的，老檔與老檔的記事也有重複的。然而何以知道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是原檔，而用高麗箋紙所寫的大半是後日重鈔的老檔呢？我們首先可從兩種檔冊所用的紙張上加以研究。⁶

⁶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

也就是廣祿、李學智認為，如果要判斷檔冊是否是重鈔過的滿文檔案，得研究用紙，從紙張的背景，就能判斷檔冊的先後順序。

這種觀點，先不論其是非對錯，直覺看來，方法是相當先進可取的。二十世紀隨著語言學的進步，曾經出現一種研究方法，稱作「文本分析法」，十分流行，就是秉持著探討文本的背景，而找出文章的深層涵義的。

文本分析法有各種不同的詮釋方法，而最常見的則是哈姆士萊（Martyn Hammersley）和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所歸納出的十一項要點，可讓研究者據以分析文件的「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而獲得啟發：

Hammersley 和 Atkinson(1995：173)看到這些問題：文件被如何寫成？被如何閱讀？誰寫了文件？誰讀了文件？為了什麼目的？在什麼特殊時機？帶來什麼結果？記錄了什麼？省略了什麼？作者視讀者的什麼為理所當然？讀者為了賦予文件意義需要知道什麼？Silverman(1993：63)使用這些問題來研究文件的社會組織，不論它們是對或錯。⁷

以上這一連串的疑問句，看似複雜，說穿了不過就是要讓研讀文本的學者，除了閱覽文章之外，還要面對文件所產生的歷史環境，做深入的瞭解而已。因為同樣一句話、一首詩、一幅畫，在不同的時空之下，涵義可能截然不同。因此這一連串的疑問其中有一項「在什麼特殊時機？On what occasions?」⁸，就顯得特別突出。關注於特殊時機，研究人員才會進而瞭解到事件產生的人、事、時、地、物各方面，融入古人的環境，「設身處地」，而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史學家的運用想像，與文學家的運用想像，殊有不同。文學家可以自由馳騁其想像，史學家則須將其想像投入歷史裏面去。西方史學家所盛倡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

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8。

⁷ Keith F. Punch 著；林世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與質化取向》，（台北市：心理，2005[民 94]，初版），頁 356。

⁸ Keith F. Punch,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228.

史學家應培育的想像。所謂歷史想像，是將自己放入歷史之中，進入歷史的情況，進入歷史的時間，進入歷史的空間，然後由此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如此易於得到歷史真理，而除去一些後代的附會。…中國史學家所屢談的「設身處地」，與西方史學家所強調的歷史想像，適相發明。此為史學家理解歷史極重要的方法，歷史真理自此隱約呈現。⁹

因此對於「明代舊公文紙」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滿文原檔》滿文的研究。「明代舊公文紙」是滿文存在的環境，紙張與文字二者相互依存，就「文本分析法」的觀點看來，重要性其實是相等的。

廣祿、李學智對這個議題，首先破題，開宗明義推論當時的滿人經濟生活狀態是「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清人要得到紙張就得依靠明人與朝鮮，自己是不大可能生產的：

我們首先可從兩種檔冊所用的紙張上加以研究：當然；在努爾哈赤尚未公開反抗明朝以前，清人或許會從明人與朝鮮得到紙張；可是從清人早期生活的情形看，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衣食恐怕尚難豐厚，對其日，常生活無關的紙張，當不致多所存貯，以備記事之用。¹⁰

這種說法，初步看來，也還算是正確的。因為滿人所居住的遼東一帶，明朝時隸屬於山東管轄，在建制上歸屬於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又稱為山東行都司。所謂「從明人得到紙張」，山東當為首選。山東能生產什麼紙張呢，可以從以下文章中得知：

《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載：“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即棉花)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棉花在元代經松江黃道婆將海南島棉紡技術傳入中原後便開始大量種植，到明代已遍布全國。明邱浚《大學衍義

⁹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市：杜維運出版：三民總經銷，民 81[1992]，十二版(增訂版)），頁 197。

¹⁰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8-19。

補》載：“木棉，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然是時猶未加以征賦，故宋元食貨所不載。至我國朝，其種乃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注：枲音 xi ㄒㄧ ㄊ | ㄩˋ，大麻的雄株)，蓋百倍焉。”棉紡業的興起大量取代了蠶桑絲織業，為桑皮造紙提供了充足原料，使河北遷安、涿州一帶及山東的桑皮紙有了進一步發展。山東當時也廣植桑樹，採集桑皮為原料，造出了有名的東昌紙、呈文紙等。¹¹

這裡說「山東當時也廣植桑樹，採集桑皮為原料，造出了有名的東昌紙、呈文紙等」，可見在明朝時，屬於山東管轄的遼東一帶，可以用到「有名的東昌紙、呈文紙等」，由於桑皮內涵膠質豐富，既然是以桑皮為原料的名紙，品質當不致太差。另外明朝時官方管理造紙業物，各省的產紙數量也有要求，如果造出的紙紮不合要求，朝廷會對其提調官治罪：

在南方浙、贛、閩、皖、川等省所產的竹紙、皮紙都成為“利市四方”的商品，而廣銷海內外，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一九五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每歲印造茶鹽引山契本鹽糧勘合等項今用紙紮，著令有司抄解……產紙地方分派造解額數：陝西十五萬張，湖廣十七萬張，山西十萬張，山東五萬五千張，福建四萬張，北平十萬張，浙江二十五萬張，江西二十萬張，河南五萬五千張，直隸三十八萬張。”“九年，以福建進到紙紮不合原式，及粗薄不堪，令按察司治提調官罪。”這些抄解紙紮是屬工部虞衡清吏司管理。當時產紙地域分佈很廣，按產紙地方紙的產量和質量分派造解額數，其中以浙江數額最大，25 萬張；其次是江西，20 萬張；而福建在明初，造紙產量與質量尚落後於其他各造紙省份，進到的紙紮不合要求，朝廷要對其提調官治罪。¹²

¹¹ 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市：山西教育，2006，第1版），頁313。

¹² 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市：山西教育，2006，第1版），頁313。

除了山東紙之外，滿人可得到紙張的第二項來源是朝鮮紙。朝鮮的造紙術早年得自中國，由於「朝鮮民族素來善於學習外來文化並有自己的創新」，所以基礎打得不錯：

中國的造紙術在西元 4 世紀末傳入朝鮮半島，當時朝鮮正處於新羅(57—937)、高句麗(39—668)和百濟(18—666)三個政權鼎立的三國時代。朝鮮民族素來善於學習外來文化並有自己的創新，在西元 7 世紀掌握了造紙術的百濟國，在史書中記載有“其國王聖明王的三子琳聖太子‘知造紙術，其紙質精良，鳴於天下’的贊譽”，並有曾到日本傳授技術的史實，可見當時朝鮮的造紙術已有了進步。¹³

後來明清時李成桂推翻王氏高麗，建立李朝，又改國號為朝鮮，再次統一半島，造紙業又得到進一步發展。李朝的高麗紙繼續在中國流行使用，評價極高，號稱「中外第一」：

明清時李成桂(1335—1408)推翻王氏高麗，建立李朝(1392—1910)，又改國號為朝鮮，再次統一半島，造紙業又得到進一步發展。這個時期主要以楮皮和桑皮為原料生產皮紙。朝鮮除積極學習中國造紙術並有所創新外，中國發明的活字版印刷術也很快傳到朝鮮半島，而且亦有所創新。由於當時朝鮮政府一貫對造紙和印刷的重視，朝鮮版本的圖書，也聞名於世界。明清時，李朝的高麗紙繼續在我國流行使用。明代沈德符(1578—1642)在《飛鳧語略》中提到“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箋為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脂玉。每番揭之為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箋”，適於書寫，但不適於繪畫。董其昌(1555—1636)、黃公望(1260—1354)等名家均喜歡用高麗鏡面箋寫字。這種紙還大量用於印書及佛經。明代屠隆在《考槃餘事》卷二談到：高麗紙的特點是“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

¹³ 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市：山西教育，2006，第 1 版），頁 399。

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¹⁴

由以上所述山東、朝鮮，盛產各種名紙的情形可知，滿人所居住的遼東一帶，要想獲得書寫用的紙張，似乎並不困難。

但是廣祿、李學智卻先說，「從清人早期生活的情形看，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衣食恐怕尚難豐厚，對其日常生活無關的紙張，當不致多所存貯，以備記事之用。」意為「清人早期不易得到大量朝鮮紙張」，還舉證說明這種情形，其詳細內容為：

證以朝鮮的申忠一圖錄一書裏說：「臣(即申忠一)以賚(當係齎字之誤。下齎字同)去盤纏，銅爐二口，匙二十枚，紙束，魚物等，言於馬臣(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部屬)曰：『俺慮途中或有缺乏之事，將此等物賚來。今別無所用，欲奉于都督(努爾哈赤)，此意何如？』馬臣曰：『不妨事』。臣即令馬臣送于奴酋兄弟(指努爾哈赤及其弟舒爾哈赤)。奴酋兄弟皆受之而多謝云。」此為明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朝鮮派往清太祖努爾哈赤居住的地方，作偵探情報工作的申忠一所記。文中曾言已有紙張送與努爾哈赤。然而所言紙束，原係申忠一準備於途中應用而剩餘的紙張，當不會甚多，或不足以供其日常記錄史事之用。至於史籍中明白記載清人得到大量高麗紙的時間，始見於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十一月，訂定朝鮮歲貢額內有：「大紙千帙，次紙千帙」之要求。但是清人所求朝鮮的歲貢，直到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征服朝鮮以後，始達到目的。由於清人早期不易得到大量朝鮮紙張，所以我們推測：凡用高麗箋紙書寫的檔冊，在時間上或應晚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¹⁵

這一段話，出現了兩個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當時朝鮮人申忠一到清太祖努爾哈齊住處，把用剩的紙張，贈

¹⁴ 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市：山西教育，2006，第1版)，頁401。

¹⁵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附錄(一)，頁19。

與努爾哈齊。而《滿文原檔》最早的紀錄，是始於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看來跟申忠一贈紙的時間，有十二年的差距。

第二個時間點落在崇德二年（1637），滿人所要求朝鮮的歲貢紙才到。這也與《滿文原檔》最晚的紀錄崇德元年（丙子，1636），相差了一年。

以上兩個時間點，一個過早，一個過晚，都與《滿文原檔》紀錄的時間點有些差距。其論證是否能代表《滿文原檔》書寫時候的用紙狀況，先決條件上，似乎就有一些疑問了。

與此類似的是，其論述開頭處，將滿人早期「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的經濟狀態，延伸推論到後金政權建立後記錄國家大事的用紙情形，一為民、一為官，怎堪類比，也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議題。

廣祿、李學智的論點一再出現引申過度的情形，或許才是引起陳捷先反駁的主因。陳在《舊滿洲檔》的序言中，以大篇幅的論述說明廣祿、李學智論點的不當，現摘錄如下：

譬如又有人認為凡是寫在或重鈔在高麗箋紙上的舊滿洲檔都至少是清太宗天聰六年以後的產品，因為那一年朝鮮政府才和滿洲部族訂立歲貢「大紙千帙、次紙千帙」的條約。以前滿洲人的衣食都有問題，對這些與日常生活關係不大的紙張必然不會多所貯存，那裏還夠供來做日常記錄史事之用？乍聽起來，不無道理。可是天聰六年以前滿洲部族中是不是存貯高麗箋紙或其他紙張呢？這事在滿文檔案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天命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記著：…意思是：「收取放置在汗庫裏的公課，不予增加，也不予減少，還照舊例徵納。禁止其他漢人官員私自零星擅取粳米、小麥、豆、胡麻、穀、菜、靛藍筆紙作公課的行為。…」天命八年二月初六日記載裏說：…意思是：「朝鮮第三次來的使者官員給汗所帶來的銀子、絹、棉紬、紙等物件，為了等兩國間的事情完結以後再說，先都存藏在瓦爾喀戰役中捕獲而被收養的那些官員的家中。由於(朝鮮人)不遵照指示把毛文龍抓來，只是誣騙而來收取消息，所以把那些存藏的東西都沒入公庫了。計有絹九十五匹，棉紬一百二十匹，紙

九十五帙，破紙七十五帙，蓋上油紙的涼帽十五頂…」又天命十年四月裡記著：…意思是：「初二日，汗去迎接前往征伐瓦爾喀的軍人，卯刻出瀋陽城的北門狩獵。…初三日早上，前往瓦爾喀的大臣們派人來向汗報告了。…殺了八隻牛祭纛，領兵的王善叔叔、達朱戶、車爾格等率眾軍向汗叩頭相見。…用一百隻野獸的肉和兩百瓶燒酒宴了軍士和編戶的人。初七日回兵。初八日給軍士們及編戶的人留下了五千卷紙。」根據滿洲源流考、戰蹟輿圖及聖武記等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東海瓦爾喀部的位址大約是在烏蘇里江上游，到綏芬河以西的濱海一帶，正是中韓兩國交界的地區。這裡所得到的紙張，相信都是高麗的產品了。留給軍士們就有「五千卷」，數量之多不能為少。就單以天命八年存庫的「九十五帙」好紙及「七十五帙」破紙來說，已足夠製成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了！總而言之，清太祖時代滿洲部族中就已經存有大量的高麗箋紙，用紙張的有無說明這些檔案的製作年代顯然有了問題。¹⁶

陳捷先以三段滿文記著「紙張」的檔案資料，來推翻廣祿、李學智所言「清人早期無紙」的論述。第一段清太祖照舊例徵納，禁止漢人官員們私自徵收遼東人民的「筆紙」。意思是清太祖努爾哈齊的公庫裡「有」這些東西，自然沒有需要多徵。另外第二段提到「紙九十五帙」、第三段所說「五千卷紙」等，都是在說庫存裡「有紙」，看來立論已經相當堅實了。陳捷先的文章雖未指名道姓，卻引起李學智的對號入座，曉得是在批評自己，馬上為文答覆如下。這時李學智沒有再拉廣祿一起來寫文章了，而是以個人名義發表並回覆的：

因此陳先生所引用的三段滿文記著「紙張」的「滿文老檔」中，陳先生能斷定那些紙張都是高麗箋紙嗎？第一段陳先生所引的滿文老檔，是清太祖禁止漢人官員們私自徵收遼東人民的「紙和筆」。當無法肯定當時遼東的漢人都用的是高麗箋

¹⁶ 陳捷先，〈「舊滿洲檔」述略〉，《舊滿洲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冊 1，序，頁 5-8。

紙。第二段陳先生所引用的滿文老檔，僅記載著朝鮮使者帶來的「紙九十五刀」，甚麼紙不知道。而且紙張之所為「刀」（滿文的 *kiyan*）也有大，也有小，據我們所知最大的就如我們現在的原開白報紙那大小，每一百張為一刀，其次是如同現在的八開紙的大小一樣，也是每一百張為一刀。最小的如同現在的十六開紙的大小，也是每一百張為一刀，這是當時大概的情形。因此清太宗天聰六年訂定朝鮮歲貢中曾明言「大紙千帙，次紙千帙」。但是陳先生所引的「滿文老檔」所記天命八年存庫的朝鮮紙張九十五刀，既沒有明白的記載是「甚麼紙」或是「大紙、次紙、小紙」，陳先生怎麼可以武斷「就只要這九十五帙紙，已足夠製成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了！」呢？¹⁷

李學智的答覆，明顯與陳捷先的論述，南轅北轍。陳捷先在說庫存裡「有紙」，而李學智的答覆卻是在反問，「怎能肯定那是高麗箋紙，或是那是小紙怎麼辦」之類的答辯。這種講法，似乎是說，不是高麗箋紙，就沒辦法寫滿文。不是大紙，也沒辦法寫滿文。

李學智堅持，不是高麗箋紙，就沒辦法寫滿文。這種理念，違反常識，不值得反駁。何況前面提過，「山東當時也廣植桑樹，採集桑皮為原料，造出了有名的東昌紙、呈文紙等」，這些紙張也是遼東地區尋常可見的品牌，因為山東、遼東在明代屬於同一轄區，有穩定的供需關係。若不用高麗箋紙，還有東昌紙、呈文紙等可用，何須等到清太宗天聰六年訂定朝鮮歲貢中的「大紙千帙，次紙千帙」才能寫字呢？

另外關於「不是大紙，也沒辦法寫滿文」一點，看看《滿文原檔》，廣祿、李學智自己整理的資料，第一冊中的〈荒字檔〉是高麗箋紙，所記時間是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三月至天命四年（1619）三月期間，紙張大小是縱長 57.0 公分、橫寬 22.5 公分，第六冊中的〈陽字檔〉也是高麗箋紙，所記時間是在天聰三年（1629）正、二、閏四月期間，紙張大小是縱長 36.2 公分、橫寬 24.1 公分。¹⁸〈荒字檔〉與〈陽字檔〉兩份檔案紙

¹⁷ 李學智，《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頁 29-30。

¹⁸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2、15。

張縱長大小懸殊，相差 11.2 公分，〈陽字檔〉僅為〈荒字檔〉縱長的百分之六十四大小。〈陽字檔〉雖是小紙，同樣可以記載滿文資料。可見「不是大紙，沒辦法寫滿文」的講法，也很無稽。

因此李這種答覆法，顯然在避重就輕，表示李學智已經無法自圓其說了。因為李的說法是，清人早期不易得到大量朝鮮紙張，缺乏紙張，所以才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檔冊。而陳捷先提出證據顯示，努爾哈齊攻佔遼東遼陽、瀋陽等地以後，公庫裡明顯並不缺紙，實無必要以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可知清初以明代舊公文紙書寫滿文，可能另有原因，與缺不缺紙並無關連。

辯論到這個階段，李學智其實應該就事論事，要不認錯，要不就該另尋有利證據，補充自己的立場答覆。以詭辯式的論述搪塞，當然是無法服眾的。

其實「不缺紙」的證據還有，不只以上陳捷先所列出的三則。例如天命六年（1621）九月二十四日，朝鮮王進貢獻紙，努爾哈齊以其於理不合，甚至拒絕接納，〈張字檔〉上的滿文記載是：

○ orin duin de, solho han i elein ting banse hafan isinjiha, han i ilan hojihon urgū dai efu, fusi efu, si uli efu, baduri sumingguwan erdeni baksi, sunja amban okdofi hecen i tule ebufi acaha, solho han, ting banse sere hafan be takūrafī tanggū yan menggun, susai miyanceo, susai kiyan hoošan, orin mušuri, susai boso, susai huwesi, juwan iolehe hoošan alban benjihe seme han de hengkileme jihe, han hendume juwe gurun sain banjiki seci ishunde gungneme beneme yabumbidere, sini ulin be bi alban gaici gebu ehe seme hendume gaihakū gemu bederebuhe.¹⁹

二十四日，朝鮮王所遣使者廳判事官至。汗之三婿烏爾古岱額駙、撫順額駙、西烏里額駙及總兵官巴都里、額爾德尼巴克什等五大臣出城外迎之。朝鮮王遣廳判事官入覲，獻銀百

¹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212-213。

兩、棉綢五十疋、紙五十刀、高麗夏布二十疋及布五十疋、刀五十把、油紙十刀。汗曰：“凡兩國欲相和好，應當互相饋贈。今我若納爾貢物，恐壞我名矣！”遂不納，盡卻之。²⁰

在朝鮮貢物奉上的紙張有兩種，一為「紙五十刀」，另一為「油紙十刀」等。其中「油紙」是一種防水紙，可做為油紙傘、雨帽的材料，不大適合寫字。而「紙五十刀」，不管是不是高麗箋紙，或者即使是小紙也無所謂，當然是適合寫字的物品。如果努爾哈齊宮中缺紙，就可以從善如流，直截了當接收下來了。不過清太祖努爾哈齊卻找了理由拒收，可見這點東西，他庫房裡多著，看不上眼，以致找理由說他並不要。

當然這份〈張字檔〉上的記事，如果讓李學智答覆，依他的觀點，或許他會說努爾哈齊是在「虛張聲勢」。因為〈張字檔〉整份滿文紀錄都寫在明代舊公文紙上的。也就是說，明明都已經缺紙，缺到要利用「回收品」廢紙記事了，卻還在「打腫臉充胖子」，把朝鮮送來的好紙，藉故退回。然而真相是否如此，就需要做進一步的檢驗，才能作數。因為許多事情的是非曲直，都要經過仔細推敲，才能做出正確的研判。否則僅憑直覺就下結論，那就是武斷，往往會鑄成大錯。

叁、驗證

本文擬以〈張字檔〉當作研究標的，是因為〈張字檔〉是努爾哈齊最早採用明代舊公文紙的開端。而在此之前，努爾哈齊的紀錄檔案還是採用一般白紙。因此理解了〈張字檔〉採用明代舊公文紙的原因，就大致可以曉得，其他天命朝採用這些舊紙的原因了。何況天命朝採用舊紙記事的檔案繁多，又長達四年之久，要一次全覽並不容易。

〈張字檔〉內的明代舊公文紙，大致來說，內容全是名冊與筆錄，除了少許的批示以外，大多是以工整的小楷漢字書寫，有的地方還蓋上官印或騎縫章，外觀相當權威。

而天命六年（1621）九月二十四日的滿文紀錄「朝鮮王進貢獻紙」，剛好就寫在一份明朝嘉靖拾柒年（1538）貳月貳拾捌日問案筆錄的移送公

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冊上，頁243。

文上，時間前後相差了八十三年，相當搶眼。不過二十四日的滿文紀錄在漢字的反面，以致許多漢字被遮蔽只留下片段而看不清楚了。所幸這份公文紙是連續的，翻開下一頁，滿文字數較少，掩蓋的文字不多，又是寫在紙張正面，文件的原貌就大致可以清晰辨識了，現將其抄錄於下，以供參考，可以看到底明代公文的真實面貌：

遼東都司經歷司為批詞事准本司經歷李闡關嘉靖拾柒年貳月拾貳日抄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史批狀據羅樂告前事蒙批經歷李闡問明解報蒙此依…例呈詳為此今將問過各犯招罪緣由同原蒙批狀及招書合行移關本司煩為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史處伏乞照詳施行惟此前事合行具呈施行須至呈者計開壹呈解枷杻犯人陸名羅鏞年參拾伍歲面尖無鬚吳正年貳…羅韋年參拾柒歲面尖有鬚羅樂年參…壹冠帶散行百戶壹員羅尚文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史²¹

以上公文，有些基本名詞，需要略加註解，才會比較容易了解。公文開頭所提到的遼東都司，全稱是「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都司只是簡稱。遼東都指揮使司是明朝在遼東地區設立的軍政機構。明代前期在建制上屬於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又稱為山東行都司。

遼東都司的上級機構「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可簡稱山東布政司，是明朝在華北平原東部、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的一級行政區名，下轄 6 府 15 州 89 縣。布政使司衙門駐於濟南府。劉鶚的《老殘遊記》中描寫濟南說：「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有如一幅江南風景畫，讓所有讀過該書的讀者對濟南的印象，都十分深刻。

遼東都指揮使司，下轄 25 個衛，2 個州。25 個衛的名稱為：定遼中衛、定遼左衛、定遼右衛、定遼前衛、定遼後衛、東寧衛、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廣寧衛、廣寧中衛、廣寧左衛、廣寧右衛、廣寧前衛、廣寧後衛、義州衛、廣寧後屯衛、廣寧中屯衛、廣寧左屯衛、廣寧右屯衛、廣寧前屯衛、瀋陽中衛、瀋陽左衛、瀋陽右衛、瀋陽中屯衛、鐵嶺

²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215。

衛、三萬衛、遼海衛等。2 個州的名稱為：自在州、安樂州等。²²

至於文中所寫的經歷司，則是明代官方常設衙署的一種，在各衛所均設置有經歷司。主要經辦所屬機構的文書出入等事務性工作，類似現代官署的祕書處，官階不高。例如都督府設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其屬下包括，經歷司、經歷，從五品。都事，從七品。又明朝設立十三道監察御史，共有一百一十人，為正七品。山東道監察御史有十人，主管察糾內外百官的業務，所協管衛所包含遼東都司在內。²³

明嘉靖年間巡按監察御史所司何事，在張金奎所著《明代衛所軍戶研究》中有一篇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端倪：

以上 8 個案例，除案例(7)外，其他案件中都出現了巡按御史的影子。巡按御史權力廣泛，複審冤案是其法定職權之一。但案例(2)、(3)、(4)、(6)顯示，巡按御史不是參與複審，而是最初的案件受理人。巡按御史出巡時是地方最高司法官員，直接接受訴狀，顯示不得越訟的規定到嘉靖年間已經不再發揮作用。作為最高司法人員，巡按御史不便直接審案，否則會使被告失去上訴的機會。但幾個案例顯示，巡按御史指派的案件初審人並不限於衛所鎮撫或都司斷事，還有經歷、指揮使、守備、兵備道以及通判，等等。前文曾經提到，經歷從明初開始即擁有司法權。兵備道官員一般兼有按察司僉事職銜，案例(2)中的鐵嶺衛指揮使羅九皋估計是掌印官，他們擁有司法權亦不意外。案例(7)起因於屯田地土糾紛，布政使栗在庭兼理遼東屯田，審理此案也不越權。案例(8)中的濟南府郝通判具體職責不清楚，遼東地區原則上隸屬山東布政司，郝通判估計是山東布政司派駐遼陽經理錢糧的官員，根據前面的分析，也擁有一定的司法權。唯一例外的是案例(4)中的殷尚質。殷尚質是以都指

²² 楊暘著，《明代遼東都司》，（鄭州市：中州古籍社出版：河南省新華發行，1988[民77]，第1版），附錄一，頁294。

²³ 蔡明倫著，《明代言官群體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2009，第1版），頁16-17。

揮體統行事的寧遠守備，屬營兵系統，並不具備斷案的資格，而且本案中原告于良臣誣告被告的是奸占弟媳以及拒還所欠財物，與軍情絲毫無涉。李巡按指定由其審理，估計與告狀人生活在其管轄地界內有關。可見，如果有巡按御史的授權，即便是無權過問司法的官員也可以臨時充任法官。在這種情況下，《大明律》及《問刑條例》的有關規定形同虛設，彰顯出強烈的人治色彩。²⁴

從上面這段分析裡可以看到，一名正七品的低階監察御史官員，從山東布政司巡查到了遼東地區，可以推動初審、複審，甚至指派的案件初審人，即使是「都指揮體統行事的寧遠守備，屬營兵系統，並不具備斷案的資格」的人，都可以經指派後，擔任審理，充任臨時法官。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大明律》及《問刑條例》的有關規定，形同虛設之外，還彰顯出強烈的人治色彩，並也顯示監察御史的權力之大，已經接近「無法無天」的失控狀態了。

那麼，這張看似廢紙的「批狀」，²⁵對生活在遼東地區的滿人來說，不正是「司法不公」的鐵證嗎？

回頭來看努爾哈齊於天命三年（1618、萬曆四十六年）四月間，宣佈攻明的誓詞〈七大恨〉，似乎正與怨恨明朝斷事不公，隱隱相合。〈七大恨〉原文為滿文，較為簡略。但是天聰四年（庚午，1630）正月日印刷漢文黃榜，卻是流傳較廣的版本，內容豐富，值得參考。清末明清史學者孟森還認為，這份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可信其正是原文」，其理由敘述如下：

七大恨原文今不見。並非實錄所載之文。今北京大學史料室存有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為再度入關複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實頗有不同，當尚是戊午原狀。事隔十三年，對明之心理尚未變。且明邊內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無謂，故有複述榜發之舉，可信其正是原文。縱有改竄，必

²⁴ 張金奎著，《明代衛所軍戶研究》，（北京市：線裝書局，2007，第1版），頁198。

²⁵ 批狀：是指上級官員在下級所呈文書末尾的空白處寫上批示。

最相近。實錄之始修，已在天聰九年，時已覺勝示七恨之徒揚己醜，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實，乃改竄以錄之。故有實錄以後，即是改本。²⁶

其實孟森所處的時代，《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等滿文資料，尚未出版，以致孟森誤信這份印刷黃榜正是原文。不過這份黃榜流傳較廣，內容比滿文豐富，參考價值更高。現列示如下：

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狂壅蔽，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害侵凌，千態萬狀。其勢之最大最慘者，計有七件：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於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癸巳年間，南關、北關、灰扒、兀刺、蒙古等九部，會兵攻我，南朝休戚不關，袖手坐視。仗庇皇天，大敗諸部。後我國復仇，（攻）破南關，遷入內地。贅南關吾兒忽答為婿，南朝責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復置故址。後北關攻南關，大肆擄掠，南朝毫不加罪。然我國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何以懷服？所謂惱恨二也。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見疑，故同遼陽副將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曰：『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夷人私入境內者殺。』後沿邊漢人私出境外，挖參採取。念山澤之利，係我過活，屢屢申稟上司，竟若罔聞，雖有冤怨，無門控（告），不得已遵循碑約，始敢動手傷毀，實欲信盟誓，杜將來，初非有意于欺背也。會值新巡撫下馬，例應叩賀，遂遣千骨里、方巾納等行禮，時上司不究出邊招釁之非，反執送禮行賀之人，勒要十夷償命。欺壓如此，情何以堪？所謂惱恨者三也。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我兩家結構，南朝公直解紛可也。緣何助兵馬，發火（器），衛彼拒我，觭

²⁶ 孟森編著，《清史講義（6冊）》，（台北市：文星，民54[1965]），頁151。勝：文告。

輕騎重，良可傷心，所謂惱恨者四也。北關老女，係先汗禮聘之婚，後意渝盟，不與親迎。彼時雖是如此，猶不敢輕許他人，南朝護助，改嫁西虜。似（此）恥辱，誰能甘心？所謂惱恨者五也。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馬，逼令我部遠退三十里，立碑佔地，將房屋燒毀，（田）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書）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懷此七恨，莫可告訴，遼東上司，既已尊若神明，萬曆皇帝，復如隔於天淵，躊躇排個，無計可施，於是告天興師，收（取）撫順，欲使萬曆皇帝因事詢情，得申冤懷。遂詳寫七恨，多放各省商人，顛望佇俟，不見回音。迨至七月，始剋清河。彼時南朝恃大矜眾，其勢直欲蹈平（遼）地。明年二月，四路發兵，漫山塞野，孰意眾者敗，而寡者勝，強者傷，而弱者全乎？嗣是而再取開鐵，以及遼瀋，既得河東，發書廣寧，思欲講和。當道官員（若）罔聞之，竟無回復，故再舉兵，而廣寧下矣。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啟、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循，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朕忍耐不過，故籲天哀訴，舉兵深入，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天皇鑒佑，勢成破竹，順者秋毫無犯，違者陣殺攻屠，席捲長驅，以至都下。朕又五次奉書，無一回音，是崇禎君臣，欺傲不悛，而藐辱更熾也。（今）且抽兵回來，打開山海，通我後路，遷都內地，作長久之計，爾等毋誤謂我歸去也。朕諸凡事宜，惟秉於公，成敗利鈍，悉委於天。今反覆告諭，不顧諄諄者，敘我起兵之由，明我奉天之意。恐天下人不知顛末，怪我狂逞，因此布告，咸宜知聞。特諭。天聰四年正月日諭。又附諭云：朕每戰必勝，每攻必剋，雖人事天意兩在，朕毫不敢驕縱。今仗天攻下此城，是朕好生一念，

實心養活。爾等當啣我再生之恩，勿得驚惶，勿起妄念。若皇天佑朕得成大業，爾等自然安康；若朕大業不成，爾等仍是南朝臣子，朕亦毫不忌怪。爾等若不遵朕命，東逃西竄，祇自尋死亡，自失囊橐，即在異鄉別土，亦難過活，即行至天涯，朕果得成大業，爾等亦無所逃。推誠相告，感宜遵依。附諭。²⁷

從這份〈七大恨〉中可以看出，努爾哈齊、皇太極所認識的明朝官員，能力都相當有限，政策也欠缺一貫，讓眾多「看邊夷人」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例如第三恨所說的吳希漢，當時擔任遼陽副將。副將為武官官職，明代稱副總兵為副將，次於總兵一級，為從二品武官，算是高階官員。原本努爾哈齊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說：「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夷人私入境內者殺。」誰知新巡撫到任，努爾哈齊按例派遣手下的干骨里、方巾納等前去行禮叩賀，當時上司不但不追究漢人出邊招攬的錯誤，反而把執送禮行賀的人當作人質，勒索要求十個滿人償命。明朝這種反反覆覆的作為，讓滿人自認受到欺壓，實在是「情何以堪」。

又例如第七恨所述「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書）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這裡所出現的備禦「蕭伯芝」大名，是第七大恨的主角，與第一恨的殺父之仇，惱恨竟在伯仲之間，可見多惹努爾哈齊生氣。而類似的情節，貫穿〈七大恨〉，使努爾哈齊、皇太極憤憤不平，找到出兵造反的藉口。

以往的記載是，蕭柏芝為明朝遼東備禦官，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四月，奉命到建州查詢貢蜜等事宜。²⁸如果「蕭伯芝」大名會在〈張字檔〉上出現，那麼努爾哈齊使用明代舊公文紙的原因，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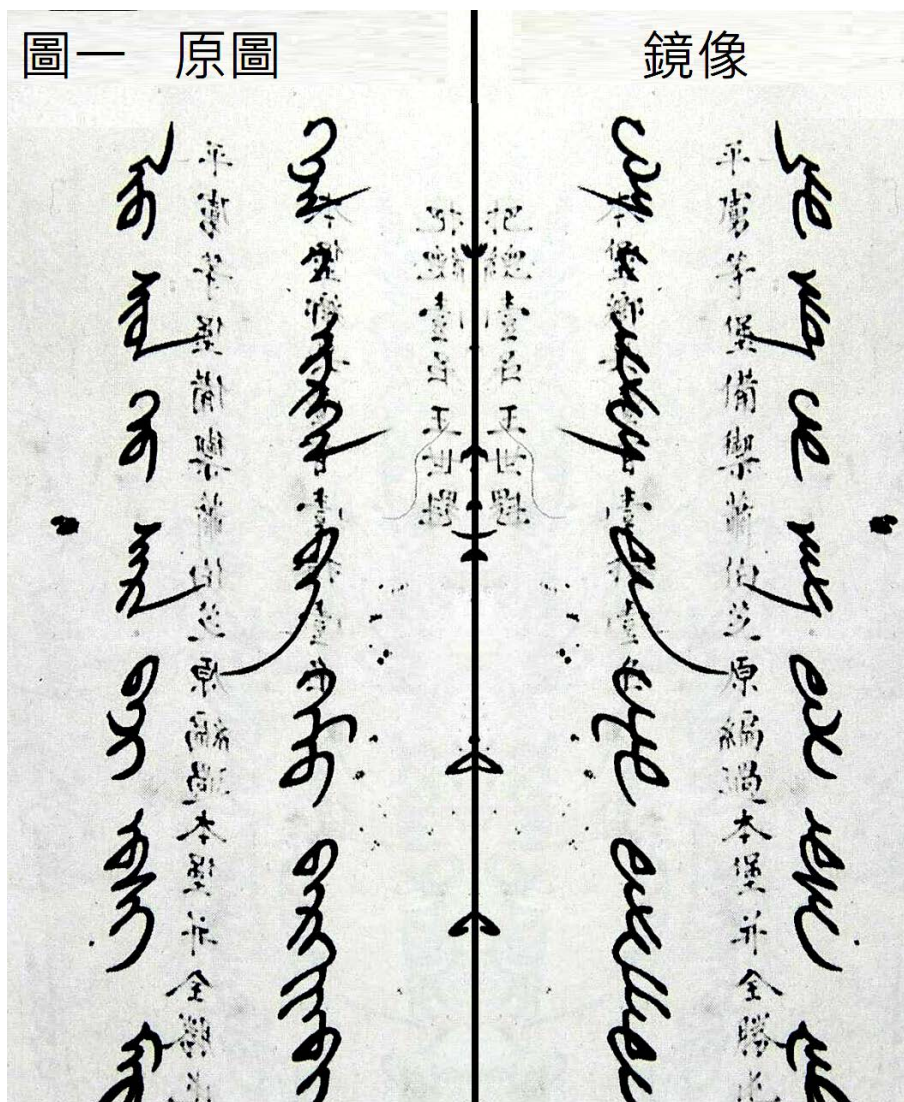
平虜等堡備禦蕭伯芝，原編過本堡並全勝屯、臺把總管隊

²⁷ 李光濤，〈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市：聯經，民75 [1986]），頁415-416。

²⁸ 陳捷先，《努爾哈齊事典》，頁95。

壯士鄉兵壹佰肆拾壹名。²⁹

這一頁明代舊公文紙滿文所用的是反面，所以漢字是左右顛倒的，不仔細查看的話，很容易忽略，相信以往許多學者都因此而漏看了（見圖一以鏡像才能顯示的蕭伯芝名銜圖）：



但是要考慮當年使用這張紙的時候，寫滿文的文臣卻是可以看到正面的，而且許多文臣滿漢兼修，認得漢字。例如達海幼年即「通曉漢文漢

²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176。

語」，才高八斗，鋒芒畢露：

又當時太宗朝之滿文，稱曰有圈點檔案。太祖朝之滿文，稱曰無圈點檔案云。達海實於滿洲文字之集成，可謂最有貢獻者矣。彼姓覺爾察，九歲通滿漢文義，弱冠草太祖詔令，彼奉命翻譯大明會典及素書與三略，太祖視之稱善。天聰六年，病死，時年三十八，諡文成。³⁰

因此將具有「備禦蕭伯芝」名號的公文，用來書寫滿文，就不是毫無意義的事情了。推測這是一種報復心態，以一吐「第七恨」的悶氣。因此凌駕於「蕭伯芝」大名上的一頁滿文，所記都是後金的軍事調動。寫著天命六年（1621、明朝天啟元年）八月十二日，後金大軍行走於遼東境內，如入無人之境：

juwan juwe de sumingguwan tanggūdai, yangguri juwe minggan cooha gaifi gaijude anafu tehe niyalma be halame genehe dobi ecikei tulkun jakūn gūsai jakūn niyalma nikan orin duin niyalma funghūwangceng de teme genehe; amba beile, manggūltai beile degelei age, yoto age, ilan minggan cooha gaifi genehe liodon i hecen ci nadan tanggū orin bai dubede ginjui cargi lio sion keo sere baci ebsi mederi hanci tehe fu hecen i irgen be gemu bargiyafi juwan emude han i hecen de isinjiha.³¹

十二日，總兵官湯古岱、楊古利率兵二千往蓋州換防。多壁叔屬下圖勒昆及八旗之八人和漢人二十四人往鳳凰城居住。大貝勒、莽古爾泰貝勒、德格類阿哥、岳托阿哥率兵三千往遼東城七百二十里外，牧金州至旅順口沿海各城堡居民，十一日還汗城。³²

³⁰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102。

³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175-176。

³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冊上，頁 227。

這段文字提到了蓋州、鳳凰城、旅順口等三處地點。其中第一處地點「蓋州 gaiju」，今稱為蓋州市，是營口市的一個縣級市，位於遼東半島西北部，西臨渤海灣。

第二處地點「旅順口 lio sion keo」今稱旅順口區，是遼寧省大連市的一個市轄區，原為旅大市下轄的旅順市。該區位于遼東半島最南端，東臨黃海、西瀕渤海，南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

第三處地點「鳳凰城 funghūwangceng」今稱鳳城市，隸屬於遼寧省丹東市。位於遼東半島東部，地近黃海北岸，為省轄縣級市。將蓋州、鳳凰城、旅順口這三處地方連成一個三角，正好涵蓋了整個遼東半島。可知原屬明朝的遼東半島，在天命六年（1621、明朝天啟元年）八月間的時候，已經全部失守，盡入後金的手中了。至於備禦蕭伯芝所在的平虜堡，位在瀋陽附近，也在三月十三日隨著瀋陽城一起淪陷，被努爾哈齊拿下來了。

按照稻葉君山著、但燾譯的《清朝全史》所記，則更為詳細。在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瀋陽城首先淪陷，接著二十二日，才輪到遼陽城陷。清太祖得到遼陽之後，遼河以東七十餘城全部投降，金國國都也順勢遷到了遼陽：

遼陽城陷。天命六年（泰昌元年）太祖率兵略奉集堡，守將李秉誠來戰。左翼四旗兵擊之，右翼兵搜勦至黃山。黃山守將，不戰而遁，四貝勒兵掩殺至武靖營，營在今奉天西。三月十一日太祖親統八旗，水陸並進，圍瀋陽城。十三日城陷，是實由於蒙古之為內應也。太祖既取瀋陽，議曰：宜乘勢取遼陽，即進至虎皮驛。明偵卒入告遼陽，守城文武將僚聞之大駭，遂決太子河水，注於壕，閉西關，沿陴盡列槍炮，守禦甚嚴。二十一日，太祖之兵，擁炮車過太子河，至東山結一大營直與東門外之明兵，炮火交攻。明兵不支，太祖乃出步兵攻小西門。使蒙古騎兵當東門，別以左翼四旗牽掣城外明兵。二十二日，城陷，經略袁應泰等死之。據明人記錄，謂應泰死難時，顧巡按御史張銓曰：泰不才邀尚方之寵靈，固當以身許國。但按臣有閫外之責，尚當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之計，泰

死不朽矣。未幾，小西門火起，敵兵先登，遂有內應者開門，城內大亂。應泰知勢之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張銓被捕，亦不屈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其二女二妾投井死，統兵以外諸軍，望見城中火起，皆潰散。翌旦，敵酋始入城，使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以剃頭為歸順之證。二十三日，下令括民衣，許富室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聚貨物於東方教場，分給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使赴北城，屯民使歸村堡云云。其所敘述，頗為詳盡。遼陽已陷，由是遼河以東七十餘城悉降，金國乃遷都於遼陽。³³

從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都在遼陽，顯然遼陽當時的位階、規模都大於瀋陽，所以清太祖在得到遼陽城之後，馬上遷都遼陽。因此八月十二日《滿文原檔》上所記「十一日還汗城」，指得是十一日回到了遼陽城。

另外八月十二日《滿文原檔》上所稱「各城堡」，實為遼東一整套的防禦工事。以備禦蕭伯芝所領軍的平虜堡，在資料上就有如下記載：

平虜堡，今瀋陽西“平羅堡”。邊台有：靜寧大台，林外小台、林遠小台、林靜小台、靜立小台。³⁴

平虜堡的規模，不如〈張字檔〉上附近另一個城堡「東州堡」大。東州堡在〈張字檔〉上是由「千戶」率領的：

東州守堡千戶陳國都下鄉兵壯士共肆百參名。³⁵

蕭伯芝的官階是備禦，似非一般軍官，看不出來是幾品。而千戶是正五品，兵力約為蕭伯芝所轄「壯士鄉兵壹佰肆拾壹名」的三倍，可以推知，備禦官階應該較低，應接近百戶的正六品。東州堡的規模較大，有墩有台，現列示如下：

³³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130-131。

³⁴ 楊暘著，《明代遼東都司》，（鄭州市：中州古籍社出版：河南省新華發行，1988[民 77]，第 1 版），附錄一，頁 149。

³⁵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156。

東州堡，今撫順市東南：東州村”。墩台有：鹼場空台、靖安空墩、靖安小空墩、靜遠墩、舊營墩、鎮東空墩、靜遠空墩、孤山墩、孤山北墩、老虎山墩、靖邊墩、五味子沖、撫順墩、靖邊台、塔兒山墩、長嶺墩、渾河口墩等。³⁶

墩台，是明代設立的報警台，敵人來襲時可以砲聲、號煙示警。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張字檔〉上有一段記載，是努爾哈齊發給各站台的降書，對墩台的功用，敘述得很清楚：

yaya tai niyalma dain sabuhade rule poo sinda, tuu tukiye, pang fori, jasei tule ocibe jasei dolo ocibe dain sabuha de, emu tanggū juwe tanggū cooha oci emu tuu tukiye, emu poo sinda, pang emgeri emgeri fori, dobori oci emu holdon dulebu, emu minggan juwe minggan cooha oci juwe tuu tukiye, juwe poo sinda, pang be mujanggai hūdun fori, dobori oci juwe holdon dulebu, tumen funceme cooha oci tuu wacihiyame tukiye, poo jing sinda, pang emu dubei fori, dobori oci holdon wacihiyame dulebu, dain dosika nergin de yaya tai niyalma neigen medege bume da dosika tai songkoi tuu tukiye, poo sinda, pang fori, holdon dulebu, gurun serekini, tuttu emu jergi medege bume wajiha manggi, dain saburakū tai niyalma jai balai ume sindara, dain be sabure tai niyalma jing lakcarakū kemuni poo sinda, pang fori, dobori oci holdon dulebu,³⁷

無論何台人發現敵至，即行放炮，舉燾擊牌。不化邊外邊內，見敵一、二百，則舉一燾，放一炮，緩擊雲牌，夜間，則燃一號煙。倘有一、二千人，則舉二燾，放二炮，急擊雲牌，夜間，則燃二號煙。倘有萬餘人，則燾盡舉，炮連放，雲牌連擊，夜間，則烽火全燃。³⁸

³⁶ 楊暘著，《明代遼東都司》，（鄭州市：中州古籍社出版：河南省新華發行，1988[民77]，第1版），附錄一，頁153。

³⁷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2，頁265-267。

³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冊上，頁262。

努爾哈齊發給各站台的降書顯示，女真人對墩台的預警功能，瞭如指掌，難怪〈七大恨〉的附諭會說：「朕每戰必勝，每攻必尅」了。又文中所說的雲牌（pang）是，亦作「雲板」，一種兩端作雲頭形的鐵質（或木質）響器，音響與鐘聲接近。現在一般佛教寺廟裡還在繼續配用，常作為晨昏報時之用。

墩、台、堡的設置，都是為了邊防。成化三年（1467）遼東地區為了防止女真勢力的進攻，陸續修建了「東牆」：

從正統七年開始，陸續修建了遼西，遼河套一帶的邊牆，歷史上稱為“西牆”。以防止兀良哈三衛等部的南襲。成化三年（1467年），女真族勢力也在遼東一帶發展起來，經常騷擾遼東地區，為了防止女真勢力的進攻，又修築了遼東一段邊牆，歷史稱為“東牆”。總之，遼東邊牆起因“遼西及遼河流域兩面為防禦兀良哈及蒙古人之侵擾，遼東一面為防禦女真人內犯”。³⁹

明朝對女真人防範得愈用力，投下的資源愈大，努爾哈齊所得到了戰果愈豐美。因此擊敗蕭伯芝的防守，對努爾哈齊來說，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而將奪下的明朝兵籍名冊，用來記錄自己的豐功偉業，當然是最值得品味的戰利品。

回過頭來說，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努爾哈齊奪下瀋陽城，接著二十二日，攻破遼陽城。接著遼河以東七十餘城全部投降，金國順勢遷都到了遼陽。這時，努爾哈齊有了瀋陽城、遼陽城的公庫，所得不只是明朝的舊公文紙，還有用不完的東昌紙、呈文紙、高麗箋紙等。前面《清朝全史》說過，在遼陽城裡「下令括民衣，許富室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聚貨物於東方教場，分給西虜。」連百姓的衣服都要大肆搜刮，可知努爾哈齊手頭的物資會有多麼充裕了。因此〈張字檔〉上記錄了天命六年（1621）九月二十四日，朝鮮王進貢獻紙，努爾哈齊以其於理不合，甚至拒絕接納的情形，這決不是努爾哈齊在「虛張聲勢」，而是他真

³⁹ 楊暘著，《明代遼東都司》，（鄭州市：中州古籍社出版：河南省新華發行，1988[民77]，第1版），附錄一，頁140。

的看不上眼。

再看看廣祿、李學智的論述，卻大不相同，說當時滿人是窮到「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現將其說法列示於下：

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原檔，可以說沒有固定的行款規則，而且字蹟潦草不甚整齊。這或許是因為滿文是寫在明代的舊公文紙上，受了原紙上已寫漢文的限制（圖十），所以老滿文必須寫在原紙上漢文行與行間的空隙處。但是明代舊公文紙的大小既不一律，而且每張上面所寫的漢文亦多少有別，因而老滿文書寫的大小與多少，亦必須視舊公文紙上的空隙大小而定。所以在書寫滿文時，對於行款便無法加以固定與劃一。再加上滿文草創之初，一般書寫滿文的巴克什 *baksi*，對書寫滿文的技術尚未熟練，所寫滿文的大小，亦無法加以控制。許多原檔，常因明代舊公文紙上寫的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且又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因此現存太祖朝的十一冊老滿文原檔，也就長短、寬窄不一。不但是冊與冊間的大小寬窄互異，就是在同一冊內，葉與葉的大小寬窄也不一致。以上所舉；都是老滿文原檔外形的特點。此類原檔現存最早而又有系統的，是自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二月開始。⁴⁰

這裡說出，由於老滿文必須寫在原紙上漢文行與行間的空隙處，加上明代舊公文紙的大小並不一致，且每張上面所寫的漢文字數也不固定，以致老滿文書寫的大小與數量，都必須受制於舊公文紙上的空隙大小。導致書寫的滿文，無法顧及行款的固定與劃一，有時甚至乾脆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以脫離漢文的拘束。這種想法，是否真是如此，需要與事實情況對照、檢驗才行。本文以〈張字檔〉總數 560 頁當作母本，統計每頁漢文行數、滿文行數，看看是不是真如所說，現統計如下：

⁴⁰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9。

表一〈張字檔〉漢文行數、滿文行數統計表⁴¹

頁數	漢字			行數		殘頁	備註
	正面	反面	無	漢字	滿字		
560	272	280	8	12.5	9.6	13	

看了表一的〈張字檔〉漢文行數、滿文行數統計數字，就可以大致瞭解，〈張字檔〉上的用紙情形。總數 560 頁的〈張字檔〉，漢字以正面呈現的有 272 頁，漢字以反面呈現的有 280 頁，幾乎是一比一。另外有 8 頁的空白頁，沒有漢字，看不出來是正面還是反面。

僅從正反面呈現一比一的結果，大致就可以看出，〈張字檔〉原本是傳統的線裝書形式，在寫滿文之前，才故意用裁紙刀將之劃開，形成一正、一反的順序。決非「常因明代舊公文紙上寫的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且又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而且觀察實物，公文紙上的滿文紀錄，並非勉強寫在漢字夾縫之中，而是完全凌駕在漢文之上，揮灑自如，根本無視於漢字的存在。

至於一正、一反的順序，可以從一些例子中得到證實。例如第 531 頁的第一行滿文「ere be ara 將這段抄錄」，由於主事者改變心意，不想抄錄這段，就將寫好了的「ere be ara 將這段抄錄」，又以毛筆劃掉，不巧沾濕的墨水過多，於是墨跡「力透紙背」，印到 532 頁第一行的漢字殷鬚子、吳朝臣旁邊，再透到 533 頁第一行的李天才、徐世伸旁邊，接著再滲透到 534 頁第一行石景羔旁邊。這樣連透四頁，顯示當時這本明代舊公文紙，本質上是一個完整的名冊，滿人只是將摺頁裁開，造成一正、一反順序，甚至連原有的裝訂線都予以保留。然後就直接寫上滿文，並不理會上面原有的漢字。

更由於以往傳統的線裝書，會在折疊處加上頁碼，於是留下一個很好的線索，讓裁開的紙張有機會得以還原如下：

⁴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1-560。

表二〈張字檔〉上明代遼東鄉兵名冊反面摺頁還原表⁴²

<p>頁 87</p> <p>壹隊鄉兵貳拾伍名</p> <p>張大江 劉仲金 徐文顯 時登舉 陳貴 □□□</p>
<p>頁 86 (反面 摺頁 十三)</p> <p>鄧六 陳四 韓江 小陳二 黃朝宗 王果</p> <p>李□□ 肖二 陳□□ □□□ □四 李□□</p> <p>宋良佐 陳三馬軍 宋文全 金動 崔忠成 崔世功</p> <p>張二</p> <p>選□□總□□名金□□等鄉兵壹百名</p> <p>壹隊鄉兵貳拾伍名</p> <p>史九升 劉三蠻子 史九安 史欽 李松 吳三</p> <p>史□□ □□三 戴□□ □□□ □仲義 劉□□</p> <p>王松 高五 柳槐 陳通 萬仲金 李三</p> <p>李承祖 李彥明 馮大功 戴得才 劉麻子 徐敖</p> <p>□□</p> <p>壹隊鄉兵貳拾伍名</p> <p>張二馬軍 李時忠 于志羔 劉六 王世元 金五</p>
<p>頁 85</p> <p>楊五 李景倉 金文羔 李三 李志清 李文學</p> <p>小孫三 陳子儀 謝仲冠 謝四 老孫三 陳蠻子</p> <p>李剛 李尚伏 孫伯能 大孫三 孫得仁 孫九</p> <p>張得時</p> <p>壹隊鄉兵貳拾伍名</p> <p>張伯萬 金朝宣 張計文 吳發才 馮景海 李國登</p> <p>陳志信 丁三 張得虎 金三 皮三 張希孔</p>

⁴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2，頁 74-87。由於漢字習慣由右向左直寫，滿文習慣由左向右直寫，所以《滿文原檔》頁碼是按照滿文習慣編排的，也才會形成想閱讀漢字時，會出現由大頁碼數往小頁碼數倒讀的狀況。又表中標示為「反面」的漢字，在解讀時是使用鏡子閱讀出來的，所以頁 86 第一行的鄧六 陳四等，其實位於頁面的最左邊，與頁 87 的最後一行也是最左邊的張大江 劉仲金等，並不相鄰。

吳三 楊朝侍 宋六 宋錯 張亮 姚朝忠
 尚二 沈牢囚 康發時 張麻子 田伯松 李奉時
 劉三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張計伏 張計山 宋大姜 劉六 張計功 崔五
 宋希尹 倪仲義 宋來時 宋希榮 宋希學 吳朝臣

頁 84 (反面 摺頁 十四)

董四 董文功 張得山 古二 倪仲仁 劉鐵
 高朝忠 趙天祿 崔洪□ □□水 張□ □□
 王得功
 選委百總壹名王音功等鄉兵壹百名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盧大 李承伯 邊四 張承元 孫二 劉朝甫
 新孫二 桑守良 張安 劉松 劉文通 林計忠
 王□ 王計文 孫□ □□□ 劉□ 安仲二
 言天伏 周景松 李仲節 傅仲文 趙子儀 魯朝先
 陳朝相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金天住 楊三 李發幸 李仲臣 蔣甫 江計虎
 胡景伏 夏四 談計羔 李信 張得山 劉仲金

頁 83

線世仲 劉太 李伯明 周世保 李志方 李景合
 柯景□ 張四善友 李國惟 李朝武 金五 趙錦
 李智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李朝□ 李仲必 湯隆 李庄頭 李志成 李文升
 馬五 才三 楊計伏 沙伯萬 汪伯遷 線世華
 線朝官 李五 王伯支 劉守遷 線友德 宋六
 線□□ 胡景陽 線二 李萬三 牟二 傅二
 夏伯萬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褚伯營 李志羔 孫良臣 張萬山 楊伏中 沙得付
 李棟 于鐵 張友良 劉三 孫計官 王二
 喬二 錢文秀 孟思運 姜四 蘇景羔 鄭朝相

頁 82 (反面 摺頁 十五)

張得□ 趙三 王鐵 汪四 林二 翟天伏

鄭仲金

選委百總壹名金五等鄉兵壹百名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李□春 高景松 姜羔松 □大德 □□金 □□

任子義 胡朝忠 宋三 金三 黃得□ 李守才

胡□學 施□ 李文秀 肖□隆 劉二 □天慶

李世隆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金得明 傅三鬼子 王文儀 趙得山 唐得明 王仲金

李六 楊得惟 趙得虎 唐得官 傅得隆 李得營

王八 馬世舉 張仲文 劉天勳 李思寬 姚計

頁 81

羅友才 向三 傅文舉 蘇伯虎 謝二 位二

金朝用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金良甫 李思臣 高伯相 袁得值 郭八 劉天禮

劉天儀 門朝武 李國賓 陳尚學 王彥隆 楊伯遷

夏四 楊尚學 金國銀 劉承元 宋四 肖瞎子

張長才 楊雲龍 吳四 周國友 翟天受 郎美

李思忠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潘尚信 左天憐 郭萬庫 李世富 李彥福 束升

潘思文 張能 束友功 王伯萬 束友林 羅計忠

羅元□ 楊朝保 大楊四 秦國友 李國泰 楊朝忠

新劉二 劉世隆 王得臣 楊得信 楊朝宦 查四

頁 80 (反面 摺頁 十六)

朱仲保

鎮東守堡孫可望開報鄉兵壹百玖拾捌名

選委百總壹名李玉春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陶萬儀 李景伯 文尚仁 劉計武 陳志啟 崔世顯

李□ □萬才 李承才 緱(《又》)□□ □思□ 王□

張世信 王友松 王林 高景松 李□松 彭友才

李芝 王仲仁 趙惟功 李惠 任五 蒲道士

劉志進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劉萬良 李國忠 劉彥武 鞏松 鮑大爺 丘汝零

周計文 □國清 □彥虎 李世武 王守舉 劉尚忠

劉世伸 白六 □二 蔡廣寧 蔡三 張大麻子

79 頁

田友春 李承恩 金承功 大王三 劉尚進 李伯金

李必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李友倉 李文迎 張景儀 邢三惠 倪機二 戴良全

戴文志 尚承文 陳國忠 李現 尚承全 李計武

李三馬軍 張魁 崔守付 李安 李承方 李友全

李守倉 周二 林□賞 孫守功 張啟 董文迎

宋□才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吉景榮 胡匡二 馬友才 白四 鮑四英 董得時

徐仲尚 徐六 鮑世虎 羅志功 李景時 梁明寬

古得善 閻仲禮 李三 王五 王邦子 張計武

孫五 李承先 楊世貴 蔡守志 羅尚儀 緱得鎮

頁 78 (反面 摺頁 十七)

趙丙伯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趙丙清 趙五 張七 瘦拐子 任七 任朝勳
 丁世魁 劉四 李守寬 丁良必 丁重 趙尚舉
 張□□ 張□□ 劉江 張□ □仲友 馬仲學
 吳友□ 趙□丙 張□□ □三善友 □尚明 佟□□
 李合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李□ 韓□□ 劉□ 胡得明 胡得隆 □四
 張□付 吳三 張三鐵匠 佟瞎子 崔□ 金二
 張天祿 周得江 王天佑 劉登腕 張文儀 鄒國安

頁 77

黎仲奉 黎仲儀 馬賞 丁庄頭 張友時 葉大
 路五
 壹隊鄉兵貳拾伍名
 路八 丁六 李國忠 王守先 王回 解三
 蔡達子 蔡庫 白端公 王友才 馬汝孚 李四
 任得受 姜友志 任伯林 張尚文 湯計祖 王大角
 □□□ 孫二 張耀 □得時 包子 任學力
 孫袍子
 壹隊鄉兵貳拾叁名
 杜計庫 陳守官 杜惠 杜志友 王四 王二
 王守全 劉二 丘尚各 陳守仁 丘仲文 張仲全
 曹三 姚計文 姚計成 丁三 馬國滿 許天貴
 劉彥隆 陳通 胡打架 黃世舉 紹良佐

頁 76 (反面 摺頁 十八)

守析木城堡指揮吳東忠查編派過本堡各屯寨百總管隊壯士鄉兵共壹百玖拾名
 百總壹名楊永元
 管隊壹名劉思功等貳拾伍名
 劉朝用 許文談 李文明 李思倉 王道明 劉進功
 劉天用 劉進國 劉耀吉 劉守王 劉思明 溫可敘
 劉守奎 楊朝進 劉興光 劉天祥 劉延光 金三
 劉進禮 蔣文羔 溫以信 劉邦成 劉守才 王道賢

吳三

管隊壹名溫汝功等貳拾伍名

于邦選 蔣崇恩 于顯節 李三遜 劉天成 王時海

劉天眷 楊永官 劉天恩 劉可成 劉璞光 劉天山

頁 75

于顯功 盧三 劉增光 王道富 劉天吉 張世泰

王國忠 金國舉 王二 李寬 張國正 王□

劉愛俊

管隊壹名張應龍等貳拾伍名

閔尚祖 劉朝柏 閔成文 劉朝方 溫以本 溫成敘

郭成 于尚禮 張天伏 趙世德 鄧效尹 劉朝仁

劉守安 劉成訓 劉景德 劉耀成 溫汝全 劉美光

劉天受 王三 張世寧 劉天順 曹國忠 劉子成

金二

零隊壯士陸名

劉天機 黃合 楊永金 劉道成 劉和光 劉世義

頁 74 (反面 摺頁 十九)

百總壹名金應文

管隊壹名童思春等貳拾伍名

王朝富 王時孝 王世言 王持堯 王朝進 蔣友庫

王友功 高六 王思忠 王朝住 劉良臣 吳景德

王□□ 吳尚賢 田□□ 孫繼智 閔世慎 周世興

李祀 劉忠明 金得富 李四 尚善友 □□功

完成位

管隊壹名張有時等貳拾伍名

劉得富 溫朝雲 溫守祿 劉得成 劉三 溫守合

李玉全 楊奎 溫守登 李萬□ 梁梅 白世祿

王世福 黃宥 黃定 李守德 金汝明 金世曾

李萬成 黃寵 李為登 許成敖 崔志美 李士功

金成祖

表二「〈張字檔〉上明代遼東鄉兵名冊反面摺頁還原表」顯示的是，從 74 頁到 87 頁正反面漢字，其實是一份連續的明代遼東鄉兵名冊，剛好是線裝摺頁的十三到摺頁十九。這表示滿人得到名冊後，所進行的拆毀動作，其實只有以裁紙刀，將線裝名冊的夾頁裁開而已，甚至連順序都沒有重新調整，就一體適用了。這與所謂的「許多原檔，常因明代舊公文紙上寫的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且又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的推論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滿文書寫在漢字背面，並非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了，而是毫無選擇的正面、反面、正面、反面…的輪流使用。

至於所謂「每張上面所寫的漢文字數不固定」，以致「滿文書寫的大小與數量也無法顧及行款的固定與劃一」，那也是與〈張字檔〉現實狀況不符。從表一的統計結果，與表二的實例之中，都可以看出，漢字固定在十三行左右，滿文則固定在十行左右。滿文書寫的行數較少，是因為滿文字尾有拉長的一撇或一鉤，都比較佔據空間所致。滿、漢文字都大致是整齊劃一的，並非不固定行數的隨意書寫。因此廣祿、李學智的論述，在統計數的對照下，顯然是無法成立的。

肆、推論

司馬遷著的《史記》提到，〈大宛列傳〉有一則故事，與〈張字檔〉上將滿文紀錄於明代舊公文紙上，形成滿漢文雜處的現象，十分類似。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⁴³

從以上這則故事裡，可以很容易看出，征服者有一種報復模式，就是

⁴³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影印史記》，（臺北市：啟明書局，民 55[1966]，再版），〈大宛列傳〉。

先破壞，然後羞辱，最後利用，以享受勝利的喜悅。也就是說，努爾哈齊針對明朝武力，除了直接加以打擊摧毀外，對於戰利品的兵籍名冊，也同樣施以報復及羞辱，以享受征服者的樂趣。正如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上所說，「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劫掠，然後他們離去」。⁴⁴因為早先大月氏自視甚高，以強凌弱，而且鄙視匈奴。後來到了匈奴老上單于時，情勢逆轉，匈奴壯大，開始擊敗月氏，老上單于甚至殺了月氏王，但是一場殺伐不足以解恨，就想方設計，利用月氏王的頭顱骨，當作大碗喝酒。試想即使匈奴單于再怎麼窮困，也不至於弄不到一個瓷碗吧。要不鐵碗、木碗、葫蘆瓢、牛角杯等也都可以當作「飲器」，實在沒必要用上敵人的頭蓋骨來喝酒飲水呢。

較可能的解釋，就是基於一種報復心態，殺了高高在上的月氏王，造成一種「破壞」，接著把月氏王的頭顱做成大碗，加以「羞辱」，然後用以喝酒飲水，算是「廢物利用」，而每用一次，就等於重新「羞辱」對方一次，使勝利的喜悅，不斷複製與持續。

以這種報復模式來看，〈張字檔〉的大量採用明代舊公文紙，就能了然於胸了。後金天命三年（1618、戊午、明朝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國大英明汗努爾哈齊與明廷的關係破裂，決定誓師伐明，出兵進攻撫順城。四月間，努爾哈齊統率八旗軍兩萬兵丁，出發攻佔撫順城。出師以前，努爾哈齊條列〈七大恨〉訴告於天：

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春正月。黎明，有黃氣貫月中，其光廣二尺許，月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丈餘。奴兒哈赤望之，謂左右曰：「天意已如此，汝等勿疑。吾計決矣！今歲必征明。」二月告貝勒、諸臣曰：「予與明之釁凡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乃頒以兵法。」四月六日，率步騎二萬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⁴⁵

努爾哈齊還同時派了代表，到北京城遞送這份誓詞，算是進行了最後

⁴⁴ 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1980，第1版），序，頁2。

⁴⁵ （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台北市：中華，出版日期：民74[1985]，台一版），頁106。

的溝通協商，結果當然是談判破裂，雙方開戰。

接著天命六年（1621）三月間努爾哈齊連奪瀋陽、遼陽等七十餘城。努爾哈齊在這些城裡的公文、鄉兵名冊裡，赫然看到仇家明朝遼東備禦官柏芝的大名，為了報仇雪恨，推測他就下令以這些鄉兵名冊當作紙本，紀錄自己每日的戰功。這與「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的做法、心理狀態上是相當類似的。也就是每寫一次紀錄，就等於羞辱一次明朝廷或「備禦蕭伯芝」，如此延續，直到天命九年（1624），才算解恨，總計維繫了四年。

至於「缺紙說」，從以上種種分析來看，當然是與當時環境不符的。但是以往也是有人對此加以附和。其說法如下：

祭奠努爾哈齊一次就用去了數萬張紙，用紙之多，可謂驚人，然而後金依靠朝鮮進貢獲取紙張，畢竟有限。據崇德三年檔載：六月“初一日，賜朝鮮國王李倧印信、敕書，封為王。為謝聖恩所貢獻禮物數目如下：各種高麗夏布二百匹，各種錦綢一百八十匹……紙五千刀，筆一百隻，墨一百塊……”，李倧為了答謝封王的隆恩，進貢紙五千刀，這是最豐厚的一次。（前面提到天命八年二月朝鮮使臣饋贈的紙，只有九十五帙，破紙七十五帙）。一刀紙通常為一百張，五千刀就是五十萬張紙，實在不算少，但祭奠努爾哈齊僅一次就用去了進貢紙張數的十分之一，足見祭祀之奢費，故後金無法改變紙張入不敷出的局面。崇德三年，朝鮮已臣服於清，紙源大開尚且如此，努爾哈齊時期的拮据狀況就更可想而知了。不言而喻，從汗、王、貝勒到一般的女真平民，基於對上蒼神祇及祖先冥靈的尊崇，每年在各類祭祀活動中勢必要消費大量的紙張，人們既然把紙當成了“活人之物”，自然“其價極貴”，所獲極難了。在紙張奇缺的情況下，《舊滿洲檔》捨高麗紙而用舊公文紙記注，是合乎情理的，事實也是如此。唯獨《舊滿洲檔》第一冊用的是高麗箋紙，反教人感到蹊蹺，懷疑該檔的記注非當時人之所為，恐不無道理。⁴⁶

⁴⁶ 劉厚生，《舊滿洲檔研究》，（吉林市：吉林文史，1995），頁9-10。

「缺紙說」往祭祀上推想，轉變成「祭祀奢費說」。此說認為「祭奠努爾哈齊僅一次就用去了進貢紙張數的十分之一」，看似祭祀十分奢費，會導致缺紙。但是卻無法說明，何以採用舊公文紙記注的活動，只維持了四年，到天命十年正月的〈收字檔〉，努爾哈齊明明還活著，就又開始採用高麗紙了？此外即使其他王公、貝勒在祭祀上耗用了大量白紙，也無法解答：天命六年（1621）三月間努爾哈齊連奪瀋陽、遼陽等七十餘城時，情勢空前大好，而所有城池的公庫、民間卻一時間都缺乏白紙，使得公務記事還要用到舊公文紙？

因此「祭祀奢費說」雖能完美說明女真社會的祭祀活動，卻不盡然能解釋天命六年（1621）到天命九年（1624）諸如〈張字檔〉上的滿、漢文雜處的奇特現象。

伍、結語

《滿文原檔》是清朝早期所記載的珍貴史料，部分檔案有將滿文紀錄於明代舊公文紙上，形成滿、漢文雜處的現象，相當特別，於是就出現了各種推論。

學者廣祿、李學智認為，從清人早期生活的情形來看，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衣食恐怕尚難豐厚，對其日常生活無關的紙張，當不致多所存貯，以備記事之用，清人或許會從明人與朝鮮得到紙張。但在與明朝決裂之後，直到崇德二年（1637），才得到朝鮮歲貢的「大紙千帙，次紙千帙」，因此在缺紙的狀況下，日常記錄史事只好採用明代舊公文紙。

學者陳捷先則在民國五十八年（1969）《舊滿洲檔》出版時的序文〈「舊滿洲檔」述略〉中，加以反駁。他引用三段滿文記著關於「紙張」的史料，分別是：天命六年十二月、天命八年二月、天命十年四月等三份紀錄，在在說明天命朝的公庫裡有紙，而且第三次出現的數量還多達「五千卷」之多，是十分足夠撰寫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的。

為了回應陳捷先的質疑，李學智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行出版《老滿文原檔論輯》，以一本書的篇幅，詳細答覆了陳捷先。李的講法，並未針對問題解答，反而是在不著邊際的閒談，說紙若不是高麗箋紙，就沒辦

法寫滿文。又說若不是大紙，也沒辦法寫滿文。這種回應，顯得論述無力，根本無法自圓其說了。

本文則以〈張字檔〉當作研究標的，先由理解明代公文紙所寫的內容開始，得出統計數據，漢字固定在十三行左右，滿文則固定在十行左右。說明公文紙上的滿、漢文行數，都相當穩定。且滿文紀錄，並非勉強寫在漢字夾縫之中，而是完全凌駕在漢文之上。此外明代公文紙在〈張字檔〉中分為兩類，一是遼東地區監察御史審案的「批狀」，另一類則是「遼東鄉兵名冊」。其中「批狀」佔少數，僅有 17 頁，「遼東鄉兵名冊」佔多數，達到 543 頁。明代公庫裡舊公文紙理應包含六部公文，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各部，何以〈張字檔〉只挑選「批狀」、「遼東鄉兵名冊」這兩種檔案，加以覆寫，應該不是偶然。

這個謎底，在翻閱〈張字檔〉頁 176 時，出現「平虜等堡備禦蕭伯芝，原編過本堡並全勝屯、臺把總管隊壯士鄉兵壹佰肆拾壹名。」字樣時，可說真相就已經呼之欲出了。

因為天命三年（1618、萬曆四十六年）四月間，努爾哈齊以〈七大恨〉的理由宣佈攻明。而第七恨所述「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書）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就明講與「備禦蕭伯芝」有重大過節，方始列為第七恨。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於是當這份「遼東鄉兵名冊」被後金截獲之後，發現其中竟然紀錄著「備禦蕭伯芝」的名銜，當然是如獲至寶，立即成為努爾哈齊洩憤的首要目標。推測努爾哈齊下令將遼東鄉兵名冊拆開，再以滿文覆寫其上，以紀錄自己輝煌的作戰紀錄，以便一吐「第七恨」所累積出來的怨氣。這種狀況與《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的故事，可說是如出一轍，前後輝映。努爾哈齊除了針對明朝有形武力，直接加以打擊摧毀外，還針對具有象徵性的戰利品兵籍名冊，同樣施以報復及羞辱，以重複享受征服者的樂趣。正如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上所說，「他們到來，他們破壞，他們焚燒，他們殺戮，他們劫掠，然後他們離去」。因此天命六至九年（辛酉、壬戌、癸亥、甲子，1621-1624）這四年間，頗具針對性的選擇採用了明朝公文舊紙，當作軍國大事記錄簿。而在這段期間

之前或之後，都沒有使用明朝公文舊紙的案例出現。相信這或許能解釋〈張字檔〉上滿漢文雜處的奇異現象，而這種論點也似乎較「缺紙說」或「祭祀奢費說」更為合理些。（本文於 2017 年 8 月投稿，於 2017 年 10 月審查通過）

民族與民族心性

——從《約翰·克裏斯朵夫》剖析羅曼·羅蘭的民族觀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學邊疆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當世界人民都在為了自己民族的榮譽而戰鬥，當各民族都將自己的新生力量送進戰場，我們有否想過，人類到底需要什麼？我們把民族看成一個先於人存在的實體，為此而犧牲生命。卻真正忽視了，民族是由人的心靈聯結而形成的，沒有共同生活的彼此經歷，是不會鑄就一個民族！因此，和平不是由武力征伐所帶來的，而是民族心性裏共生的，它的關鍵是瞭解與接納。探討民族心性，就如在鏡子裏觀察自己，知道自己的強與弱，才能有的放矢地施予和索取。否則，總是不能夠給予對方真正想要的。這對我們中國的民族問題有很好的啟示。

關鍵字：民族；民族心性；羅曼·羅蘭；

一、扼殺民族主義的幽靈

《約翰·克裏斯朵夫》是一部以音樂家生命史為線索的史詩，從1906年到1921年，羅曼·羅蘭創作了一個新英雄的典型，他是“力的代表”，耳目清明，心靈純潔，具有英雄的意志和高尚的靈魂。在1906-1921年期間，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歐洲都被一股不知名的力推向戰爭，無數的生命被屠殺，無數的家庭流離失所。這些國家的青年

被一批一批送上戰場，在民族主義的名義下喪失了生命。互相殺戮沒有平息仇恨的怒火，民族主義意識成為了鬥爭的武器。

人類的情緒往往會像火焰一樣蔓延，當火焰燃燒大的時候，無知和愚昧便導致毀滅。發動和服從戰爭的人把“愛國”奉為神明，然後再在它面前拜倒。羅曼·羅蘭問道：為了什麼目標而浪費他人的生命呢？難道學不會彼此容忍對方偉大的道德和缺陷嗎？報紙鼓吹每個愛國者的責任是為他的國家的“民族榮譽”而戰，不管他的國家對不對，精神、理智、信仰、詩和科學，一切都甘願讓自己國家的軍隊來支配。每一個國家的思想家、教士都不能抵抗這傳染的禍患，宣稱自己的民族是在為了自由和人類的進步而戰鬥。羅曼·羅蘭說：“對祖國的愛不應該強求我憎恨和殺害那些高貴而忠誠的、也愛他們祖國的心靈，毋寧說我應該尊重他們，設法跟他們團結，為了共同的福祉。”¹

羅曼·羅蘭在談民族，又不止在談民族，他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國家，超越了種種偏見和他本身，他意識到那種把“一個長期生活在一片共同地域，操共同語言的共同體”的就是“一個民族”，是被想像和構建的。而他真正認識到決定一個群體是否為一個民族的，是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思想意識，它鑄就一個民族的性格、特質。正是這一點的不同，將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區別開來，它的本質是共同的心靈。正像一個人，從幼年到老年，他所生活的地域，他所接觸到的周圍關係，都成為塑造他心靈的雙手。漸漸地，“他”才形成了國家的組織形式，被強加了各種利害關係，產生了政治訴求。可是，生活在這片地域的人，依舊靠心靈與心靈的连接，形成“民族”的本體，他只有先成為他自己，他才產生需要。

許多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都是從自己民族的心靈深處獲得啟發、創造的動力，當然，仇恨也產生於此。因為人的心靈會依據物件而產生的愛、憎、苦、懼、希望、憤怒，推動人們獲得生命至高的幸福，或犯下嚴重的過失。人們往往把“民族”看成先於自己本身存在的概念，好像人人生下來必須先被套上一個“什麼民族”，才能進行生活。當心靈把“民族”作為一個物件來看待時，就無疑加重了彼此的分別對立，進而有了比

¹ 孫梁輯譯：《羅曼·羅蘭文鈔》之《超越混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33頁。

較、爭奪和怨恨。民族主義的幽靈就是怨恨的聚合體。殊不知，民族的“本體”是經過長期磨合而形成的共同心性，它猶如在地表下流動的岩漿，雖然看不到，卻在漫長的歲月裏，不斷衝撞堅硬的地殼，塑造地表的山巒和湖海。心靈也是如此捏塑了民族的性格！它是民族認同的基礎，而不僅僅是表面上凸顯的利益訴求。而人們往往在表面的利益中迷失自我，捨本逐末，加劇了民族的對立和隔閡。

“心靈卻非武力所能征服，但可被愛和道德所征服。”²羅曼·羅蘭懷著這樣的理想，創造了約翰·克裏斯朵夫。他的生命像一條河，在法國的高地與德國的平原中間，把兩國的水源吸收、彙集，再把彼此的生命力灌注到兩岸敵對的民族中去，接著從多霧的北歐越過阿爾卑斯山，來到陽光燦爛的地中海，克裏斯朵夫獲得了心靈至高的平和和寧靜，象徵著羅曼·羅蘭所期盼的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的最終的和平。

二、羅曼·羅蘭為什麼選擇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

在羅曼·羅蘭看來，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是兩個最配攜手的民族，因為二者的性格中有許多互補性。但遺憾的是，德法兩國的相互征罰歷史長達一千多年，宿怨深重。自西元 843 年西法蘭克（今法蘭西）和東法蘭克（今德意志）從查理曼帝國分裂以後，就爭執不斷。1618 年，法國與哈布斯王朝的三十年戰爭，阿爾薩斯公國和洛林公國歸併法國；1701 年法國波旁王朝與德意志邦國持續 12 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撒下了法德世仇的種子；1805 年至 1810 年間，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以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名義，征戰普魯士。1870 年，統一後的普魯士在俾斯麥有力的領導下，大敗法蘭西，饑寒交迫的巴黎人被迫在 1871 年投降，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給新德意志帝國，並賠款十億美元。後來強大的征服者——德意志民族，讓 1870 年以後成長起來的法蘭西一代經歷了喪師辱國，與死神照面，他們自小就背負起了雪恥的重擔，兒童的心靈不是從此墮落就是從此長成。羅曼·羅蘭就是在法國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與法國分別加入對立的陣營，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氣焰與日俱增，德國軍隊的殘暴和劫掠造成了各國報復的願望。為

² 〔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四部分附錄（十一）。

了徹底摧毀敵國，德意志民族被政府所捏造的謠言激起了所有的精力，他們深信自己遭到了全世界的猜忌，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衛自己，否則就是滅亡。可是，漸漸有一些德國人開始質疑這樣的鬥爭，質疑他們自己身上所培養起來的偏見和盲目的忠誠。一些德國人寫信給羅曼·羅蘭，他們開始發現真正的法蘭西的精神——能工作、有信仰的法蘭西。羅曼·羅蘭觀察到德國人的良知，發現他們起先確信自己是合乎正義的，漸漸在良心中產生焦慮不安的情緒。實際上德國對法國並沒有真正的仇恨，這讓羅曼·羅蘭看到了光明的希望。當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屠殺法蘭西最純潔的性靈、最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時，德國普通人心靈中的良知就是和平的鑰匙。

可見，“民族”並不是先于人的心靈而存在，相反，心靈與心靈的聯結是民族的“本體”。心靈與心靈的分別對立才是民族仇視的根源，民族主義就是這樣幽靈般的存在。人的心靈遵循因果律的法則，它並非絕對自由的。就如物體的靜止與運動，靜止的原因不可能是運動，運動的原因也不可能是靜止，一個運動的物體必須遇到阻礙的力量才會靜止，否則會一直運動下去。心靈也是一樣，仇恨的力只會帶來仇恨、爭戰、死亡。而人的生命向來都是期望獲得成長，獲得增長行動的力量，獲得對事物更深更廣的認識。如此，心靈才不會受到蒙蔽。

那麼，德意志民族和法蘭西民族在心性上真的是對立的嗎？他們不是受到少數人的蠱惑奔向戰場，屠殺生命，或者犧牲自己的生命？德意志民族的老百姓和法蘭西民族的老百姓有什麼區別呢？他們不都是勤勤懇懇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安居樂業，樂天安命，願意與人和睦相處？那些自命為代表理智而實際只是掀風作浪的野心家，並不能代表成千累萬的淳樸的心靈——他們在各個民族中間靜靜地燃燒著，本身便是純潔的火焰，象徵著慈悲、信仰和犧牲。在萊茵河兩岸敵對的兩民族，終究可以獲得友愛和和解。

三、和解的鑰匙——德意志民族與法蘭西民族的性格剖析

和解的基礎是相互瞭解，羅曼·羅蘭得益于平生的摯交——瑪爾維達·封·梅森堡，這位歌德的後裔、赫爾岑與瓦格納的摯友，他從她身上洞悉了德意志民族的心靈，從她的眼睛裏，看到了真正的法蘭西和真正的德

意志之間的親密關係。半個世紀的德國的英雄們——馬志尼、尼采、瓦格納，都將自己生命中的一顆火星，留在了她的智慧中，傳遞給了羅曼·羅蘭。法蘭西與德意志之間真正的親密關係，就是兩個民族的心靈所碰擊出的愉悅回聲，象徵著兩國和平的旋律。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是天生的歡樂，可歡樂中隱藏著服從；法蘭西民族的性格是天生的自由，可自由中沉伏著萎靡。德意志的歡樂猶如法蘭西的一劑強心針，而法蘭西的自由精神有助於德意志掙破束縛的牢籠。兩種性格在一起時，只要法蘭西人用細弱而誠摯的聲音，簡單地表達法國田野所孕育的思想和幻夢，就能使等候它們的日爾曼森林震盪著回聲。這不是最彼此需要的兩顆心靈嗎？相互作用所創造的將是奇跡！

首先，德意志性格中的樂天精神。羅曼·羅蘭在卷4“反抗”中刻畫了一個天真無邪的七十歲老人許茲，這個人物的性格一半取自於羅曼·羅蘭的祖父埃米·古洛，他身上流著古日爾曼種族的血液，一半取自瑪爾維達。他們倆共同凝聚著德國最優秀的部分——同樣土生土長的純潔、同樣的率真、同樣的溫暖的希望，永遠從哀愁的灰燼中再度躍起，以及同樣的理想主義不可救藥的熱情，這是任何生活的教訓都不能使他們否定的。德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知道如何讓自己快樂，例如許茲，一個善良的音樂教授，生活上有許多不如意：獨身多年，沒有孩子，他把感情移在學生身上，可人家並沒怎麼報答他。身體的老病使他辭退大學教席，單身住著，只有一個年老的女僕照料。女僕在背後嘲笑他，在賬目上舞弊；大學同事從他退休以後把他全忘了，他的後任剽竊他的文章而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朋友欺騙他……每當夜深人靜，這些瑣事都讓他心如刀割。隨後，他把不痛快的念頭撩到一邊，為了保持幻象，他否認這些不愉快：他要保持自己的信心，要樂天知命，要相信別人，結果便真的信了。許茲最大的快樂，是書本和音樂。他很博學，精通好幾國文字，像席勒一樣以世界文學為理想。他教授美學兼音樂史，像隱士一般，在孤獨的生活中聽著幾個世紀以前傳過來的歌聲。他胸襟寬大，對世界上一切美妙的東西都能熱心接受。當心靈感受到快樂，身體活動的能力便會增長，因而德國人的樂天精神就是他們生存和行動的力量。

其次，德意志性格中的服從氣質。“理想化”走到極致，便是不敢看

清事情的真相。膽怯的心靈是“服從”的胚胎，德國人的情感表達也是循規蹈矩的。真正的信仰，是像泉水般從靈魂中出其不意地飛湧出來，而德國人的情感是像貨物一樣故意製造出來的。羅曼·羅蘭批判德國藝術最大的弊病，就是賣弄技巧。賣弄技巧屬於肉體方面的快感，能夠把肌肉運用起來的快感，一個人控制成千百人的快感，雖然追求這種快感對藝術家是一個很大的誘惑，但這對於藝術和心靈卻是個致命傷。德國音樂家在追隨新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時，也備受服從心理的馭使。創作像套用公式一般，認為掌握一套規則，就可以如法炮製。德國的音樂大師、演奏家、指揮家、歌唱家、聽眾都習慣於了這般服從的心靈，並樂此不疲，渾然不知。如，羅曼·羅蘭批判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宗師，那些倍受幾百年崇敬的人物：“孟德爾松是那種過分的憂鬱，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穩而言之無物……李斯特是個貴族的教士，馬戲班裏的騎師，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氣，高貴的成分真偽參半，一方面是超然物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厭惡的賣弄技巧；至於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緒淹沒了，仿佛沉在幾裏路長的明澈而毫無味道的水底裏……甚至那偉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啟後的祖師，也脫不了謊語，脫不了流行的廢話與學究式的嘮叨。”³ “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築”功夫的作家，象舒曼那樣在無數的小作品中把他們的生命一點一滴全部灌進去的人……他從來不說一句不是真正感覺到的話。然而他的榜樣正好使克裏斯朵夫懂得，德國藝術最要不得的虛偽還不在於藝術家想表現他們並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於他們想表現真正感到的情操——因為這些情操本來就是虛偽的……一個德國音樂家越天真越有誠意，他越暴露出德國民族的弱點，動搖不定的心境，婆婆媽媽的感情，缺少坦白，偽裝的理想主義，看不見自己，不敢正視自己。”⁴

其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討論德國問題時，也談到德國“庸俗市民”的風氣。統一前的日爾曼公國林立，經濟上是農奴制，政治上長期處於分散狀態。宮廷生活驕奢淫逸，互相爭戰，剝削和壓迫窮苦的人民，極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市民階級的經濟地位薄弱，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

³ 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朵夫》（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第22頁。

⁴ 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朵夫》（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第24頁。

也十分軟弱。當法國資產階級準備發動大革命時，德國資產階級仍奴顏婢膝地依附公侯的小朝廷，聊求殘羹剩汁。“他們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眼睛望不到比井口更大的天，所以談不上革命和文化方面的遠大理想。”⁵ 大師給世人留下了優秀的作品，而作品恰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最真實的心靈。大師們所表現出來的共同性寓於整個民族特性之中，這種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所養成，而是長期共同生活在一片地域，採用共同的經濟生產方式，所鍛造的共同心理素質。這種經濟生活正是塑造德意志民族心靈的基礎，而這種心靈反映在德國藝術方面，就如羅曼·羅蘭所指出的那樣，刻意追求機械的、疊床架屋的結構，認為世界好比一架鐘，其中部分與部分以及部分與全體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缺乏真誠，暴露出虛偽的理想主義。因此，德國啟蒙運動中的資產階級厭惡封建小朝廷令人窒息的庸俗腐朽，迫切渴望精神解放和自由，“自由”成為啟蒙運動時期德國作家和理論家的口頭禪。

相對於法蘭西民族性，羅曼·羅蘭認為：首先，法蘭西性格中的自由精神是法蘭西民族性的靈魂。這個民族擁有自由、純潔、博愛的精神，法蘭西的執政官、獨裁者、思想家、行動家和革命家都能染上這樣的精神，一旦掌權，便能感受到國運到偉大，這國運使他們從小我中超脫出來，將民族精神的薪火傳遞下去。這個民族不是為了征服世界，為了金錢或帝國而鬥爭，而是為了理智。“一個需要理智高於一切的民族，為了理智的鬥爭自然也高於一切的鬥爭。”他們永遠站在理想的前哨，為世界人民開路！這是幾百年來從未改變的法蘭西民族的特徵：為了崇高的理想而迸發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犧牲自己也再所不惜。

其次，法蘭西思想的巔峰上，是抱有熱烈懷疑主義的學者。他們為學問而愛學問，不求真理，只顧閉上眼睛尋求內心清明的域境，聆聽數位與形式的微妙而壯麗的和聲。他們不理會痛苦、現實，在冷靜的理智中創造世界和它的規則，他們最大的快樂就是用自己自由思想的光輝照亮周圍的黑暗和虛無。他們站在法國思想的高峰上，可以望見，從山頂到山腳到山坡上，仍有一群英勇的人還在奮鬥。這群人是致力於發明的精英，意志堅強的平凡人。他們被壓制，卻是法國最優秀的部分。就像質地細緻的花崗

⁵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第 281 頁。

石，表面的污泥不會將它污染。民族精神被他們當做神聖的光明儲存在心中，他們竭心盡力地保護它不讓狂風吹熄。因此，他們孤獨，埋頭工作，寧願噤若寒蟬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而不願參與各個黨派的爭權奪利。使他們留戀的是法國的土地，千百年來不倦地開墾、播種，使之變得更美好。法國的民族性是含蓄、深刻而悲觀的，他們為了自由而忍受孤獨，孤獨是對壓迫的反抗。法國人為了自由而革命，為了自由的思想而做學問，為了自由而忍受孤獨。其實，自由只是一種理想，一種追求，它不一定真正能實現，而唯有法蘭西民族，願意為了追求自由而獻出生命！

其三，法蘭西性格中的萎靡氣質是因為太醉心于自由的結果，便是面臨著墮落的危險。自由的前提是無拘無束的思辨，法國人太喜歡思辨了，總是看到正反兩方面理由，這反而耽誤了他們的行動。如果說他們聰明，毋寧說這是沒有氣魄的聰明，就像把自己浸潤在溫和、蒼白的冷水裏，在自己的腦子裏搜索真理！殊不知，真理不應該在自己的腦子裏去找，而是應在別人的心裏去找！羅曼·羅蘭批判法國人缺少力量，缺少生氣，他們讓自己的思想不斷漫延，直至無終無極，卻沒有力量讓思想騰空躍起！藝術中最迷人的享受，是用艱苦的奮鬥換來的，而不是靠腦子想出來的。大腦的部分控制區域是感官神經，而法國人的自由思辨也將感官感受推向極致，政界、商界、藝術界、新聞界都在鄙俗的享樂主義中騷動，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條都是一樣：花最少限度的氣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樂。“你們不是用‘真理’，‘科學’，‘知識的責任’等等來掩護你們的懦怯，便是用‘藝術’與‘美’來遮飾你們民族的荒淫……你們沾沾自喜的培養你們民族的病，培養他們的好逸惡勞，喜歡享受，喜歡色欲，喜歡虛幻的人道主義，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們簡直是把民族帶去上鴉片煙館……”⁶

四、羅曼·羅蘭的民族觀對中國民族問題的啟示

藝術如果只是滿足了人類的肉欲，那麼便玷污了藝術。法國人被自由灌醉了，他們不會想到，藝術只是一個工具，它的唯一作用是喚引生命，藝術直擊的是心靈，而不是大腦。那些貧瘠的享樂，濫用的思想，是一個

⁶ 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朵夫》（卷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第 375 頁。

民族的糟粕。法國人最缺乏的力量，正是德國人最充足的。

因此，可以為羅曼·羅蘭的民族觀找到一個很恰當的辭彙：民族心性。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卻極不容易被人們所把握。羅曼·羅蘭的民族觀是一個偉大的構想，這個構想符合人類的共同福祉，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最終理想——和平共處。中國是一個強調“和”的民族，“和”的根基還是要從心靈中尋找，而非強暴和武力所能解決。因此，反思中國的民族問題，應反思我們的政策是否考慮到了各民族的心性？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首先，我們從“蘇聯模式”中學會了劃分民族的方法，並把民族多樣性作為社會主義文明豐富性的標準，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想法。但是，好的出發點不一定帶來好的結果，蘇聯解體便是這種想法錯誤的最好證明。原因在於，當心靈把“民族身份”作為對象來看待時，自然會區分高低和差異，“民族身份”所代表的利益便成為嫉妒、仇恨的對象，民族的自我保護和排他性也隨之產生。這種方式強化了民族的分別，甚至導致對立，這無疑與中華民族的最終理想背道而馳。我們在身份證上冠以民族身份，會讓新生的生命誤以為民族是天生的賦予，進而從心靈成長之初就種下民族分別對立的種子。而羅曼·羅蘭正是創造了一個範例，證明不同民族之間的心靈可以是聯結和互補的，只有這樣，和平才會真正到來！

其次，羅曼·羅蘭看到無論是德意志民族還是法蘭西民族都存在源於民族性方面的“問題”，這些“民族特性”往往起“正反”兩種作用，然而，無論怎樣，都不是歧視對方的原因，相反是促進兩個民族合作的“基因”。羅曼·羅蘭的這個觀點堪稱偉大，在當今世界各國各民族紛爭不斷，戰爭和競爭讓人們彼此嫉妒和仇恨的時代，這樣的寬容和謙虛精神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文化才是無法摧毀和被征服的，正如中國歷史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滿族人建立的清朝都納入偉大的中華文明史一樣，最終他們都演化為被征服者的文化海洋中。馬克思把這樣的歷史現象稱作“被征服的先進文明”的同化作用⁷。在今天，強行侵入別國，把自己的制度強行置於他國；或者人為干涉其他民族的發展進程，被迫把自由置於他者頭上，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⁷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768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最後，儘管羅曼·羅蘭不是研究民族問題的專家，但是，作為一位天才的作家，人類靈魂的探索者，他對人類的關懷毫無疑問超過所有民族學家，而且他生活的時代民族間的戰爭已經演化為國家間的征服，而且這種征服被國家政權冠以“愛國的”、“民族的”正義。今天看來，羅曼·羅蘭擔憂的民族問題不但沒有消失，相反更加深重和突出。無論是印度的民族主義還是中東的穆斯林兄弟會，無論是美國的自由選舉還是非洲的部落投票，實質都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名義強加給周邊國家或者民族的“行為”，都會增加懷疑、憎恨和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反思和重溫羅曼·羅蘭的民族思想，無疑是有重大現實意義的。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八）—水族食品 「魚包韭菜」

華華

壹、前言

水族，是一個人口數不多的少數民族。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大陸的人口普查統計，水族人口數為 411,847 人。

從名稱上看，「水族」很容易與「熱帶魚」的水族有所混淆。因為在台灣，一般展售熱帶魚店鋪，都稱為水族館，在路旁立著大大的招牌，販賣神仙魚、錦鯉、過濾器、魚箱等觀賞魚類及其用品。而少數民族的水族，卻是因為他們自稱做「睢（suǐ）」，發音很接近「水」，所以才命名為「水族」的，看來跟熱帶魚沒有什麼關聯。

至於水族的來源，一般有「殷人後裔說」、「百越（兩廣）源流說」、「江西遷來說」、「江南遷來說」等不同的講法。從這些不同的源流說法裡頭，可以大致看出，少數民族的起源，應該都有多個民族融合的痕跡，倒不必堅持哪種說法最正確。

水族有著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字，在語言分類上，水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侗台）語支。水族的傳統文字體系，稱為水書，是夏商文化的子遺，也是水族的精神支柱，十分古老。水書中還保留著圖畫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等各種面相，頗具特色，很值得研究。

水族主要聚居在黔桂交界的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貴州省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荔波、獨山、都勻等縣市為主要居住區，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從江、黎平等縣為主要散居區，此外在廣西北部的河池、南丹、環江、融水等縣市以及雲南省富源縣也有水族村落分佈。

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是水族最主要的居住區域，現在有成貴高鐵、貴廣高鐵等兩線高鐵，都通到三都縣站。其中貴廣高鐵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隨著貴陽東站啟用客運，宣告全線通車，而成貴高鐵也預計能於 2019

年6月通車。屆時無論從成都南下，或是由廣州北上，都可在四小時以內抵達三都縣，交通真是十分便利。以往貴州省那種「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困苦環境，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眼看著就要成為過去式了。

水族社會，由於距離中原地區甚遠，習俗上跟漢族大不相同。水族社會以一夫一妻的父系小家庭為基礎，一般以同姓血緣關係所組成的村寨為最典型的聚落型態。在村寨之中，建築物大多以傳統干欄式的樓房為主。以前水族男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包辦，婚後女方有暫時不落夫家的習俗。所謂「不落夫家」，簡單講就是女方婚後還住在自己家裡，就跟現在社會裡的「單親媽媽」有點相似：

不落夫家。原始母系社會的夫從妻居向原始父系社會的妻從夫居過渡時的一種婚俗殘餘。解放前彝、壯、侗、苗、瑤等族的部分地區尚保持此婚俗。結婚後第二、三天，新娘由新郎陪送返娘家居住。逢年過節或農忙時才去夫家小住數日。過後，又返回母家。一般一兩年，以至七八年，有的直至生了子女後，才長住夫家，共同生活。世界上其他國家一些民族亦有此種婚姻習俗。¹

但是「不落夫家」也不是永遠不住夫家，分界點就在於有無懷孕生子。如果順利產下新生兒，夫家就把新娘接走，歡喜成家。如果女方一直沒有「喜」，這場婚事，可能就要面臨危機了。據說北歐國家正好有類似習俗，我們之中有些不能理解洋俗的人，還給他們安了個惡名叫做「性開放」，好似北歐人會像野狗一樣亂來，其實哪會那樣呢？

俗語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婚姻如此，飲食也是如此。以飲食來說，自古以來形成的飲食習俗，隨地而異，千差萬別。民間常以「南甜、北鹹、東辣、西酸」來說明各個地區飲食習慣差異很大，這種講法可謂「雖不中，不遠矣」，大致上是沒錯的。現在就來看看，水族在吃的方面，有什麼特殊菜色會跟漢人不同。

¹ 陳永齡主編，《民族詞典》，（上海市：上海辭書社，1987，第1版），頁101。

貳、水族食品「魚包韭菜」

水族有一道號稱「第一名菜」的「魚包韭菜」，就是在漢人世界裡做不出來的口味。

漢人煮魚，都是在魚的外部打轉，薑蔥蒜佐料都往魚的外面加，少有例外。而水族的「魚包韭菜」，卻是魚在外，韭菜在內，佐料都在魚的裡面。許多人看到這種菜色，鮮有不大吃一驚的。

其實這跟水族殺魚的方式有關，水族殺魚是從魚背上下手的，起手式就不大一樣。還記得上一期曾經介紹過的傣族食品「香茅草烤魚」吧，傣族殺魚也是從魚背開始的。從烹調方式觀之，少數民族在廚藝的思考模式上，殊途同歸，似有其共通點。而漢人殺魚總是先剖魚肚，以取出腸肚為優先，少有例外。

傣族喜歡吃魚，一般人吃常吃鯉魚。水族做「魚包韭菜」時，所用的材料也是鯉魚。這道菜做法並不困難，就是要先將新鮮的魚洗去外層黏液，刮去魚鱗，以刀劃開魚背，去掉腸肚等雜物，再洗淨魚肚，淋上一些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一帶所產的「九阡酒」去腥。九阡酒是三都縣的驕傲，因當地水質及釀法皆屬上乘，以致成為遠近馳名的三都特產。

然後將青蔥、大蒜、生薑、糟辣、食鹽等佐料，加上洗淨的寬葉韭菜、廣菜等充填在魚腹內，將兩半魚合攏後，再用稻草把魚捆牢，放入大鍋內清燉或是蒸籠裡清蒸，約二個小時後取出就可以食用了。

這裡有兩種配料：糟辣、廣菜，需要略加說明，以免誤用。糟辣，就是糟辣椒醬，全名是「貴州糟辣椒醬」，是頗具貴州民族特色的一種調味聖品。糟辣色澤鮮紅、香濃、微辣、微酸。其製作方式，很像在醃製四川泡菜。方法是把辣椒加上生姜、蒜瓣一起剁碎，再加進一些白酒、鹽巴，攪拌均勻，裝進四川泡菜罈子裡，蓋好罈蓋，加好罈盤水，經過十天左右的自然發酵，色香味俱全的糟辣椒就製成了。一般辣椒醬，只有鹹、辣兩種味道，可是「貴州糟辣椒醬」卻具有香、鮮、嫩、脆、鹹等五種風味，十分特別，也是水族人煮魚的時候，不可取代的獨門醬料。

另外廣菜也很特別，是一種「葉用芋」，屬於多年生野菜，地上部分的葉柄可供食用，是一種絕妙的天然綠色食品。廣菜的主要是可食部分是吃莖。將葉子摘除後，再把外皮剝掉，然後切段，以鹽巴搓揉去掉多餘水

分，就可以與肉絲同炒，味道清爽可口。在越南，廣菜葉柄更是煮火鍋時的必備蔬菜，十分常見。

叁、結語

自古以來，水族便有自己的曆法，基本上與農曆一致，不同的是水曆以農曆八月為歲末，九月為歲首。從八月底至十月初的四個亥日都是「端節」日子，是水族最隆重的節日，在水語中稱為「借端」，²相當於中原的春節。但在端節的祭祀慶祝活動中，一般都禁食葷菜，就是不許吃雞、鴨、豬、牛等肉類，但卻不禁食魚、蝦，因此以魚類為主的烹調在水族中十分具有特色，「魚包韭菜」更是可以用來祭祖的大菜，是逢年過節的必備佳肴。

水族有一個傳說，可以解釋何以水族在年節時，只吃魚，不吃肉。原來水族的祖先是居住在江河湖海邊上的漁民，一日三餐都有魚蝦可吃。後來由於洪水成災、瘟疫流行等原因，被迫向黔桂邊疆遷徙。出發前先祖們採集了九種草藥和魚，一起製成了一種能治瘟疫的良藥，作為防疫之用。靠著先祖們的智慧，水族得以存活，來到雲貴高原南坡的都柳江和龍江上游定居，過著與世無爭的快樂生活。但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過去了幾百年，那以九種草藥和魚製成能治瘟疫的藥方竟然遺失了。水族人十分懊悔，就規定「端節」不許吃肉，只准用韭菜與廣菜代替失傳了的九種草藥，製成了「魚包韭菜」，除了祭祀祖先之外、並表達對祖先的懷念與悔意。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祖傳秘方治瘟疫，奈何日久竟失憶，魚包韭菜當祭品，禁食葷腥表歉意。」

² 唐屹等撰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81[1992]，初版），頁174。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二屆第四次理、監 事會會議記錄

記錄：林遙鵬

- 一、時間：107 年 2 月 3 日上午 11 時
- 二、地點：大三元酒樓三樓（台北市衡陽路 46 號）
- 三、出席人員姓名：
常務理事：楊克誠、娥舟文茂、多長有、趙竹成、巧兒潘
理事：阿不都拉、藍美華、粘聰明、陳又新、王慶平、司其元、
周 健、楊開煌。共 13 人。
常務監事：馬普東、張華克、賴惠玲、
監 事：游麗卿，共 4 人。
- 四、請假人員姓名：
理事：廣定遠、袁公瑜、李信成、張淑珍，共 4 人。
監事：楊哲淑，共 1 人。
- 五、列席人員：候補監事秦偉騰、永樂多斯。
- 六、主席：楊克誠
- 七、主席致詞：（略）
- 八、來賓致詞：
- 九、報告事項：會務報告(如附件一)
- 十、討論提案：(如附件二)
- 十一、臨時動議：
- 十二、散會

第四十二屆理、監事第四次聯席會會務報告

會務報告

- 一、2017 年《中國邊政》如期出版季刊四期(209-212 期)。
- 二、2017 年 4 月 22-23 由本協會主辦兩岸「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 三、2017 年 8 月 21-29 日，由秘書長親率本會會員 12 人，應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王延中所長之邀至秦皇島參加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承辦之「海峽兩岸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與路徑」學術研討會及參加寧夏銀川北方民族大學回族學研究院承辦之「一帶一路：歷史視野與現實展望」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 四、預計本年 4 月 20 日舉行第四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 五、預計本年 4 月 21-22 日舉行 2018 年學術研討會。
 - (一) 主題：「少數民族的現代化」
 - (二) 主辦單位：中國邊政協會、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北京國觀智庫
 - (三) 邀請人數：大陸學者 15 人；台灣學者 3 人。
 - (四) 其他事務：委由秘書處籌辦。
- 六、106 年度楊理事長捐贈協會常年費用新台幣 500,000 元、4 月份「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費用 650,000，共計 1,150,000 元。
- 七、本協會劉秘書長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捐贈協會新台幣 100,000 元。
- 八、106 年劉秘書長撰寫達賴喇嘛相關之言行、活動等相關文章 4 篇，獲「正覺文教基金會」捐贈本協會新台幣 170,000 元。
- 九、上年度經費截至 12 月 31 日止，餘 82,082 元。

討論提案

案由一

提案人：秘書處

預計本年度 4 月 20 日舉行第四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一)時間：4 月 20 日 1700 時

(二)地點：待定

敬請討論：

請問各位理監事本提案有無其他提議，如果沒有，本年度 4 月 20 日舉行第四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鑒請理監事會鼓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人：秘書處

預計本年度 4 月 21-22 日舉行 2018 年學術研討會。

(一)主題：楊開煌理事提議，主題定為：「少數民族的現代化」。

(二)主辦單位：中國邊政協會、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並由雙方共同承擔研討會經費，惟銘傳大學因陸生就讀員額少，學校僅同意支付大陸學者之四天住宿費（約 NT13 萬元）。餘 50 萬將由本協會負擔經費用。

(三)邀請人數：大陸學者 14 人；台灣學者 3 人。

(四)其他事務：委由秘書處籌辦。

敬請討論：

請問各位理監事本提案有無其他提議，如果沒有，2018 年學術研討會之主題、邀請人數、主辦單位並責由秘書處籌辦會務，鑒請理監事會鼓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劉學鈔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41 號 4 樓之 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